法国—中国

两个世界的碰撞

原著：Muriel Détrie

译者：袁 霜/朱志平





北京，1687年：路易十四派出的第一批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了康熙皇帝的皇宫。此后的一系列交往使双方彼此间产生了好奇感，同时也带来了丰富的文化交流。19世纪的帝国主义法国改变了对华政策：当法租界在中国的中心城市尤其是在上海建立起来的时候，诸如1860年洗劫圆明园之类的暴行彻底破坏了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在中国，伴着20世纪初的改良运动，法国作为革命之母的形象随之形成。“权利与正义之国”欢迎工人与学生，引导他们展开政治斗争。这又反过来影响了法国的毛泽东主义者加入到“文化大革命”之中。今天，借助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两国间形成了合作、交融、互补的崭新的关系形式，彰显出彼此间相互而持久的吸引力。

140余张图片向您展现中国人心目中的法国和法国人心目中的中国。

ISBN 7-5327-3480-3

9 787532 734801 >

定　价：　32.00元



中国文化年
L'ANNEE
DE LA CHINE
2003/2004
www.anneedelachine.org

法国—中国

两个世界的碰撞

原著：缪里尔·德特里
译者：余　磊 / 朱志平
出版者：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 文 出 版 社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www.ewen.cc
责任编辑：周梦黑
印刷：上海精英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2004 年 7 月初版
印次：2004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5100 册
书号：ISBN 7-5327-3480-3/K·142
定价：32.00 元

Copyright © 2004 by Gallimard
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Gallimard through
Bardon - Chinese Media Agency(版权代理—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in simplified characters version
© 2004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缪里尔·德特里，曾就读巴黎高等师范专科学校，获现代文学教师学衔，且是索邦大学博士（其论文关于谢阁兰）。她也曾学中文和日语，并在中国和日本执教多年。她现为新索邦大学普通文学和比较文学讲师。作为西方和远东文学关系专家，她的主要成就是出版了《中国旅行，关于从中世纪到中华帝国衰弱的西方旅行家文选》[罗贝尔·拉丰出版社（Robert Laffont），“老书”丛书（Bouquin），1992年版，与尼奈特·布思罗伊德（Ninette Boothroyd）合作]以及她组织的多次研讨会的会议记录［《文学和远东》，奥诺雷·尚皮翁1999年版，《法国—亚洲：文学交流一百年》（France-Asie : Un siècle d'échanges littéraires），友丰书店2001年版]。

致安娜·勒杜　　乐意成为中国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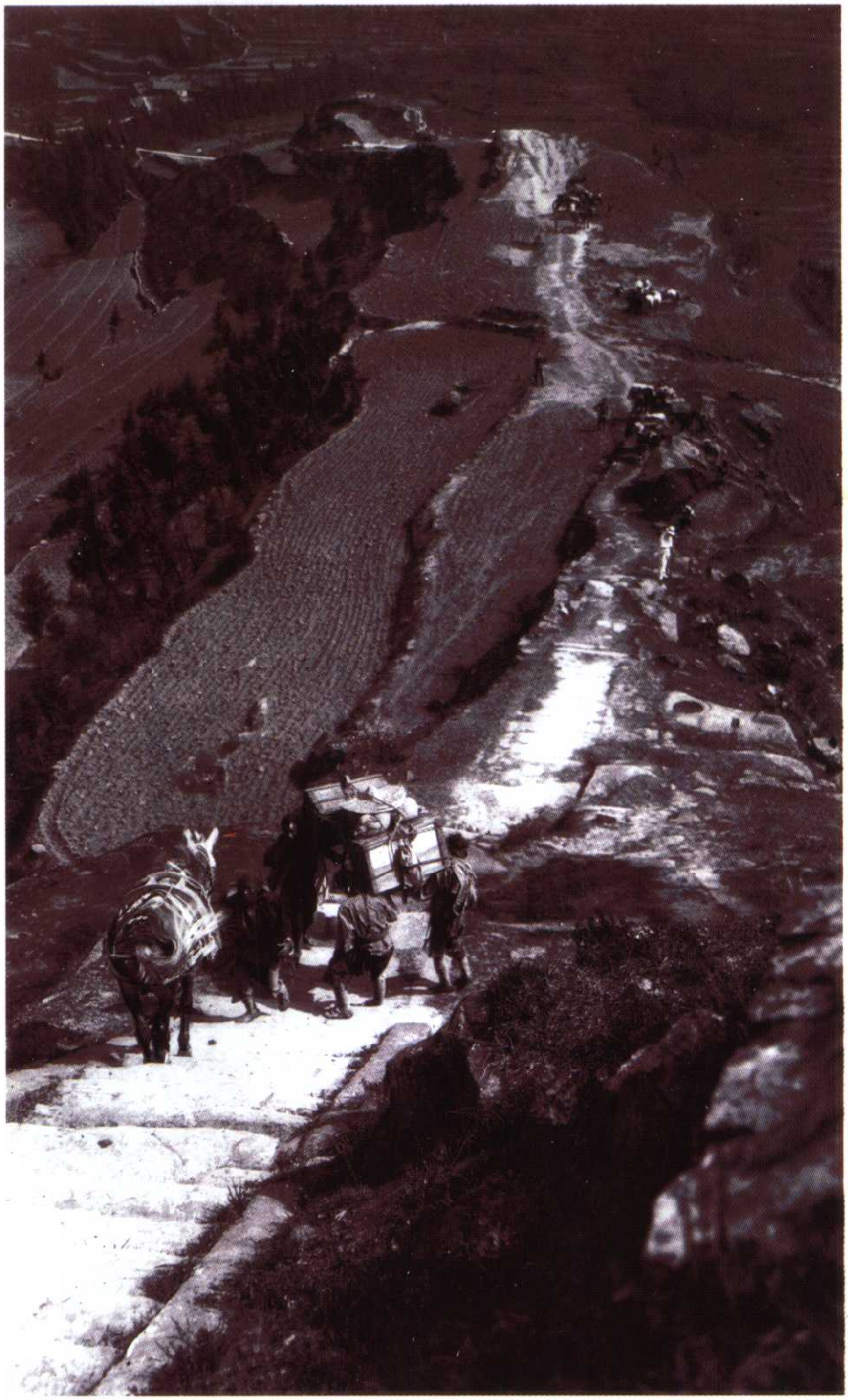
法国—中国

两个世界的碰撞



原著=缪里尔·德特里
译者=余磊/朱志平

上海译文出版社



Docteur Victor Ségalen,

Médecin de la Marine.





AUX LETTRÉS

D'EXTRÊME-OCCIDENT

(1910)

20 Août Projet de réunir une série d'Essais ou mieux de Proses (Aux dix mille années, le Continent) qui, partant comme thème de l'Orchestique des Palais chinois, se rapporteraient presque tous à Pékin dont il faut que je dise la vie métropolitaine, urbaine, provisoire & antique. Mêlés aux Briques & Tuiles & d'a. bord 2 ou 2 se rapporteront à l'Architecture. 73



Les Cantons : Pavillon aux cinq étages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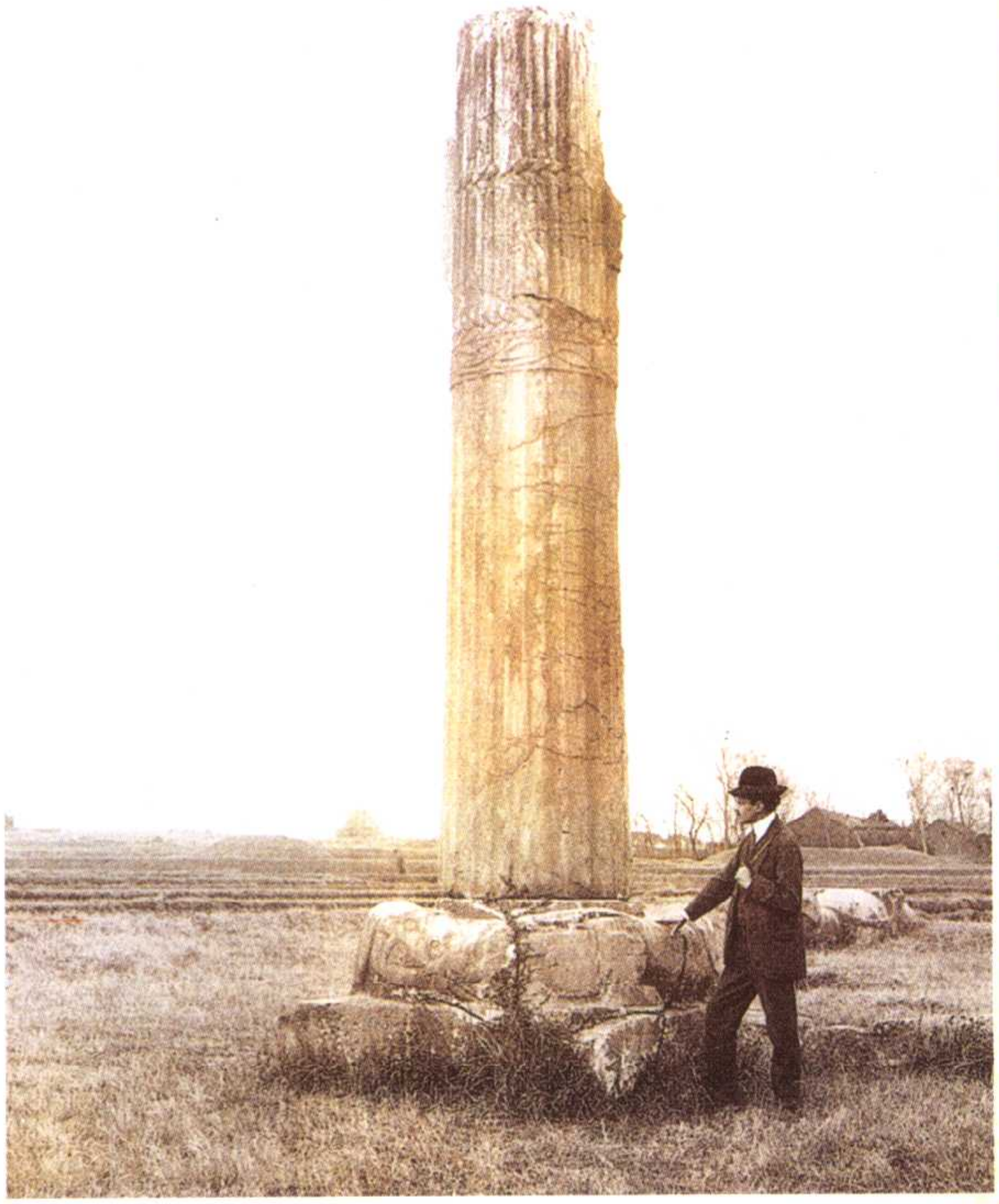
3

Rien d'immo
mées des
sort du s
vos murs
hommes

Si le temps n
vrier qu'
troncs pl
vantes,
le soleil

Fondez sur
ment vot
le sacrifi
gile gon
sol de se

Toute l'offrar



Or, si vous devez subir la pierre insolente & le bronze orgueilleux, que la pierre & que le bronze subissent les contours du bois périssable & simulent son effort caduque :

Point de révolte : honorons les âges dans leurs chutes successives & le temps dans sa voracité.

STÈLE



STÈLES FACE AU MID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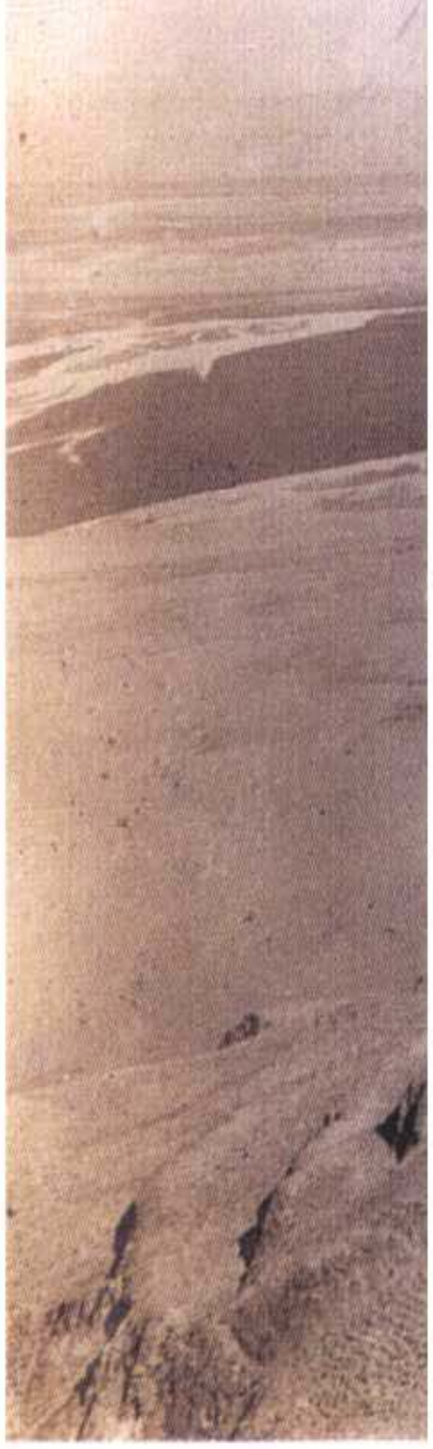
Addend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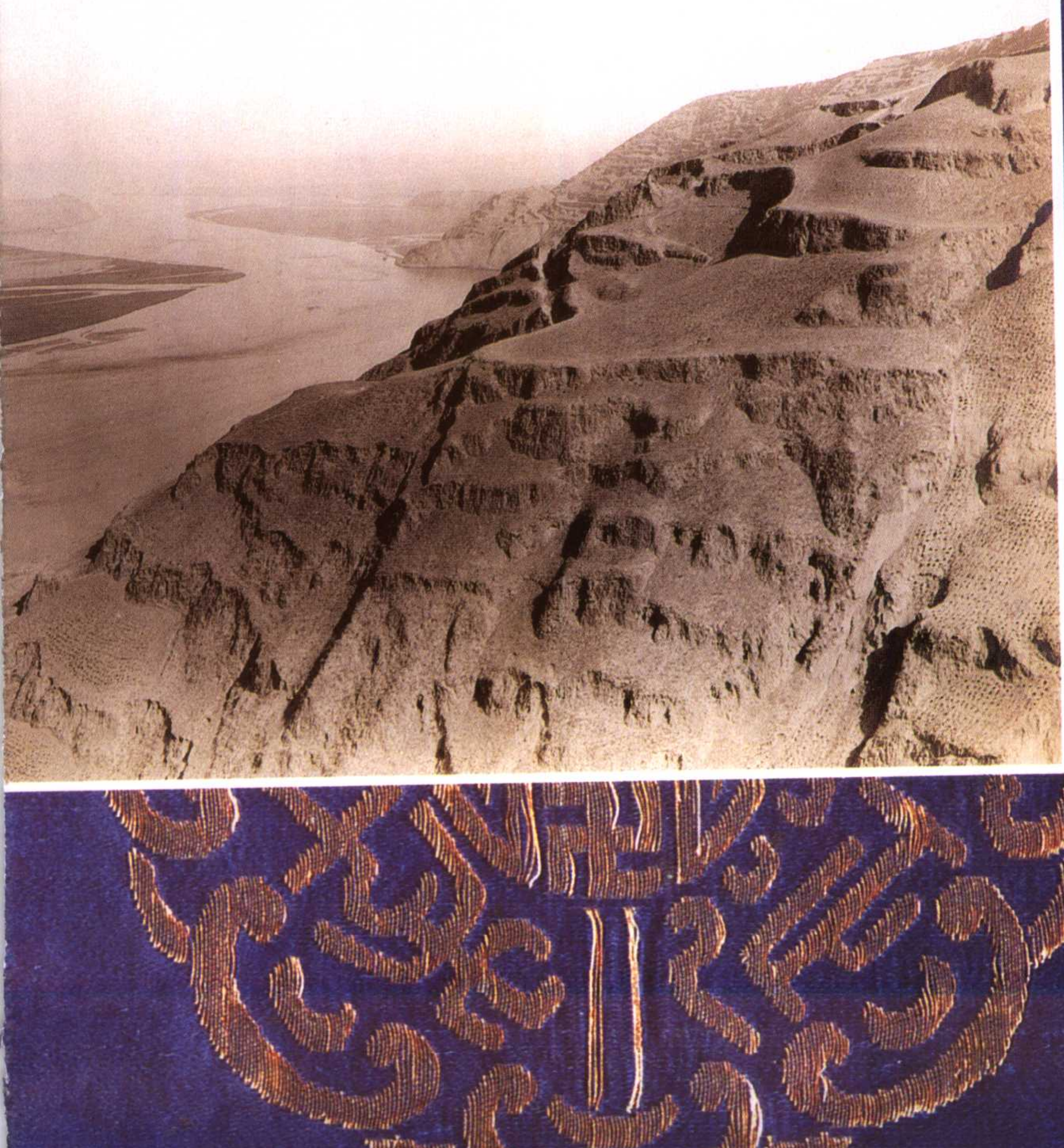
LE DANGER AU PAYS DU REEL – L'imaginaire habite le
réel et l'écrit avec lui.

[illegible] 1909 [illegible] Devant moi un spectre [illegible]

Etapes :

I. J'AI TOUJOURS TENU POUR SUSPECTS ...
II. CE N'EST POINT AU HASARD ...
III CAR J'HABITE UNE CHAMBRE AUX PORCELAINES ...
IV TOUT EST PRÊT, MAIS AI-JE BIEN LE DROIT ...
V LES PAS SUR LA ROUTE ...
VI L'INDISPENSABLE PETIT DIEU DE VOYAGE ..
VII ME VOICI ENFIN A PIED D'ŒUVRE ...
VIII LE REGARD PAR-DESSUS LE COL ...
IX LE FLEUVE DISPUTE A LA MONTAGNE ...
X POUR DEVISE ...
XI QUANT AU RÉEL ...
XII DE LA SANDALE À DU BÂTON.
XIII LE BAIN, DANS LE GROS TORRENT ..
XIV LA GRANDE VILLE AU BOUT DU MONDE
XV LE LONG SÉJOUR IMMOBILE
XVI UNE CHAIR GLORIEUSE
XVII L'HOMME DE BÂT ...
XVIII LA FEMME, AU LIT DU RÉEL ..
XIX CEUX QUI « VIVENT » SUR LES HAUTS PLATEAUX ..
XX L'AVANT-MONDE À L'ARRIÈRE-MONDE ..





目录

10 第一章 对话的开始

路易十四派往康熙皇帝身边的第一批耶稣会传教士几乎没能将基督教引入中国，但他们在科学、艺术和技术领域的影响却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这些往来使汉学研究在西方得到了第一次飞跃发展，并掀起了一股幻想多于现实的“中国热”。

34 第二章 对话中断

在接下来的那个世纪，两国关系恶化。如同其他殖民国家一样，法国通过武力强行介入，在中国城市的中心建立起了“国中之国”——租界。在两国大众的想象中，彼此形成了一种明显带有无知、蔑视、恐惧色彩的形象。

58 第三章 对话恢复：合作与诱惑

20世纪初，中国的改良运动转而向法国寻求真理。中国的学生和工人涌向这个“权利与正义的国度”，去发现卢梭、雨果和左拉，去学习如何开展政治斗争。为了维持其在中国的影响，法国选择了合作。

76 第四章 文化换位与交融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激起了法国知识分子的共鸣。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主义者”醉心于以巴黎公社为榜样的“文化大革命”。自中国对外开放以来，两国间展开了丰富的对话。两个世界得以重逢。

97 见证与文献


熙春
地字八十九號
天字一號
玄字玖號

1687年，当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出的第一批耶稣会传教士到达北京康熙皇帝的皇宫时，中国人对法国还一无所知。然而此时，由于马可·波罗（Marco Polo）的功劳，法国人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对中国有了一个理想化的印象，耶稣会传教士的著作只是更加深了此种认识。

第一章

对话的开始

16世纪，渴望通商的野心驱使西方人来到了中国的国门（左图，在广东的欧洲商人正在过磅供出口的装满茶叶的货物箱）。但是他们最终能够引起中国人的兴趣并深入内地却都要归功于耶稣会传教士的科学知识〔右图，由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在中国科学家徐光启的帮助下译成中文的勾股定理〕。



“北京法国传教团”

早在13世纪，法国与当时正处于蒙古人统治之下的中国就曾两度试图结盟共同对抗伊斯兰教徒。然而，圣路易（路易九世——译注）派往元朝大汗处的方济各会会士纪尧姆·德·罗柏鲁（Guillaume de Rubrouck）的传教团中途搁浅，同样，派往法国国王“美男子腓力四世”（Philippe le Bel）处的北京拉班·扫马（Rabban Sauma）的景教传教团也未能成行。直到四个世纪以后，两国才建立起深入而持久的联系。路易十四开创了两国交往的先河，1685年，他派遣五名耶稣会传教士以“宫廷数学家”的身份来到康熙皇帝的皇宫。他们的使命同时涉及宗教、政治、科学和文化领域：如同17世纪初以来追随利玛窦足迹的所有耶稣会传教士一样，他们用他们的科学和艺术服务于中国皇帝，以使他厚待基督教徒。但他们还肩负着一项新的任务，那就是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突显出法国的强大而为法国谋取商业利益。



利玛窦（上图，利玛窦与徐光启，后者是最早改信基督教的中国人之一），16世纪末派往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团的创始人。他明白只有接受中国的语言和习俗才能深入到中国社会内部。这一适应政策使他能够为中国的达官显贵所器重，并被所有在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所效仿，使他们取得了同样的成功。

起先，法国传教团取得了节节成功。张诚（François Gerbillon）在1689年与俄国人的《尼布楚条约》的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白晋（Joachim Bouvet）则因为用他随身带的金鸡纳霜治好了皇帝的病而获得了皇帝的宠信。作为对他们

服务的奖赏，他们在皇城内被赐予了一块土地用于建造教堂（北堂，建成于1703年），康熙皇帝还于1692年下诏对基督教以示宽优。1693年，白晋神甫返回法国，他说，皇帝委托他“聘请其他学者，尤其是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五年后，“安菲特里特”号（L’Amphitrite）载着他和十来个传教士回到中国，成为第一艘在广东靠岸的法国商船。随后，在18世纪初又有30多名法国耶稣会传教士被陆续送到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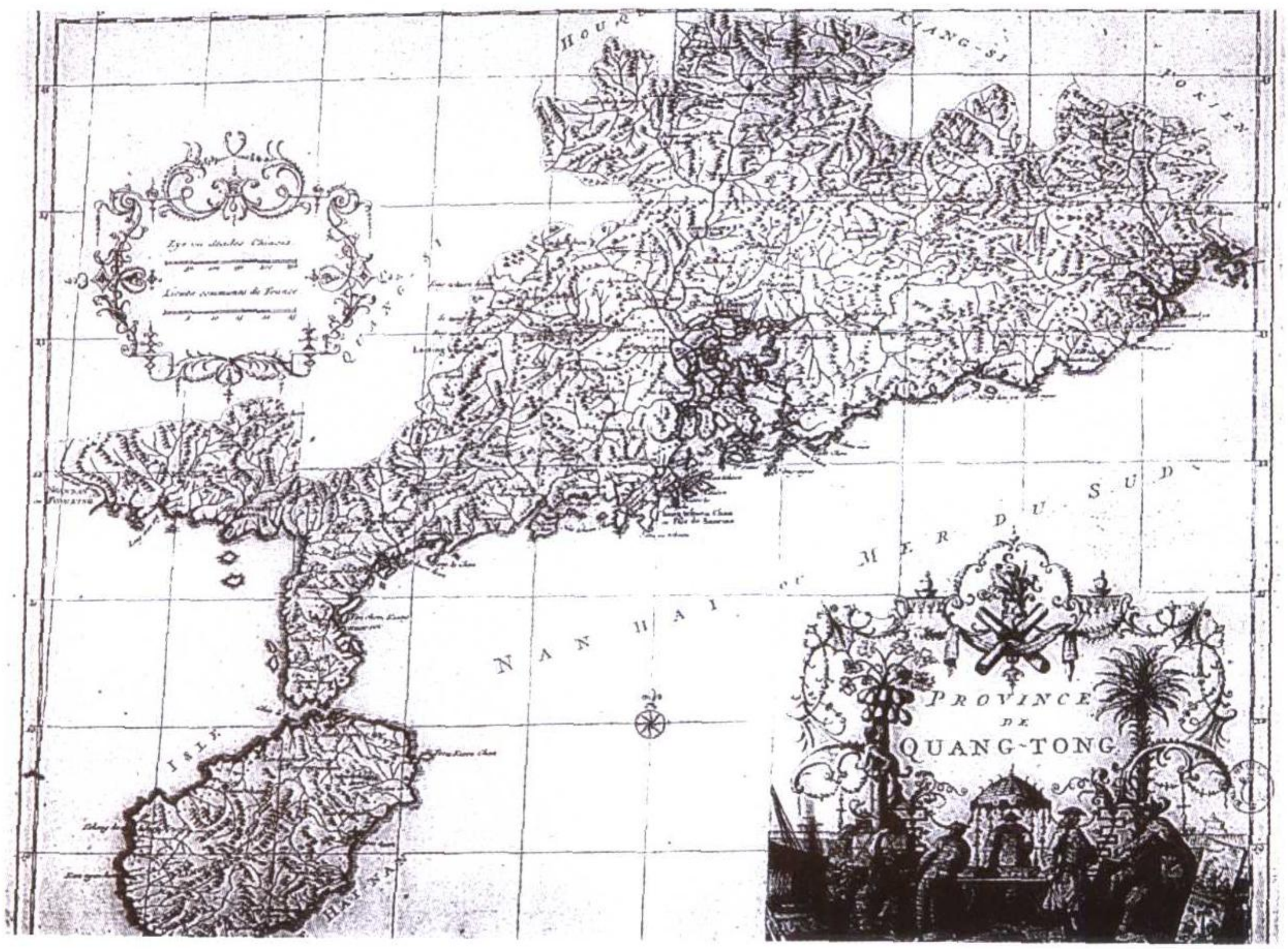
然而，葡萄牙的耶稣会传教士，以及其他进入中国的宗教修会的代表，主要是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的修士，对法国传教团的成功感到不安。中国的礼仪问题（是否应当容许中国教徒继续用他们的传统仪式来表达对祖先和孔子的敬意？）成为各传教团之间的争端。1715年，罗马教皇把这种遵循传统的做法定为偶像崇拜加以禁止，从而暂时性地解决了这一争端。康熙皇帝认为这是对他的帝国内部事





“北京法国传教团”的正式存在始于1700年，当时在中国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从耶稣会获得准许由一个独立的修道会会长管辖，而不再像他们所有在亚洲的会友那样依赖于葡萄牙的庇护（保教权）。从1687年到达中国的李明（Louis Lecomte）〔《中国现势新志》（Nouveaux mémoires sur l’état présent de la Chine）的作者，侧图〕，到钱德明(Joseph Amiot)〔上图，发表于1776至1791年的《北京传教士关于中国人历史、科学、艺术、习俗论丛》（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des Chinois）的主要编者之一〕，其成员一直是其他耶稣会传教士怀疑甚至敌视的目标，他们害怕看到北京法国传教团的成员为法国利益服务而使葡萄牙的利益受到损害，这也并非毫无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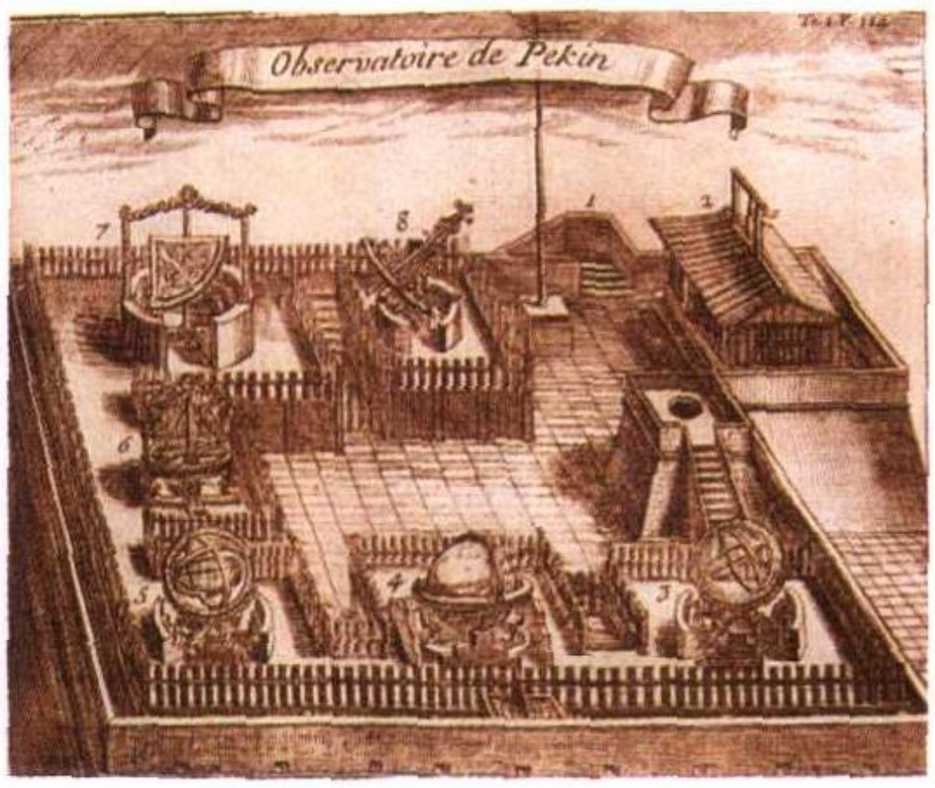
务的干涉，作出了禁止基督教的回应。禁教风波由此也在乾隆皇帝的长期统治时期（1736—1796）留下了印记。但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在科学和艺术方面的精湛技艺使他们在宫廷中的重要职能得以保留。然而，当对中国礼仪之争以1773年耶稣会被废除而告终时，北京法国传教团陷入了绝境，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成员改宗。



《皇舆全览图》，由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应康熙皇帝的要求绘制而成。这组地图出现在他们献给法国国王的礼物之中。组成这一地图册的30张地图（下图，广东省地图）于1732年在巴黎由唐维尔（d' Anville）刻成铜版，并于1735年公布于《中华帝国全志》（La Description de la Chine）一书中。这是一本由杜赫德（Du Halde）神甫根据耶稣会传教士的著作编写而成的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在亚洲和欧洲，这本书直至19世纪一直被用于中国地理的教学。

对传教团所作的科学贡献的总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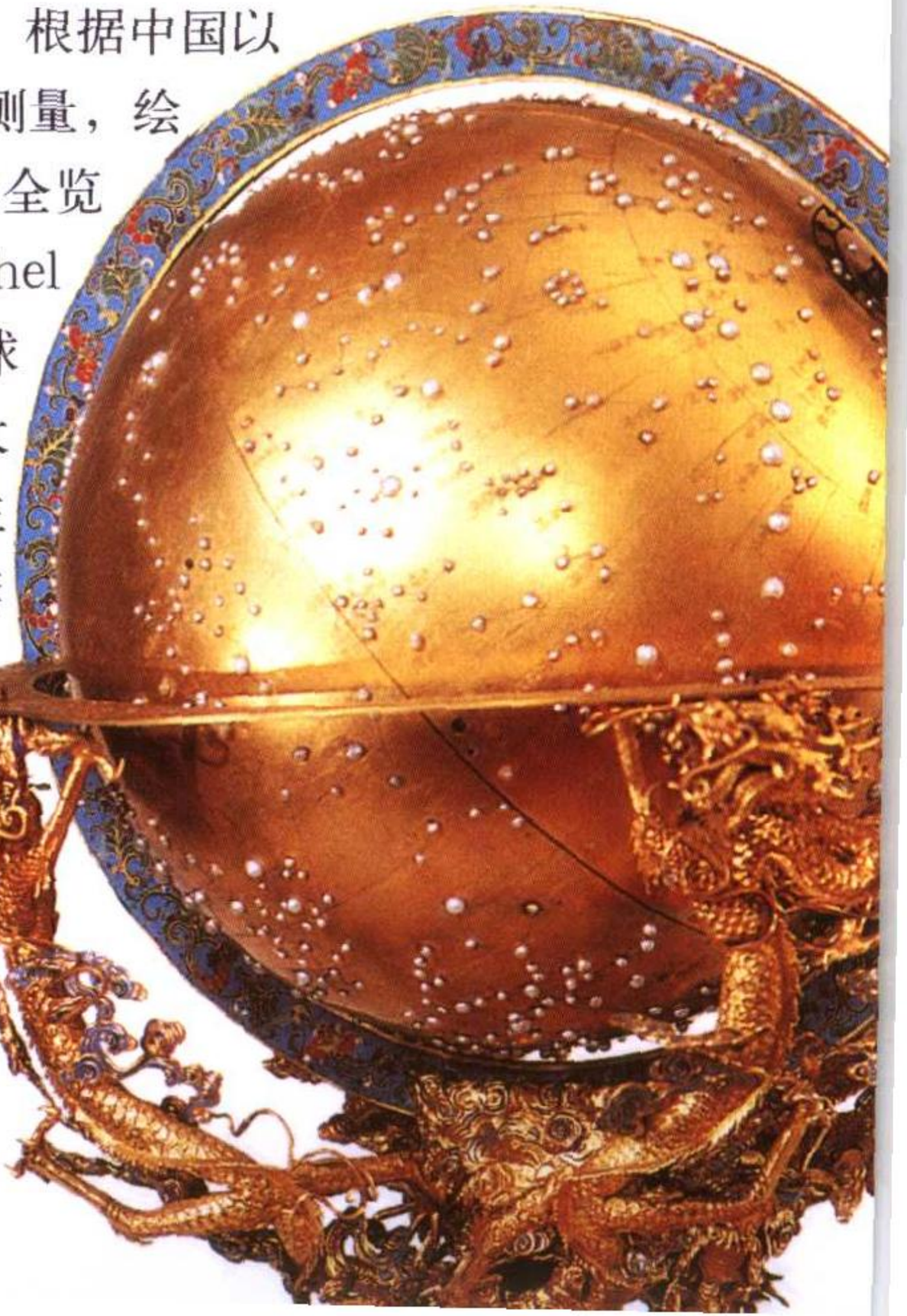
基督教和西方自然科学在由第一批耶稣会传教士开始传入中国时，顺利地为中国人所接受。耶稣会会士对于德行的要求深深地影响着极为看重伦理道德的中国官员。同时，他们在天文、地理和数学上的知识补充甚至超越了中国在这些方面的所知，



因而毫无困难地就为中国所吸纳。但是中国人只是吸收西方宗教和知识的实用方面而从不深究其思想根源本身。而且，即使耶稣会传教士能够成功地使皇帝身边的一些要员，甚至一省内数以千计的民众改信基督教，也还是无法阻止禁教的发生。

从自然科学方面来看，这一总结要显得积极得多。由于有了法国传教团的耶稣会传教士所传授的地理知识，中国人才能够在世界上准确定位法国和中国。甚至在地图绘制方面还建立起了一次真正的法中合作：奉康熙皇帝的命令，5名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助手和当地官员的协助下，根据中国以前的地图并在大多数省份进行了实地测量，绘制出了清王朝所有行省的地图（《皇舆全览图》——译注）。此外，蒋友仁（Michel Benoist）还为乾隆帝制作了一个地球仪，这个地球仪运用了巴黎科学院大地测量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更值得注意的是，他第一次提到了教会明令禁止的哥白尼日心说。然而在中国人看来，这一发现在揭示出基督教和西方自然科学的矛盾的同时，最终并不能对西方自然科学有所裨益，反而会令人对其权威性产生怀疑。

天文学在古代中国为皇权所特有，这是因为根据对天体位置的计算可以制订出历法以安排每年的一切活动。耶稣会传教士在这一领域显示出他们的优势，因而在宫廷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乾隆皇帝喜欢听他们讲解他们所使用的测量仪器的运作机理，如今天依然可见的北京古观象台（左图）的仪器和下图的浑天仪。



法国王宫和中国皇宫相媲美

中法两国文明都享有着巨大的声誉，这使得耶稣会传教士把法国国王与中国的清朝皇帝相提并论。为了向一方证实另一方的强大，他们向康熙帝展示了路易十四的马上戎装版画，而相似装束的清朝皇帝的画像也被传到了法国。两国君王通过耶稣会传教士交换了礼物，并同样都表现出对对方礼物的极大重视。在从法国输入的物品中，康熙帝尤其喜好手表、自鸣钟、气压计、自动机和其他由耶稣会传教士维护和修理的机械物件。路易十四送给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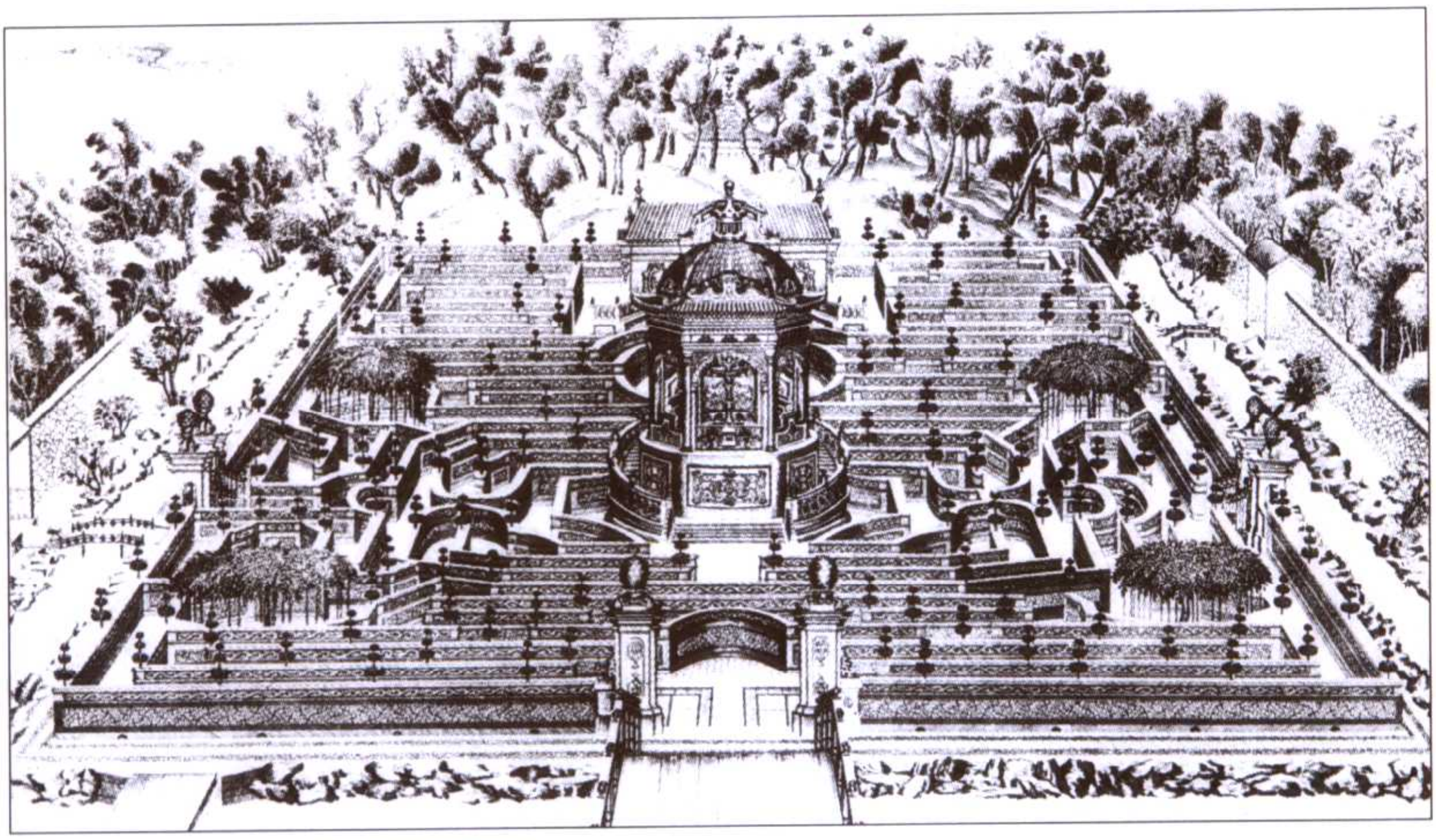
中国历来承认统治者的教化作用，而自1644年起统治中国的清朝皇帝却加强了他们的战争职能。因此乾隆帝让耶稣会画师郎士宁（Gastiglione）为他画了一幅戎装图（侧图）。画中乾隆帝的姿势以及此画的绘画技巧均与安托万·华斯（Antoine Houasse）所绘的路易十四像（上图）相近。李明神甫在他的《中国现势新志》卷首的《呈路易十四的献词》(Epître au Roi)中颂扬了康熙帝，他说到："我十分荣幸地向您谈起这位君王。当他刚把目光投向您的画像时，就发现了您那如此独特的威严神气和显得如此英勇、睿智和充满威望的容貌。他由此而相信，如同亚洲一样，欧洲也有其自己的主宰。"



熙皇帝的凡尔赛宫的版画在几十年后使其孙乾隆产生了在他位于北京西北的夏季行宫“圆明园”建造与凡尔赛宫相似的宫殿和园林的念头。1747至1759年，法国人蒋友仁、王致诚和意大利人郎士宁合作构建了“西洋楼”。中西方美学要素在这一杰作中得以完美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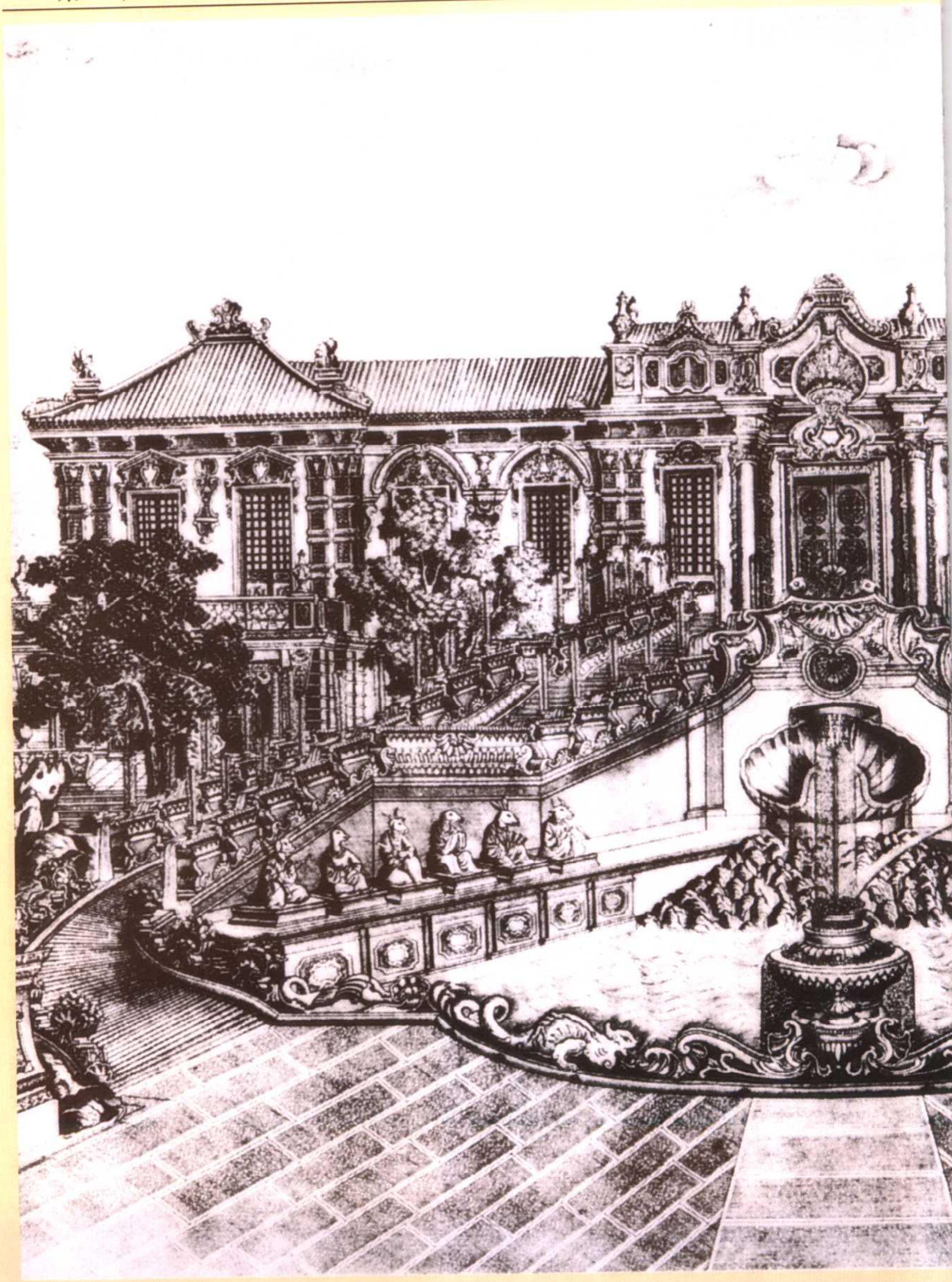
法国国王的行宫和王国要员的府第也装饰得具有异国情调。他们还有自己的“中国珍品室”，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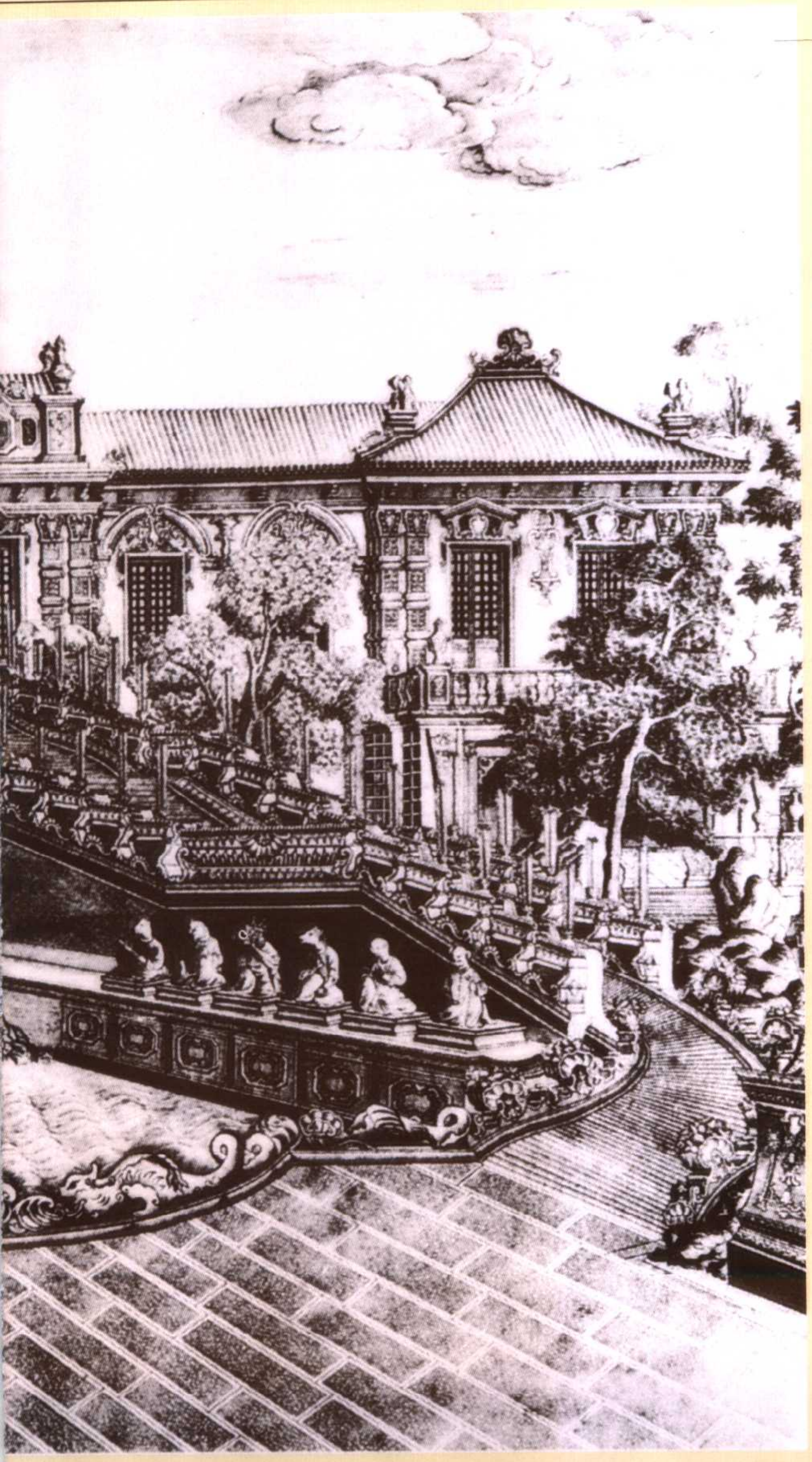
圆明园的十座“法式园林”按照严格的几何学布置，同时又根据中国的审美观赋予每一座园林独立而多变的景色。下图的这一石墙围绕的“迷宫”（圆明园花园万花阵——译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的南部是真正意义上的迷宫，到处延伸着几何线条，而北部的山丘上则杂乱地种满了树木。从山顶的亭子上往下看，是无法将园子的全景一览无余的。



内藏有上等瓷器、漆器、象牙、玉器、景泰蓝、扇子、屏风、画册、小雕像等等。这些琳琅满目、无比珍贵的物品会令来访者惊叹不已。

两国君王对音乐和盛典表现出同样的兴趣。康熙帝不仅让精通音乐的传教士在他面前演奏，而且还学习西方乐理基础并亲自练习演奏羽管键琴。后来，钱德明神甫为乾隆帝作了几首结合了中西乐器的弥撒曲。两位君王还通过举行盛大的庆典来相互攀比，庆典上有合奏、舞蹈、戏剧还有盛大的游行，





尽管是由石块、大理石和彩砖建成，尽管其风格独特，源于法一意宫廷艺术，尽管装饰有圆柱、盖顶、栏杆、扶梯和雕塑，然而圆明园的西洋楼仍展现出一些中国建筑艺术的基本特征：木质结构、红色围墙、琉璃屋顶、描金青铜和瓷质装饰。但是模仿自凡尔赛宫的喷水柱要完全归功于蒋友仁的灵机一动。这座“海晏堂”实际是一个大蓄水池，里面安装了引水的机械。在“海晏堂”的宏伟阶梯的底部，蒋友仁设计了一个令人惊叹的水漏计时器：中国十二生肖的青铜头像[由法国人杨自新（Gilles Thébault）制作]依次向池中持续喷水两小时，在正午和子夜则十二生肖同时喷水。

其中也不乏异国情调。



知识的传播

同为艺术的爱好者，中法两国君王又同样表现出对对方国家科学的好奇并鼓励知识的探索和传播。康熙皇帝让传教士教他数学和物理，还先后任命巴多明（Parennin）神甫和宋君荣（Gaubil）神甫掌管皇家学院，在那里教授他的儿子们拉丁文。享有盛名的圆明园藏书楼（圆明园文源阁——译注）迎来了数千册西文著作，其中一些还按康熙帝的旨意译成了中文。此外，传教士们还用汉语和满语写了一些专著向中国介绍欧洲自然科学的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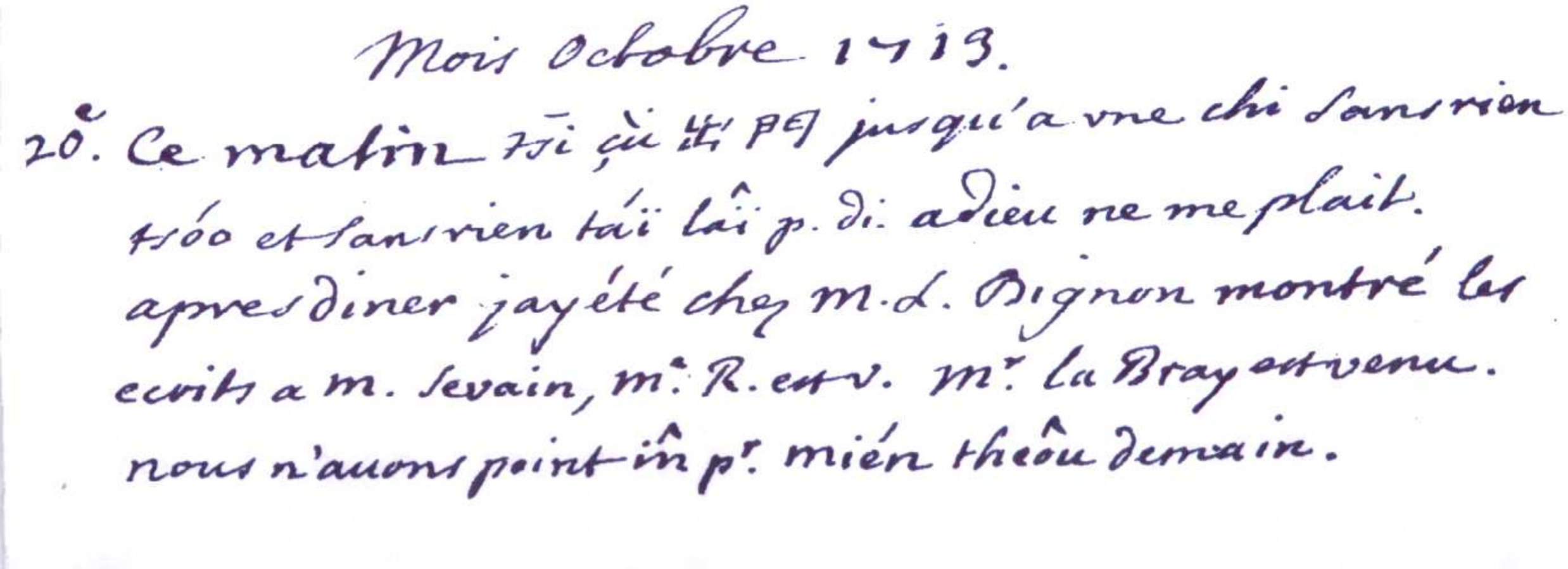
1697年，白晋从北京带回法国50多册康熙帝赠给路易十四的珍贵书籍。由于有了这些多种多样而又为数众多的礼物，法国皇家图书馆在1720年时就已藏有数千卷中国书籍，而当1722年傅圣泽（Foucquet）神甫带着数千册书籍从中国满载而归时，这一藏书的数字又大大增长了。法兰西学院院士尼古拉·弗雷雷（Nicolas Fréret）和艾蒂安·傅尔蒙（Etienne Fourmont）尝试编写了汉—法/拉词典，从而奠定了法国汉学研究的基础。他们定期与耶稣会传教士交谈，向他们询问涉及方方面面的细致入微的问题。他们还尽量利用了当时极少数藏在传教士行李中来到法国的中国人的陈述。黄家略（Arcade Hoang）就是其中的一位，他被任命为“太阳王的翻译”，并担负着给法国皇家图书馆中的中文书籍编写书目的任务。





耶稣会传教士的著作使法国学者相信中国人具有高度的文化水平（侧图，表现中国文人书房的版画，出自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因此他们把极大的希望寄托于18世纪来到法国的极少数中国人，如黄嘉略身上。然而，就如他的日记节录所显示，黄既不精通法语而且汉语也写得不好。他并不能胜任交付给他的《康熙字典》（左图）的翻译工作。至于路易十五的外交大臣让-巴蒂斯特·贝尔旦（Jean-Baptiste Bertin）资助的在巴黎学习了数年的两个中国青年，原本希望其能为法国提供关于中国的信息，但当他们回到中国面对向他们提出的细致入微的问题集时却仍显得无能为力。

的确，耶稣会传教士成功地在法国人的脑海中植入了一个强盛的中国的形象。但是截然相反，在中国这一边，他们却失败了，他们做出的一切努力均未能使他们实现在两国间建立起互惠关系的计划：在清朝皇帝的眼中，法兰西仍然只是一个偏邦小国，法国送的礼物只是向中华帝国表示敬意的贡品，而法国派来的使者，虽确实是些渊博的学者和灵巧的工匠，但也只不过是任中国皇帝差遣的奴仆。虽说未能产生持久的政治和经济影响，但他们作为法中两国之间的中



Mois Octobre 1713.

20e. Ce matin ffi çù tñ pEJ jusqu'a vne chi sanrien
ffóo et sanrien taï laî p. di. adieu ne me plait.
apres diner jay été chez M.L. Bignon montré les
ecrits a M. Sevain, Mr. R. et v. Mr. la Bray est venu.
nous n'auons point iñ pr. mién theôu demain.

介在艺术和科技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仿制和创新：瓷器与漆器

自中欧贸易伊始，瓷器就是中国出口的主要产品之一。为了满足欧洲客户的品味，中国立即制作起有特殊装饰的瓷器，而法国本土的工场则负责制作浮雕金饰用于镶贴在从中国进口的瓷器上，或在描金青铜底座上安放中国制造和装饰的花瓶。后来人们发现直接进口白瓷就地装饰更为简便。但是大量的瓷器输入威胁着法国的贸易平衡，因此法国人也开始仿制中国瓷器。18世纪初，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殷弘绪（d'Entrecolles）神甫在一封信中极其精确地描述了著名的景德镇窑炉产的半透明瓷的制作全过程，这封信也因此而闻名于世。经历了多次的试验之后，尤其是多亏了在里摩日（Limoges）附近发现了一处高岭土矿，色弗尔（Sèvres）皇家制瓷工场终于在1769年生产出了真正的硬瓷。

漆器是另一种激发起法国人创造性的典型的中国艺术形式。在中国，漆器的使用可以追溯到最为

自1664年奉国王的命令创立到1791年解体，法国东印度公司在法中贸易中发挥了最为重大的作用。与能够进入中国内地的传教士相反，外国商人们只被允许定居在广东省境内珠江沿岸的狭长地带，而且只能和清朝皇帝指定的汉人通商。下图这件彩釉瓷器展现了一条河岸的景色，沿岸排列着欧洲公司设在广东的办事处。







远古的时期。自17世纪末以来，带有雕刻或印制图案的镶金嵌珠的上漆家具和物件在法国就深受欢迎。为了满足这一需求，广东的手工艺艺人开始成批制作黑色底色金色图案的漆器。这一创意是借鉴了著名的被称为“科罗曼德”（de Coromandel）的屏风，“科罗曼德”这一称谓来源于这些屏风过境时经过的印度港口的名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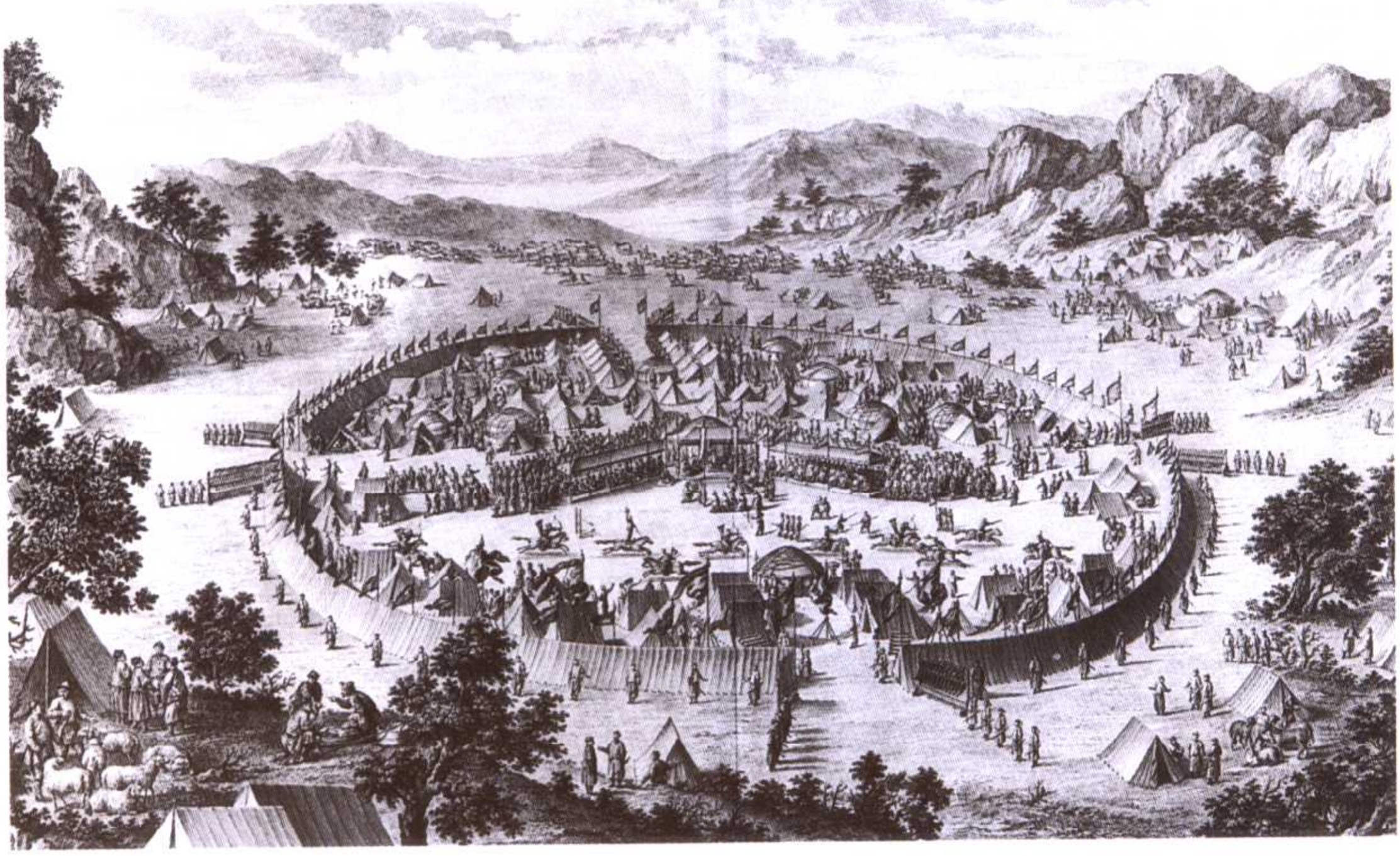
与此同时，法国的制造商也在寻找这种经不起出口运输的中国漆的替代品。18世纪中期由木器工人发明并以发明者姓氏命名的“马丹漆”（Vernis Martin）是所有“中国式”漆中最像中国漆的一种，因此也最受欢迎。今天在凡尔赛宫和许多王侯府第依然可见的大量黑漆和金漆的护墙板和装饰橱就证明了这一点。另外，自1730年起，人们就已习惯于在法国制造的家具上覆盖来自中国的彩饰漆板。

用于出口的中国瓷器制于景德镇，随后在广东按照欧洲人的喜好和要求装饰。饰有彩色图案和金色边纹衬托下的灰色浮雕质的宗教或神话场景的贵族纹章就这样从白瓷碗碟的式样中被或多或少地忠实再现了：右图，一只18世纪的碟子，底面绘有布列塔尼议会议员雅克-加布里埃尔·德法西（Jacques-Gabriel de Farcy）和卡特琳·杜波诺（Catherine du Bahuno）的婚姻纹章；左图，同一时期的一只茶碟，表现了耶稣会的创始人圣依纳爵·罗耀拉（saint Ignace de Loyola）。

艺术合作

耶稣会传教士借助于铜版画来使中国了解他们的宗教和文明。虽然中国的木刻术历史悠久，远远

早于欧洲，但中国人还是被他们所见到的铜版雕刻所刻画出的细腻的线条和入微的细节所吸引。这就是为什么乾隆皇帝命人在他北京的一处宫殿（紫光阁——译注）中绘制了16幅表现他新近平定回部地区的壁画后，在1765年决定把这些画的复制品远送



在法国刻版的《平定淮回两部得胜图》（下图，铜版画《拔达克山汗纳款》）使乾隆帝龙颜大悦而命人制作铜版副本以赐给清朝的达官显贵和装点官府公堂。他还命中国的雕刻师制作了纪念他征服中国其他周边地区的铜版画。在法国，这套铜版画也同样受欢迎，为了满足公众的要求，雕刻家埃尔曼（Helman）制作了《得胜图》系列的缩小的复制品。

欧洲刻版的原因。广东东印度公司的法国人操作得当，最终使这些画得以分批抵达巴黎。在夏尔-尼古拉·戈善（Charles-Nicolas Cochin）的组织领导下，一班著名的艺术家开始了这项工程：这可关系着法国的荣誉！按照预先的计划，印刷了200份《平定淮回两部得胜图》送给乾隆帝，余下的却瞒着乾隆印给了法国国王。

绘画技术方面的法中交流却较为有限。通过他们带来的宗教的和世俗的绘画，耶稣会传教士向中国展示了油画艺术，同时也显示了为中国画师所完全忽略，至少是极少被使用和赏识的明暗对比和远

景透视的绘画技巧。他们为中国皇帝绘制了一幅油画肖像，酷似本人，为人称道，但他们也不得不屈从于中国人的习惯只表现人物的面部，还要避免阴影，而且要按照中国的绘画方式，主要用水墨敷彩在绢上描绘风景、花卉和动物。“我的眼光和品位已经中国化了，”在做了几年中国宫廷画师后，画家王致诚不无悲伤地说到。中国绘画的技巧和基本要素耶稣会传教士虽有所认识但却从未加以重视，因此没能给18世纪法国的绘画艺术带来进一步的影响。



出生于法国多耳的耶稣会传教士王致诚（Jean-Denis Attiret）是1738至1769年乾隆帝钦点的画师，深受乾隆的赏识。应乾隆帝的要求，他作了宫廷中许多要人贵妇的肖像画（上图，一位嫔妃）及表现战争的画面。为了对他的服务表示感谢，乾隆帝要授予他官职，但他谢绝了。而在他之前的其他耶稣会传教士曾接受过这一荣誉。

中国园林深深吸引着法国

在建筑艺术方面，中国对法国的影响仅局限于某些建筑形式的借用，但中国园林艺术的影响却要深远得多。从17世纪起，在法国的园林中就可以发现中式风格的建筑，比如1670年路易十四命人在凡尔赛宫建造的瓷景特里阿农宫（le Trianon de Porcelaine）。但在18世纪下半叶引起对中国园林真正迷恋的是1743年王致诚的一封长信，信中极为详尽地描述了北京的皇家园林。与当时开始了解英国园林的风潮相结合，一种被称为“英华”式的新的



园林风格产生了，其中于1783至1786年间建于凡尔赛的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Antoinette）村就是这一风格的一个完美展现。

中国色彩不再仅仅表现在建筑物上。1770年在尚蒂伊（Chantilly）为孔代（Condé）亲王建造的楼阁，1775年舒瓦瑟尔（Choiseul）公爵命人在他靠近昂布瓦斯（Amboise）的香塔庐（Chanteloup）的领地上建造的宝塔，还有一年之后成为“雷斯荒漠”庄园（Désert de Retz）最宏伟建筑的德蒙维尔（de Monville）的“中国宫”（la Maison chinoise），这些固然都受到了中国建筑的影响而展现出中国艺术风格，但是从那以后，人们更为追求的是按照中国崇尚自然景色的艺术要求，通过运用或创造高低起伏的层次感和错综有致的假山和池塘，

18世纪末法国贵族对于“中国园林”的迷恋表达了他们对一种摆脱了繁文缛节的幸福而自由的生活方式的向往。在卡蒙太（Carmontelle）的这幅表现兰西（Raincy）公园的水彩画中，圆形的池塘、蜿蜒的小径、漫步的情侣、中式亭子下的山洞，一切都使人仿佛置身于一个与世隔绝的田园诗般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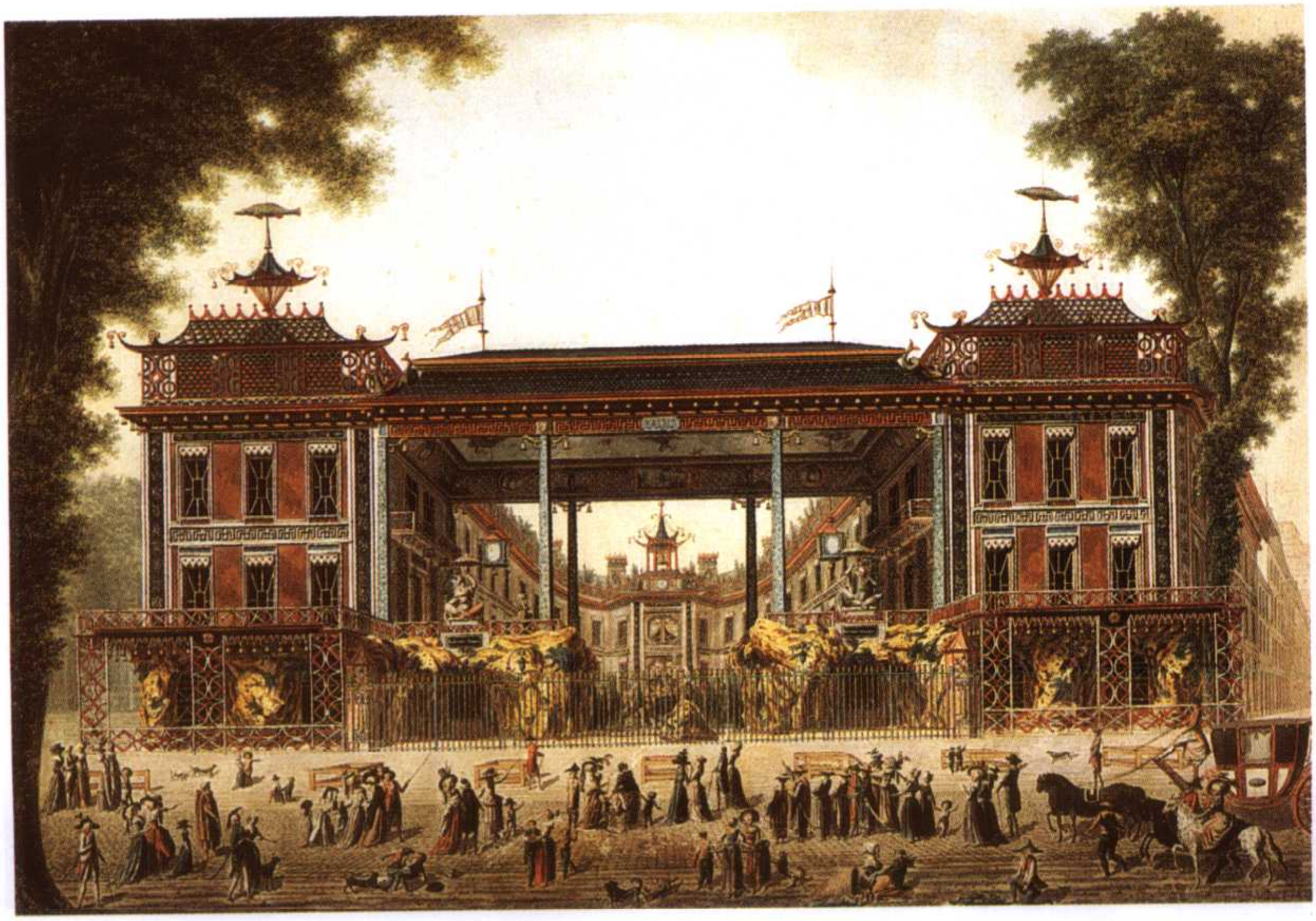
构造出一派天然的田园风光的迷人景色，任草木在其中自由生长。人们还进口了中国的植物及其种子，这就更给人以身临其境置身中国的感觉。

中国梦和中国热

由印度公司输入法国的中国产品和传教士所传布的信息渐渐影响了18世纪法国人的日常生活和品味。法国人醉心于所有的“中国货”：很快，他们的目标不再仅仅局限于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也指向了仿制中国商品的物品，甚至更为广泛，包括了一切具有能使人联想起精致、豪华、轻巧和新奇等被认为是中国这个遥远国度所特有的品质的东西。

在巴黎，中国商品专卖店出售各种各样的中国小摆设，不管是从中国进口的还是仿制的都同样抢手。“中国浴场”出现于18世纪末，其装饰也许并

位于意大利大街的“中国浴场”建于1792年，也是“中国热”风潮的产物。还曾有人为其赋诗一首：“多么奇妙的地方！不必走出巴黎，／就在皇宫剧院中，竟有中国女优：／一支来自北京的乐队，／响亮而夸张地，演奏着马丁（Martin）的独奏；／但在中国浴场，却是另一种巧妙：／从雅致的凉亭中勾勒出，／石膏岩堆下，／那优美的人工洞室的艺术构造。／如此巴黎的人们，在自家的门口，／拿着手杖就能到达广东。”



不是真正的中国式样，但的确具有东方风格。茶叶于17世纪被引入法国，起初被当作万灵药使用，到18世纪成为了一种日常饮料。

自古罗马时期就已闻名的中国丝绸依然广受欢迎，但是它受到了新出现的织物的挑战。这些新织物一般都是法国本土制造因而价格低廉。它们以原产地的名称命名："南京布"是一种常呈黄色的棉布，"北京布"实际上则是瓦朗斯（Valence）市特产的一种丝织品。自1730年起，"云纹"缎用于装饰风行一时，而按照中国提供的样品生产的彩色墙纸也取得了一次巨大的飞跃。

帷幔、挂毯、家具布、壁画、家具、彩陶、服装，渐渐地所有装饰艺术都被这股中国风所征服，



博韦(Beauvais)产的挂毯，取材于布歇的中国题材画〔下图，《梳妆》（La toilette)〕，曾被作为礼物送给乾隆皇帝。





在马恩河平原（Champs-sur-Marne）城堡的一个大厅的天花板上装饰着壁画《猴群图》（grande singerie）（上图），画中敲三角铁的中国人只是众多装饰性因素之一。

争先恐后地仿制起那些最为著名的画家和装饰艺术家创制的花样和图案。安托万·瓦托（Antoine Watteau）是最早为中国题材所吸引的画家之一：他于约1700年为拉谟埃（la Muette）宫的国王书房绘制了多幅各异的“汉人和鞑靼人”的画像，这些画像后被镌版而广为人知。弗朗索瓦·布歇（François Boucher）也迎合当时的风尚，画了两个系列的中国人物情景画，这些画被博韦的挂毯工场再现于挂毯上，稍做改动后又出现在奥碧松（Aubusson）的挂毯上。让·辟尔文（Jean Pillement）和让-巴蒂斯特·于埃（Jean-Baptiste Huet）因他们的所谓“中国式”的装饰图案集而出了名，所有的装饰艺术都从他们的图案集中找到了灵感，获得了启发。



Vn Chinois dansant à l'Opera.

中国人充斥于戏剧和文学作品

对于中国戏剧，这里指的是带有唱、舞和音乐

伴奏的完整的戏剧，耶稣会传教士只介绍了18世纪马若瑟（de Prémare）神甫翻译的《赵氏孤儿》剧本的片段，而且还删去了其中的唱段。伏尔泰（Voltaire）曾根据这一剧本创作了一出五幕悲剧《中国孤儿》（L'Orphelin de la Chine）（1755），但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较其原型都未能有大的创新，因而没什么可看性。然而其意义在于伏尔泰在剧中赞扬了中国所具有的其邻国无法比拟的道德方面的优越。相反，在18世纪大量存在的其他受到中国影响的戏剧（喜剧、歌剧、笑剧或芭蕾舞剧）中，如《中国国王》（Le Roi de la Chine）（1700）、《受法国教养的中国人》（Le Chinois poli par la France）（1754）和《中国婚礼》（Les Noces chinoises）（1772），却把一个个凭空想象出来的中国人搬上了舞台，他们的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奇遇只是为了找机会炫耀一下迷人的布景和奢华的服装罢了。



伏尔泰认为悲剧是文学的最高艺术形态，并希望能以他的戏剧作品而留名于后世。然而他的剧本《中国孤儿》并未取得预期的成功：这个剧本只在法兰西剧院上演了16次，在宫廷里也演过几次，此外就只是在个人家中被诵读〔上图，在热夫林（Geoffrin）夫人的沙龙上〕，后来也仅仅于1964年中法建交时在法兰西喜剧院被重演。1990年在中国的天津再次演出了这一剧目，当时伏尔泰的《中国孤儿》和它的中国原型《赵氏孤儿》被一幕幕地交替上演。

耶稣会传教士的中国：一幅理想化的景象

北京法国传教团的耶稣会传教士在与欧洲学界进行大量书信往来的同时，也与他们的上级修道会会长和王国要人保持着广泛的联系，期望能够得到他们给予的财政和政治上的支持。这些私人信件后被公诸于世，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1702至1776年分卷出版的《耶稣会士书简集》（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大量的其他作品——合集或个人著作——使法国公众逐渐熟知了中国文明的方方面面。



从这些多方面的论述中产生了一个对于中国的正面的印象。其中的清王朝是以一个强大而繁荣的王国形象而出现的，它由一个开明的君主统治，辅佐以一个因才施用的官员团体。中国的人民正直有德，社会文明开化，儒家学说也被认为是一种一神论宗教，它不掺杂有任何道教和佛教所鼓励的迷信和偶像崇拜，后两者则因此而受到指责。这一理想形象的首要目的是表明耶稣会传教士福音传教政策成功的可能性，然而反常的是，它实际上却为哲学家们做好了再次向天主教和君权神授提出质疑的准备。

被耶稣会传教士表现为道德典范的孔子（上图）是17世纪关于道德根基争论的中心。费内隆在其《死者的对话》（Dialogues des morts）中让孔子和苏格拉底（Socrate）交谈，目的是对“被如此夸赞的中国人的优越性”提出质疑。与之相反，在自由思想家拉莫特·勒瓦耶（La Mothe Le Vayer）的《论异教徒的道德》（La vertu des païens）一书中，孔子又成了美德并非基督教所独有的明证。

基督教的根基受到了动摇

中国文明的发现在法国思想家中间引起了极大



中国皇帝（上图，雍正皇帝，康熙皇帝的继位者，在王公大臣的簇拥下）在每年春天都要举行籍田仪式，这是与皇帝作为时间和空间的主宰这一职能相联系的：在象征着土地的农庙的圣地上开出第一条沟犁的同时，皇帝走近了土壤及其产物，并宣告了耕期的开始。但此举经耶稣会传教士用版画的形式加以推广后，其关注的焦点转移到了皇帝为其臣民谋福利这一点上。

的震动，并使他们中的一些开始怀疑基督教的普遍性。以下两个发现可谓惊天动地：一个是由天文观察所证实的中国悠久的历史与圣经年表完全相悖；另一个是中国人的道德品质并不是在任何神的启示之下形成的。一些被称为“索隐派”（figuristes）的耶稣会会士，以白晋神甫为代表，试图根据某些汉字符号的书写法来证明中国的哲学和历史书籍中留有的某些被遗忘的远古神示的痕迹。但是大多数耶稣会会士自己也承认，这种假设几乎是不经一驳的。中国的情况使帕斯卡（Pascal）在他的《沉思录》（Pensées）中自问：“两者中哪一个更为可信？是摩西（Moïse）还是中国？”

推崇中国者和反对中国者互相对峙

将近18世纪中叶，耶稣会传教士所提供的关于中国的信息开始受到航海家们见闻的异议。在后者



这幅图为法国重农主义者所有，其目的是为他们所设想的以农业为基础的家长式政权辩护。他们还建议国王路易十五像中国皇帝那样举行春耕籍田仪式。看到路易十五并未遵从他们的政策，他们便把希望寄托于王太子路易十六的身上。此图表现了正在驾犁的路易十六，以达到宣传他们政策的目的。但是这些重农主义者所倡导的中国模式已不再适应18世纪末法国的经济状况，当时的法国已经进入了工业时代。

看来，中国远没有前者所说的那么好。按照各人所引证观点的不同，启蒙思想家或是把中国作为典范或是仅以之作为陪衬。

对中国推崇最力的要数伏尔泰。他认为中国是“全世界最智慧、最文明的国家”。在他的《风俗论》(1756）一书中，人类的历史是以中国的历史开始的，被他称为“文人的宗教”的儒教对他来说就是他所由衷期望的理性宗教的典范。他把宽容的康熙帝和在他看来应受谴责的法国国王相对比，前者能容纳所有的宗教，只要伦理道德和社会治安不受妨害，而后者却在废除南特城敕令（1598年国王亨利四世在南特城颁布的宗教宽容法令，对信奉基督教新教的臣民允予广泛的宗教自由和公民权利。该敕令后为路易十四于1685年撤消。——译注）一事上毫不让步。他还觉得建立在才能而不是金钱或出身基础之上的科举制度是对皇权的最佳制衡。



19世纪下半叶，中国成为法帝国主义为其正处于飞速发展中的工商业寻求销售市场所瞄准的目标。不断出现的冲突使两国互相对立而对于文化交流几乎毫无益处。当法国自认为在中国完成了一次“传播文明的使命”时，中国却只在法国对其实施的暴行中看到了“野蛮”的表现。

第二章

对话中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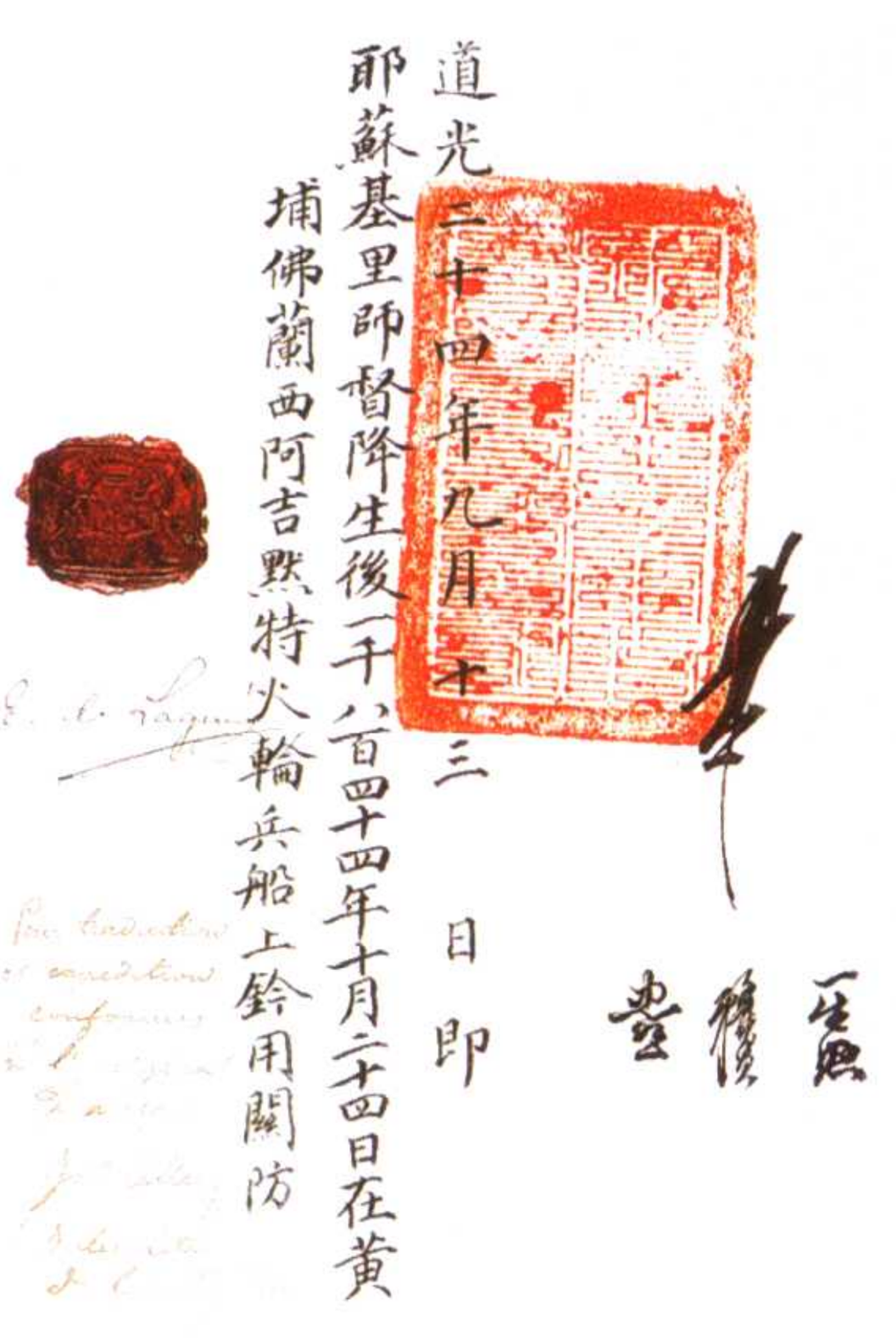
表面上看，19世纪末法国驻南部中国领事方苏雅（Auguste François）（图左）与广西提督苏元春毫无共同之处，只有一点除外，那就是他们都确信自己代表着一个对对方无所企图的国家。



对中国的殖民企图

16世纪末，正当英国、荷兰和俄国向北京派驻使馆以图获取商业利益之际，法国正饱受着革命风暴之苦，随后又卷入了拿破仑战争，暂时无暇顾及中国，中国也因此在法国重归于想象领域。然而重获和平后不久即取得的工业和经济上的发展促使法国从“七月王朝”（1830—1848）开始，采取了与其他欧洲列强竞争的殖民政策。而当时的中国在政治、社会和经济等方面内部矛盾重重却又拥有巨大的人力和物质资源，因此引起了法国的觊觎。

1839年，英国为取得在中国的自由贸易权而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战争结束后，并未参战的法国从中看到了可乘之机，于1844年与天朝（过去外国人对封建时代中国的称呼——译注）签订了两国间第一个正式条约。如同两年前英国人签订的《南京条约》一样，《黄埔条约》为法国人在中国沿海打开了五个通商口岸（广东、上海、福州、厦门和宁波）。尤其是从第二次鸦片战争（1857—1860）起，法国联合英国，真正开始在中国施行帝国主义政策。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他们的这一胜利迫使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不再把外国当作朝贡国并与之建立了永久的外交关系。1884—1885年，中国在抗击法国军队的战斗中的再次失利最终葬送了旧的朝贡体系，因为这次战败使中国被迫向法国让出了占有安南和东京湾的权利，法国由此扩大了



1844年10月24日签订于广东的《黄埔条约》（下图），由在条约谈判期间担任翻译的传教士范尚人（Callery）从法文译成中文。左边是法国使团长刺萼尼（Théodose de Lagrené）的印章，右边则是代表满清政府的官员耆英的官印。

其在印度支那的势力（法国于1859年起占领了交趾支那）。从此法国将中国西南视为其对交趾支那占有的延伸而小心地捍卫起自己的“势力范围”，戒备着其他外国列强的野心。



上海的法租界：“法国的一隅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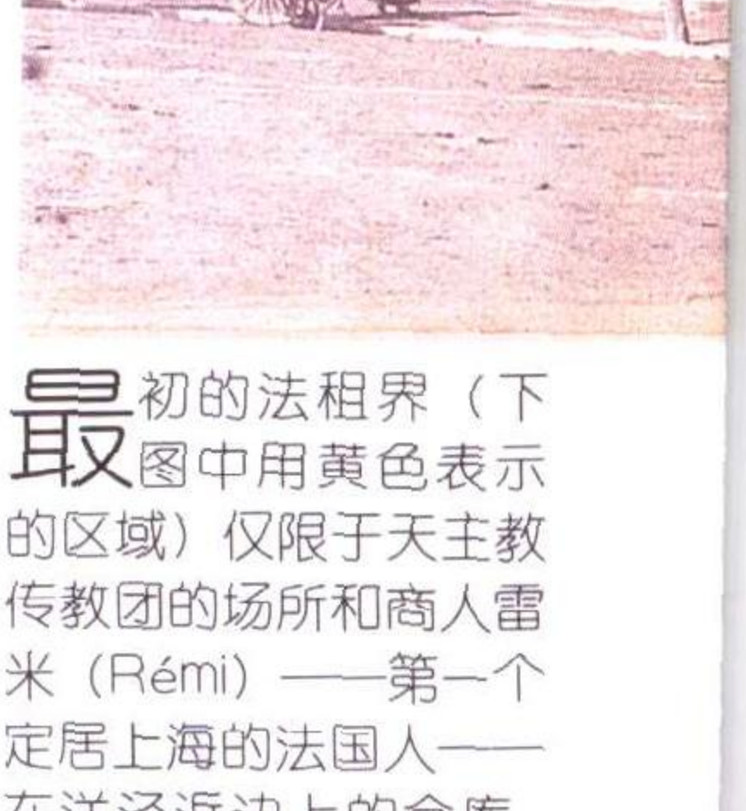
这些“不平等条约”迫使中国允许西洋人在一些城市中被称为“租界”的地域内定居，在租界内外国人享有治外法权而不受中国司法裁判的管辖。法国的外交官、商人、军人和传教士大量涌入法租界，逐渐创造出他们所熟悉的环境。就这样，法国在广东、天津、厦门、汉口，尤其是上海等城市的中心建立起了名副其实的“国中之国”，甜蜜地实现了它在中国的殖民梦。

1848年，敏体尼（Charles de Montigny）偕同全家来到上海，目的是在这里建立法国领事馆。他和少数商人、冒险家一起，住在位于英租界、黄浦江和中国城区之间的肮脏的狭长地带。在他的努力下，法租界渐渐发展起来。当1863年美、英租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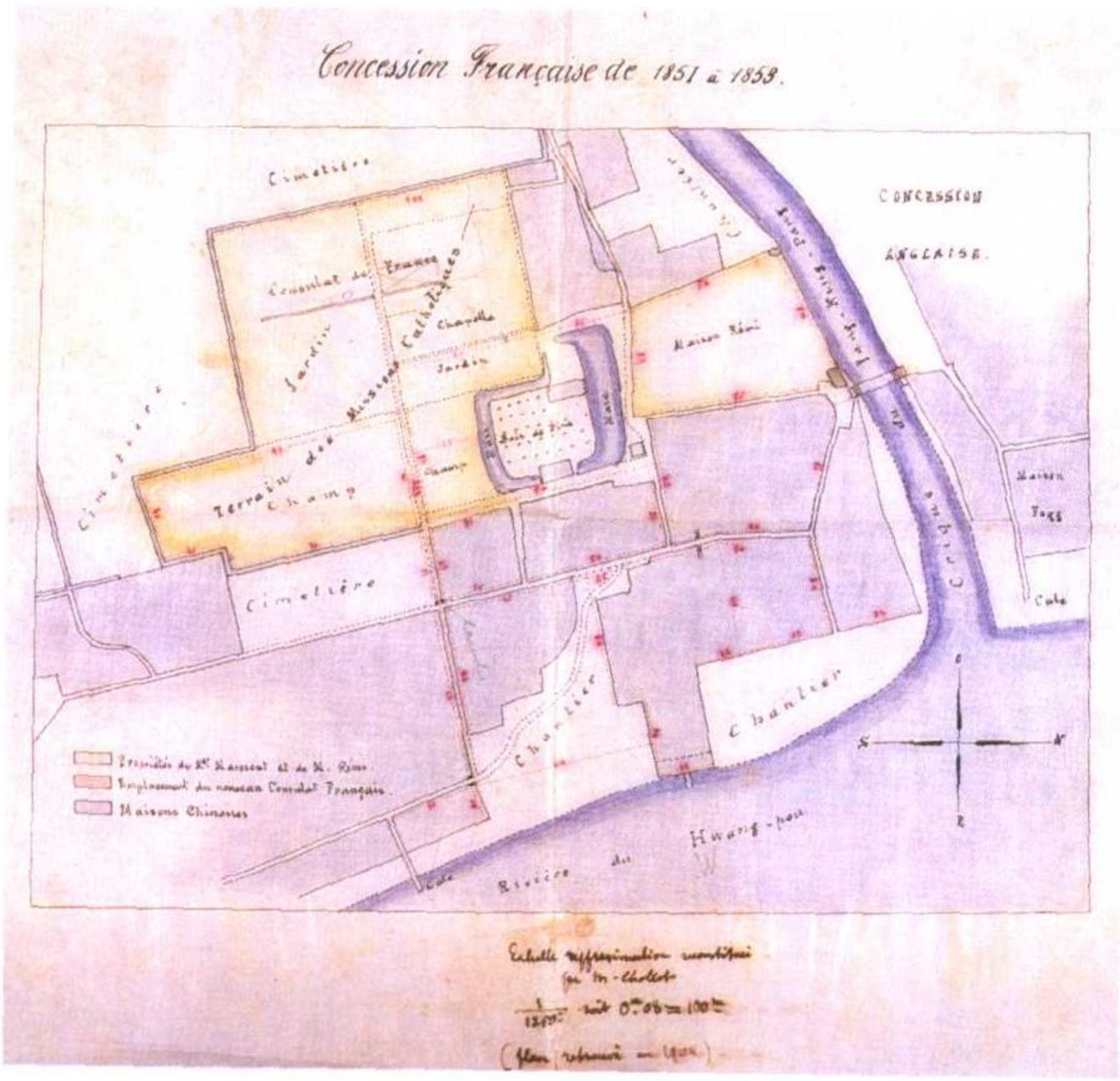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有一些英国人和法国人被中国军队捕获，其中很多人因受到虐待而死去。在法国，这段悲剧使人们认为中国人极为残暴，以致于《插图》（L’Illust-ration）把进入北京（上图，版画）想象成是以激烈的战斗为代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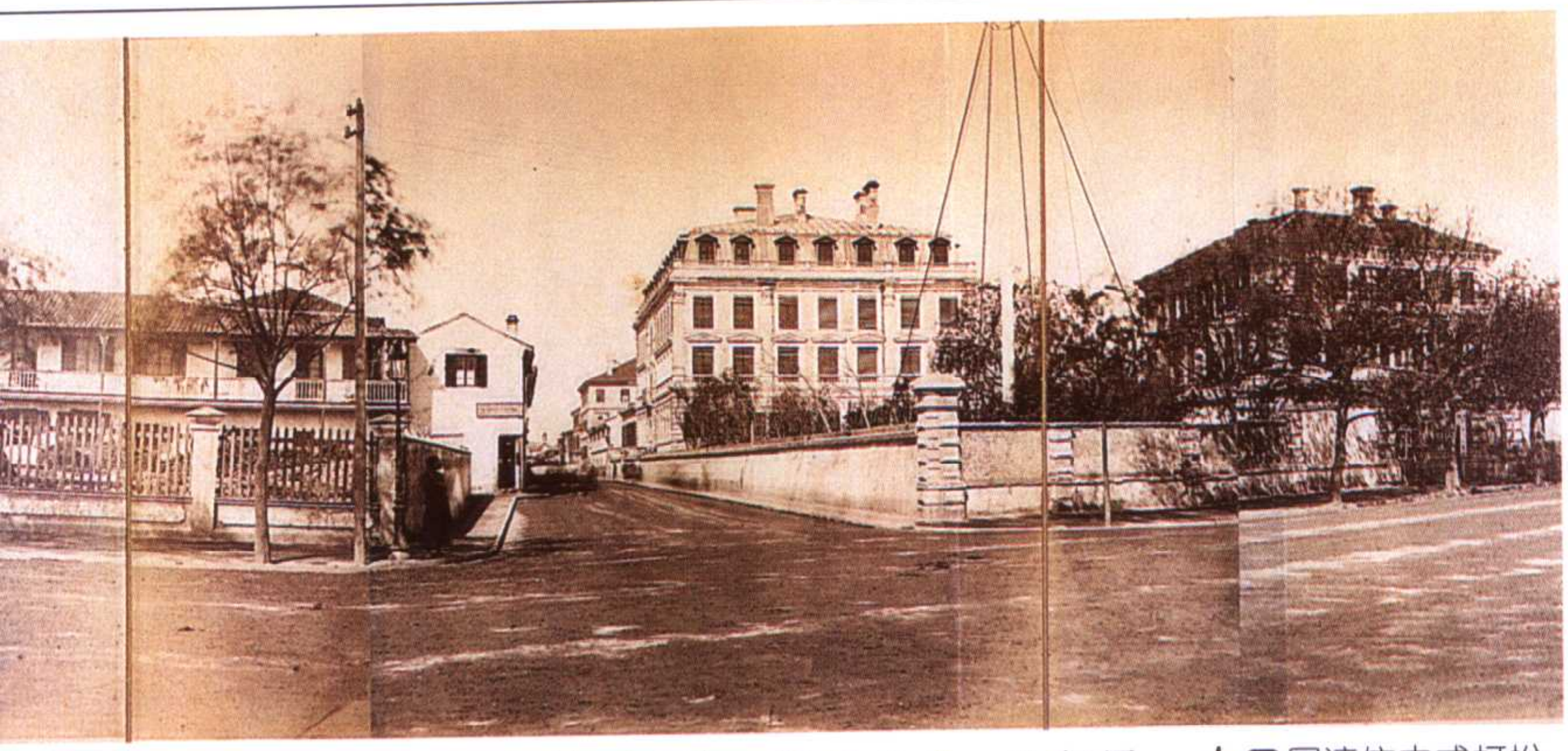
决定合并时，法租界选择了保持自治并建立起殖民型的治理模式。几十年后，一座典型的法国城市诞生了。它有着自己的市政大厦、教堂、花园别墅和林荫大道，路边种植着从巴黎引进的法国梧桐。但与集中了所有商业活动的国际租界（美、英租界合并后的公共租界——译注）相比，法租界在19世纪末仍然只像是一个外省城市，并非十分活跃。

然而，法国人试图使他们的租界成为其文明和进步的展台：法租界第一个配备了当时最为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和设备，如自来水、有轨电车，以及起先为煤气照明后来改用电气照明的公共照明设施。它还推行积极的文化政策，组织演出和联欢，邀请知名的艺术家和建筑师，并促进学校和医院的创办。这些措施帮助上海赢得了“东方巴黎”的美誉。诚然，从这一切中首先获益的是居住在租界中的法国



最初的法租界（下图中用黄色表示的区域）仅限于天主教传教团的场所和商人雷米（Rémi）——第一个定居上海的法国人——在洋泾浜边上的仓库。与英租界不同，它在黄浦江上只于东面有一个狭小的出口。但是很快它就发展壮大，尤其是向西面扩张，在中国人的地基上修建了街道和房屋，这有时候会引起与当地居民之间的冲突。这张全景照片（上图）展现了法国领事馆所在地以及通往它的领馆路（la rue du Consulat）：路右是总领事馆（建成于1867年），路左是法国邮船公司（Messageries maritimes）办事处。





如同这位中式打扮，坐在装点着中国工艺品的小客厅中的贵妇人一样，对于中国，大多数法国人眼中只有异国情调的装饰而已。

人和外国人，但他们并不是唯一的受益者：法租界中的大部分人口实际上是由中国人构成的，很多中国人就是到这里来寻求安全和舒适的。但是，中国人和外国人毕竟属于两个不同的团体，即使双方都能在与对方的共同生活中获益，两者也几乎不会互相融合，更不会出现当地居民由反对转而支持外来者的情况。法租界最终甚至还会发现，当地居民在其内部进行着有损其利益的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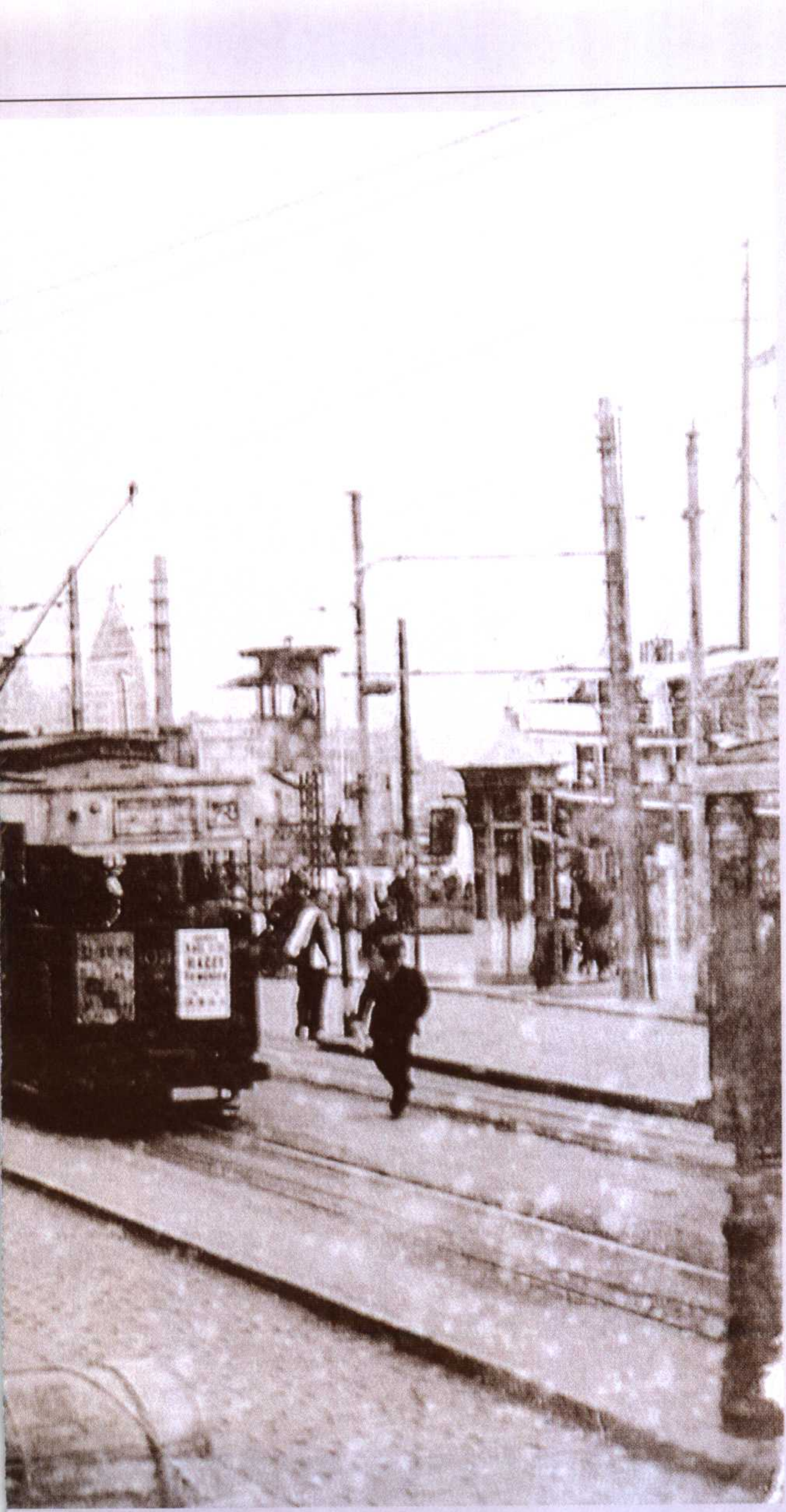


法国对天主教传教团的保护：军队与教会的联合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法国传教士再次来到中国，并毫不犹豫地将活动范围扩大到他们被授权的五个通商口岸之外。1860年，法国取得了在整个中国自由传教的权利，从此，在法国的庇护下，



由数家法国银行于1906年出资创办的上海法商电车电灯公司（La Compagnie français de tranways et d'éclairage électriques de Shanghai）经营着法租界内的三大市政服务：电力、交通和供水。公司成立后五年，已有五条线路的有轨电车投入运行，通达由南到北，从东边的法国领事馆所在地（侧图）到西边的徐家汇的整个法租界。徐家汇耶稣会传教士的观象台还提供另一项有利于远东航海船队的公共服务：气象和台风预报。必要时，这里每天收集到的信息会被传送到位于法国领事馆所在地的信号台，在图左的远景中可以看见这一装置。



Compagnie Française de Tramways
et D'Eclairage Electriques de Shanghai
Concessionnaire du Service des Eaux

TRAMWAYS ELECTRIQUES.
Réseau de la Concession française.

ECLAIRAGE ELECTRIQUE.
Usine centrale à Lokawei.
Nouvelle centrale électrique à moteurs Diesel en construction.

EAUX.
Usine élévatoire à Tsaokadou.
Travaux d'agrandissements en cours.

DIRECTION LOCALE DE SHANGHAI :
227 Avenue Dubail.
SIEGE SOCIAL ET DIRECTION GENERALE :
5, rue Chauchat, PARIS.







PATISSERIE—CONFISERIE MARCEL
RESTAURANT
198 Nanking Road

COTY
PRÉSENTE SES CRÉATIONS NOUVELLES
LA JACÉE
L'ÉMERAUDE
PARIS
Ses CRÈMES
Ses ROUGES POUR LES LÈVRES
Sa POUDRE "APRES LE BAIN"
Sa LOTION DU DR. RUSQUET
Blanches ou Roses
Blanc "OLYMPIC" (Création 1927)
(Nouvelle Création)
Ses PARFUMS— L'Origan, La Rose Jacqueminot, L'Or, Styx, L'Ambre Antique, L'Effleurt, Le Muguet, Chypre, Le Jasmin de Corse, Violette, Hélicotrope, La Jonquille, Le Lilas Blanc, Ixia, L'Oeillet Fleuri, Ambrée, Le Lilas Pourpre.
Ses POUDRES DE RIZ - Ses LOTIONS - Ses EAUX DE TOILETTE
et son EAU DE COTY.
CANIDROME
CE SOIR à 20 HRES. 30
La prochaine réunion après celle de ce soir aura lieu
MERCREDI, 1er Novembre à 20h.30.
3141



除了与黄包车夫的带有异域风情的接触（左上图）外，在上海的法国人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于中国。就如同在巴黎一样，他们把时间都用于在时装店和奢侈品商店里购物[右上图，《申报》上的一则科蒂（Coty）香水的广告]，在咖啡馆和茶点铺内闲谈［上中图，马塞尔面包糕点店(la Maison Marcel)]，以及去跑马场和跑狗场参加社交活动（下图）。



法国传教士不仅在沿海大城市，更是在偏远的省份和乡村大量定居。到1885年前后，全中国已经有约600位天主教传教士，其中大部分是法国人，还有约50万的中国教徒。他们到处购买土地建造礼拜堂、弃儿收容所、救治穷人的诊所、培养本地教士的修道院，以及给予女孩和男孩同等教育的学校。

耶稣会一经恢复就在中国重又站稳了脚跟。和过去一样，耶稣会传教士为推动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展现出非凡的才能。早在17世纪，耶稣会传教士就在上海南部的徐家汇创立了一个基督教修会。此时，他们又在那里兴建了一座名副其实的小城，后人称之为“远东的梵蒂冈”，足见其影响之深，声誉之盛。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传教士都具有适应意识，他们也并非都对允许耶稣会传教士融入其社会的中国有正确的认识。有些传教士肆无忌惮，显得既傲慢又偏执，这引起了当地居民对他们的敌意。而使

由于有了法国给予天主教传教士的保护，从19世纪中叶起开始有修女在中国定居。在她们的善行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她们收养那些一出生就被遗弃的小女孩，给予她们宗教教育，传授她们一技之长，如果女孩长大后不愿当修女，还可以从她们那里得到一笔嫁妆以供出嫁。修女们还有偿地为欧洲少女和中国的名门闺秀提供教育，教她们学习西方艺术和礼仪，如在广东的这个音乐课堂上（上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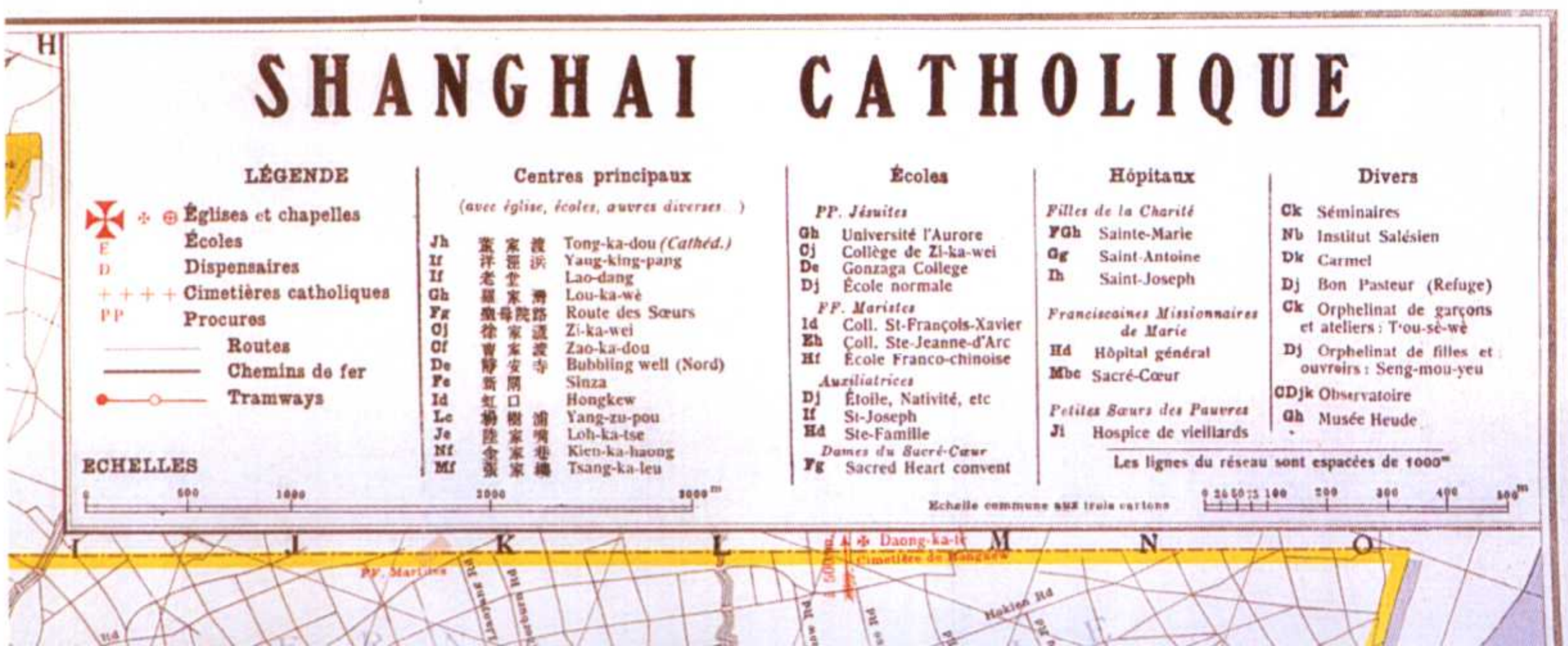
徒的虔诚使另一些传教士不惜以身犯险甚至殉教。因此冲突并不罕见，有时还会酿成悲剧。1870年，在天津，愤怒的人群洗劫了“仁慈堂”孤儿院(l'orph-elinat de Saint—Vincent—de—Paul)，并屠杀了孤儿院的修女，他们指责这些修女诱拐小孩，挖他们的眼睛制药。擅自垄断对在中国的天主教徒的保护权的法国每一次都以武力手段作为回应。这种“炮舰政策”只会增加中国人民对于法国传教士和法兰西共和国代表的敌意。



和他们的前辈一样，19世纪的传教士在没有希望使清朝高官改信基督教的情况下，转而试图以他们的善行和布道来吸引中国的平民百姓（上图，中国的守护天使）。从下图中可以看出上海天主教机构的众多。

对中国皇家珍宝的掠夺

1860年，法军司令孟托班（Cousin de Montauban）将军在八里桥赢得了决定性的一战后（此战的胜利使他获得了“八里桥伯爵”的封号），于10月7日占领了圆明园。他惊奇地发现，在这个仅驻有几个满洲骑兵的几乎不设防的地方，竟然有如此多的奇珍异宝。正如法军随军书记代里松(d'Hérisson）伯爵后来写道，法国人“眼花缭乱，如痴如醉”，他们“像疯了似的，满眼燃烧着的都



是这遍地的金银和珍宝”。英法两国统帅对财宝进行了划分，但是很快，无法克制自己贪婪的士兵们开始了野蛮的抢劫。在这场掠夺中遗失了无数的家具、挂毯、首饰、自鸣钟、丝绸、艺术品以及珍贵的书籍和各类档案。几天后，为了让中国政府接受联军的所有条件，英法下令火烧圆明园，最终使这一凝结着耶稣会传教士心血的亚洲奇迹化为了一片废墟。在法国，这一破坏艺术的行径遭到了强烈的谴责，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从他的流放地格恩济岛（Guernesey）向报界寄去了一封精彩的愤慨之信，信的结尾充满了讽刺：“这就是文明对野蛮的所作所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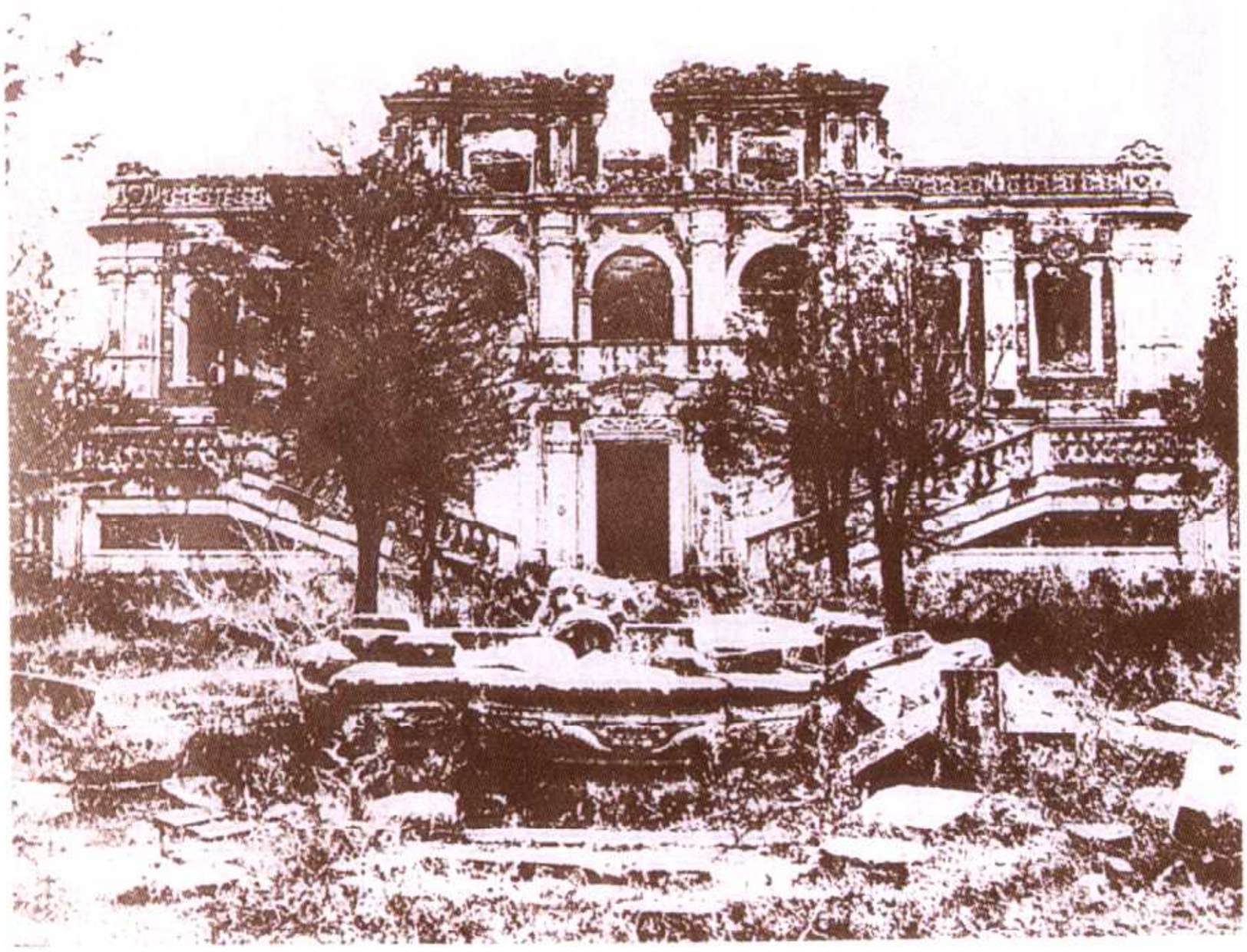
从掠夺到保存

1900年，西方国家的公使馆遭到了义和团民的围攻，他们的这种仇外情绪得到了清政府的支持。八国联军因此而占领了北京并一直攻入了紫禁城。清朝皇帝弃城逃跑，城内的财宝大部分被占领军掠走。就这样，大量从紫禁城中劫掠来的物品同被洗劫的圆明园的珍宝一样，出现于古玩店和拍卖行。

19世纪下半叶形成了数个大规模的中国艺术品收藏。经过旅居中国的法国人、艺术品商人和有钱的收藏家如亨利·塞尔尼希（Henri Cernuschi）与爱弥尔·吉梅的耐心搜集，这些收藏品出

爱弥尔·吉梅（Emile Guimet）自1879年起在里昂展出了他的东方收藏品，后来又于1889年在巴黎开办了一座博物馆（吉梅亚洲艺术博物馆——译注）。他尤其想要使法国公众了解亚洲的主要宗教，为此他重建庙宇内部结构，再现宗教仪式。下图中的这个场景表现了作为儒教基础的中国祭祖仪式，这一仪式在于用祭品祭奠刻有已故者姓名的祖先灵位。





1860年战争后，遭破坏的圆明园被废弃，“西洋楼”（侧图，谐奇趣）也再没有被修复。法军带回来的财宝中最珍贵的被献给了拿破仑三世。1863年，欧也妮（Eugénie）皇后决定把这些珍宝陈列于由建筑师亚历克西·帕卡尔(Alexis Paccard)专门为此而布置的枫丹白露宫的大厅中（下图），组织政府官员参观。直到第三共和国时期，这座“中国馆”才向公众开放。中国艺术品被杂乱地堆放于其中，占满了每一寸空间，丝毫没有考虑到它们的材质、功用和制作年代。



现于公共博物馆，其中一些有所改动。这表现出继承自启蒙时期的对于中国艺术品的痴迷。然而启蒙时期对同时代的中国充满钦佩，此时却只是保留着对往日中国的赞美而认为如今的中国正处于衰退之中，已无力保护自己的遗产：对中国艺术品的猎取在这里找到了为自己辩护的理由。

19世纪下半叶，万国博览会成为了巴黎的特权，差不多每隔十年就举办一次。博览会上中国展品所受到的欢迎也表现出这种对于中国的复杂感情：既为中国艺术所吸引，又对中国充满无知和蔑视。在这几届博览会中，代表中国的是法国建筑师的作品——1867年受圆明园风格影响的茶亭、1900年模仿紫禁城的“黑龙殿”（palais du Dragon Noir）——

和专门为迎合欧洲人的喜好而制作的精致稀奇的小玩意，而真正的中国艺术杰作却鲜为人知。

“黄祸”对“洋鬼子”：两国大众想象中的对方形象

在当时的通俗文学、报刊、小说和戏剧中，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与其在18世纪法国作家们笔下时大相径庭。这种形象以旅行家的记述为依据，而这些旅行家对于中国的看法往往受到殖民主义偏见的局限和歪曲。在19世纪法国大众的想象中，中国人粗鲁、奸诈、虚伪，他们沉溺于吸食鸦片，只讲究酷刑和吃喝。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在《八十天环游地球》（Le tour du monde en quatre-vingts jours）（1873）一书中，惟独选取了一个抽大烟的病夫作为中国人的典型来加以描写。如果说他的《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苦难》（Les tribulations d’un Chinois en Chine）中的人物金福（音，Kin-Fo）可以算做英雄的话，那也是因为在接受了西方教育后，他已不再完全是中国人了。同样，保尔·迪瓦（Paul d’Ivoi）在《蝉在中国》（Cigale en Chine）一书中也通过其中的人物花芦（Roseau-fleuri）让人看到了法国文明传播的影响。这位满族公主在义和团



特罗卡代罗的中式楼阁

在1900年特罗卡代罗（Trocadéro）万国博览会上，代表中国的是模仿紫禁城的“黑龙殿”。作为八国联军为解救受义和团围攻的公使馆而攻占北京这一事件的同时期产物，这一仿制品作为一种象征性的占有，正符合列强“瓜分中国”政策的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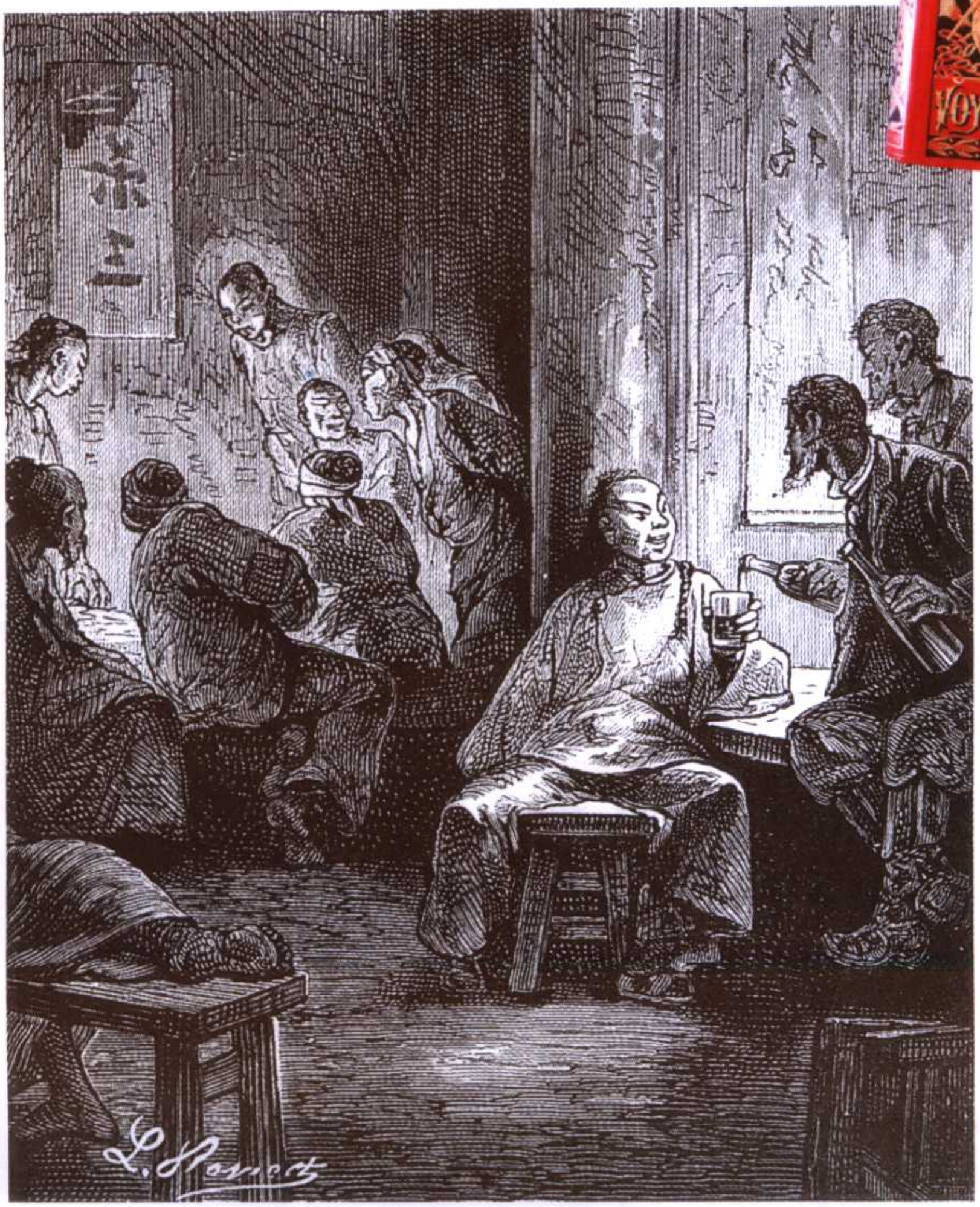
运动时期使自己拥有了“基督徒的灵魂”，从而赢得了一位法国军官的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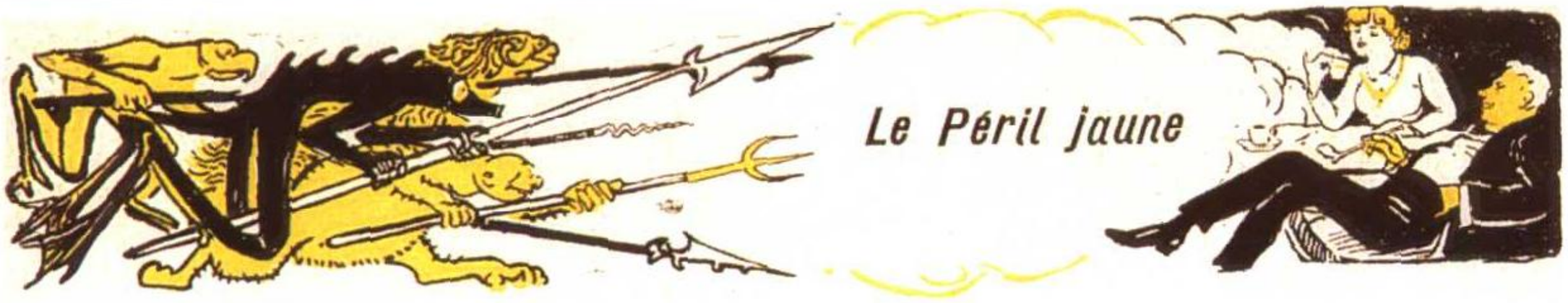
这种对中国人形象的极力贬低内在地拔高了法国人的自我形象。当时的一些思想家如德·戈宾诺（de Gobineau）伯爵和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提出的关于“种族不平等”的伪科学论更强化了这一点。

与带有保守主义和蒙昧主义特征的中国文明相对立的是进步和理性的文明。在19、20世纪之交的流行小说如当利（Danrit）上尉的《黄祸入侵》（L’Invasion jaune）（1904）中，这种对立

《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苦难》讲述了一个已十分西化的有钱的上海人在发现他无法自由支配自己的生活时是如何适应的。与这一正面人物形成对比的是他的用人宋（Soun）。宋的身上集中了一切被认为是中国人所具有的毛病：“心不在焉、缺乏条理、笨手笨脚、不善言辞、讲究吃喝、胆小怕事”，是“一个十足的小丑”。负责监视其主人的那两个美国人格雷（Graig）和弗赖伊（Fry）毫不费力地就收买了他（侧图），因为“宋是一个禁不起银两甚至是几杯美国甜酒诱惑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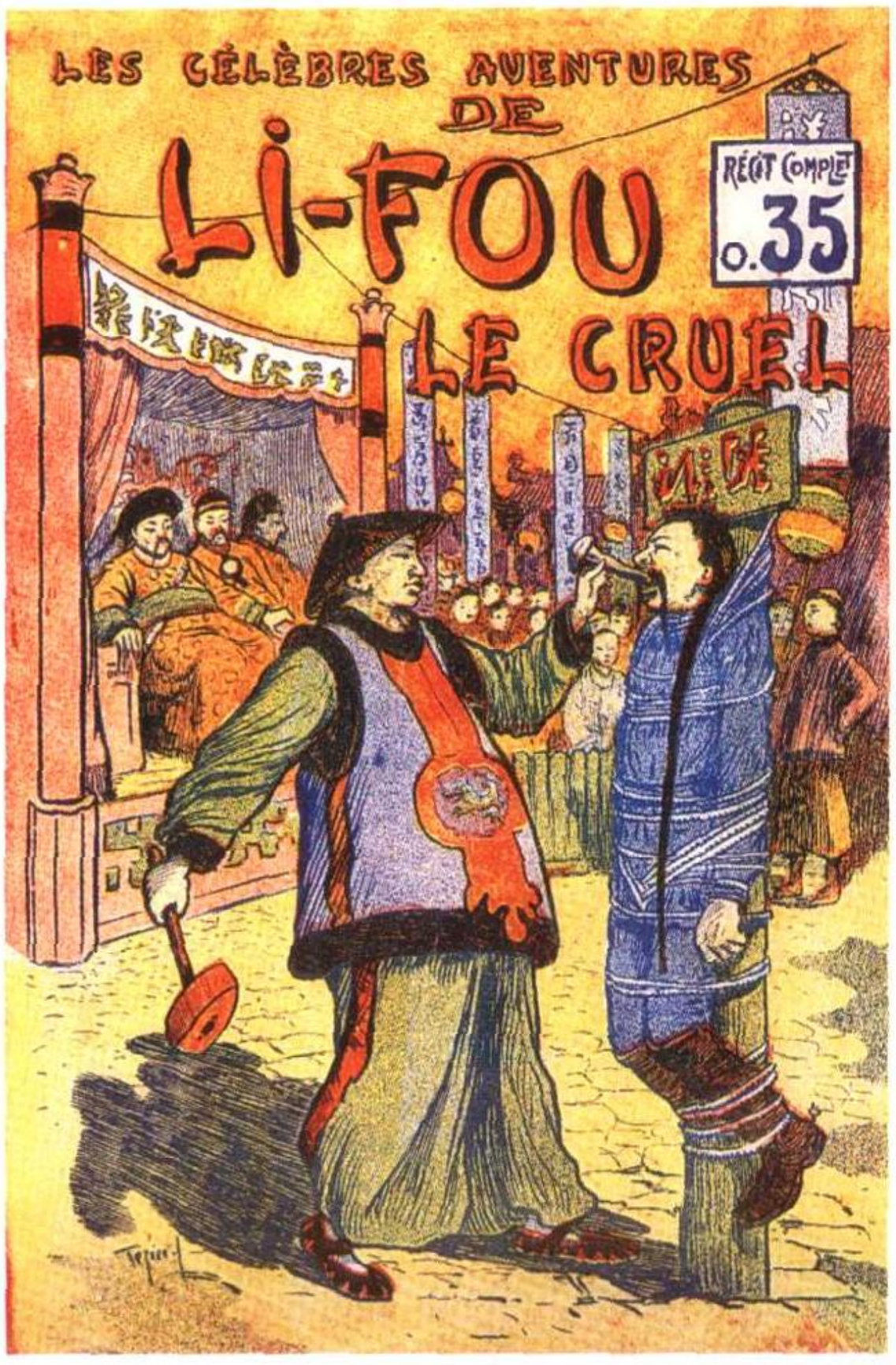




表现为所有黄种人对白种人的武装斗争的形式。透过在法国广泛流传的关于“黄祸”的无稽之谈，表现出法国害怕看到自己曾经试图征服的人民拿着自己提供给他们的武器反过来攻击自己。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对法国的殖民政策的再次质疑已初露端倪：中国的反抗能力已经使一些人想到建立在“门户开放”原则之上的合作政策或许比使用武力更为可取。

与西方对中国人的成见相对应，在中国西方人通常被称为“洋鬼子”。中国大众以这一称呼表达了对于超出了他们所唯一承认的中华文明的人的轻蔑和惧怕。比起直到19世纪末才开始关注“蛮夷”的文人文学，洋人的形象更多地出现于新兴刊物和通俗文学中，一般还带有插图。其中法国并没有受到特殊对待，除了在1870年天津事件和1884—1885年中法战争的背景下所涌现出的反基督教的宣传册中。

如果说激起“黄祸”恐惧的中国人残暴的主题出自西方人游历中国后带回来的有关斩首和其他酷刑的描述和照片，那么在西方人的想象中其残暴程度必定达到甚至超出了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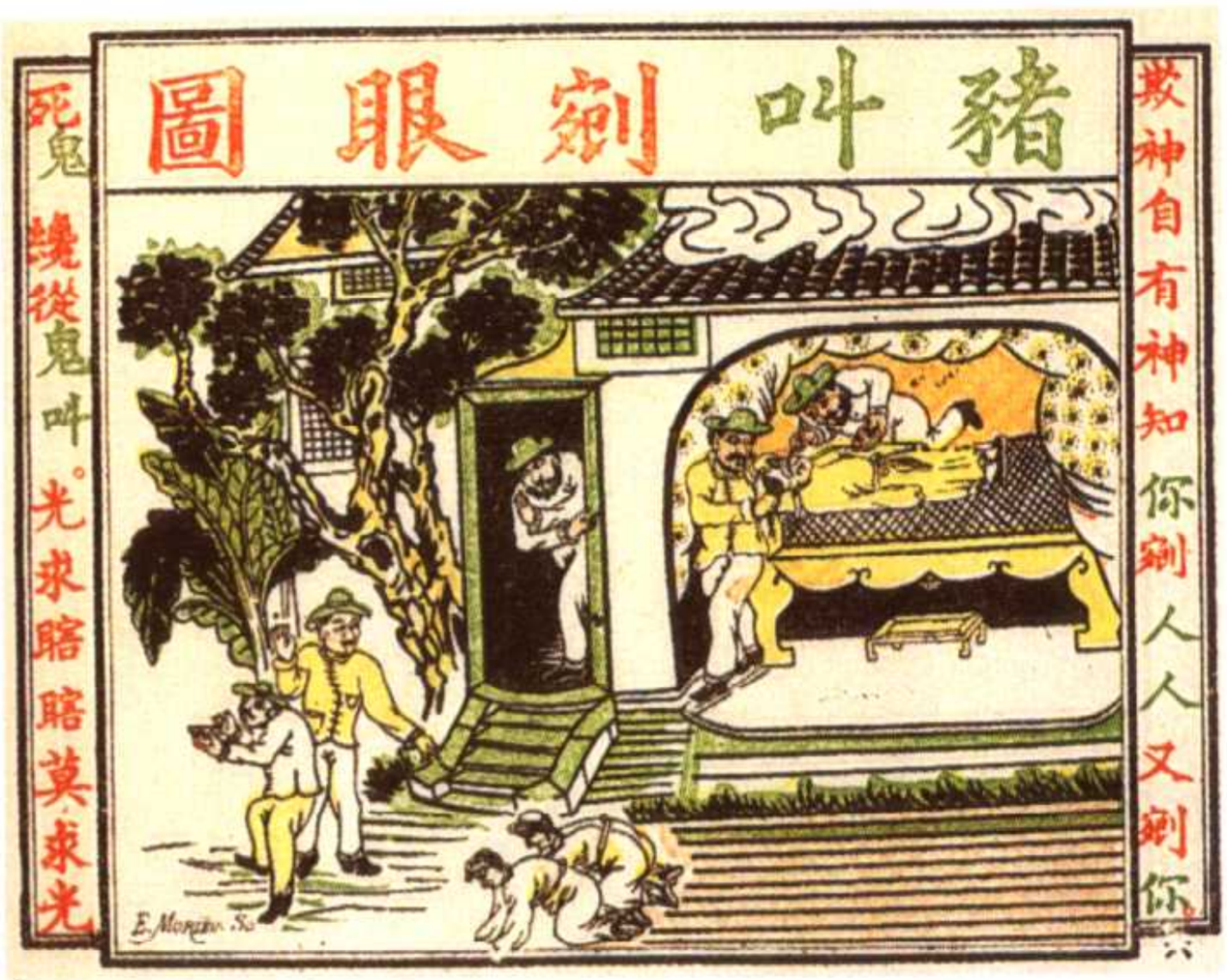


是了解还是征服对方：法国汉学的萌芽

法国是第一个拥有负责研究“中国事务”机构的欧洲国家。从1814年开始，法国政府在法兰西学院设立了“汉、鞑靼、满语言

文学的教授席位”，先后由雷慕沙（Abel Rémusat）、儒莲（Stanislas Julien）和圣德尼（Hervry-Saint-Denys）三位汉学家担任。但是这三位从未去过中国而且几乎只教习文言文。正因如此，东方语言学校又于1843年设立了现代汉语的教授席位，其目的是讲授汉语口语和同时代的中国文明。自1870年起，汉语教师得到了来自中国本土的家庭教师的协助，他们大都是由传教士带来法国的，如得到戴奥菲尔·戈蒂埃（Théophile Gautier）保护的丁堂林（音，Ting Tun-ling）。直到19世纪末，每年毕业于东方语言学校汉语专业的学生仍屈指可数，但这一数量已足够满足为法国外交部提供译员的需要。





反基督教宣传主要是通过通俗版画——连环画的前身来表现：上图，表现于动物头脸下的基督教传教士遭受酷刑，以使他们不敢再来中国；下图，外国人对中国人施以挖眼酷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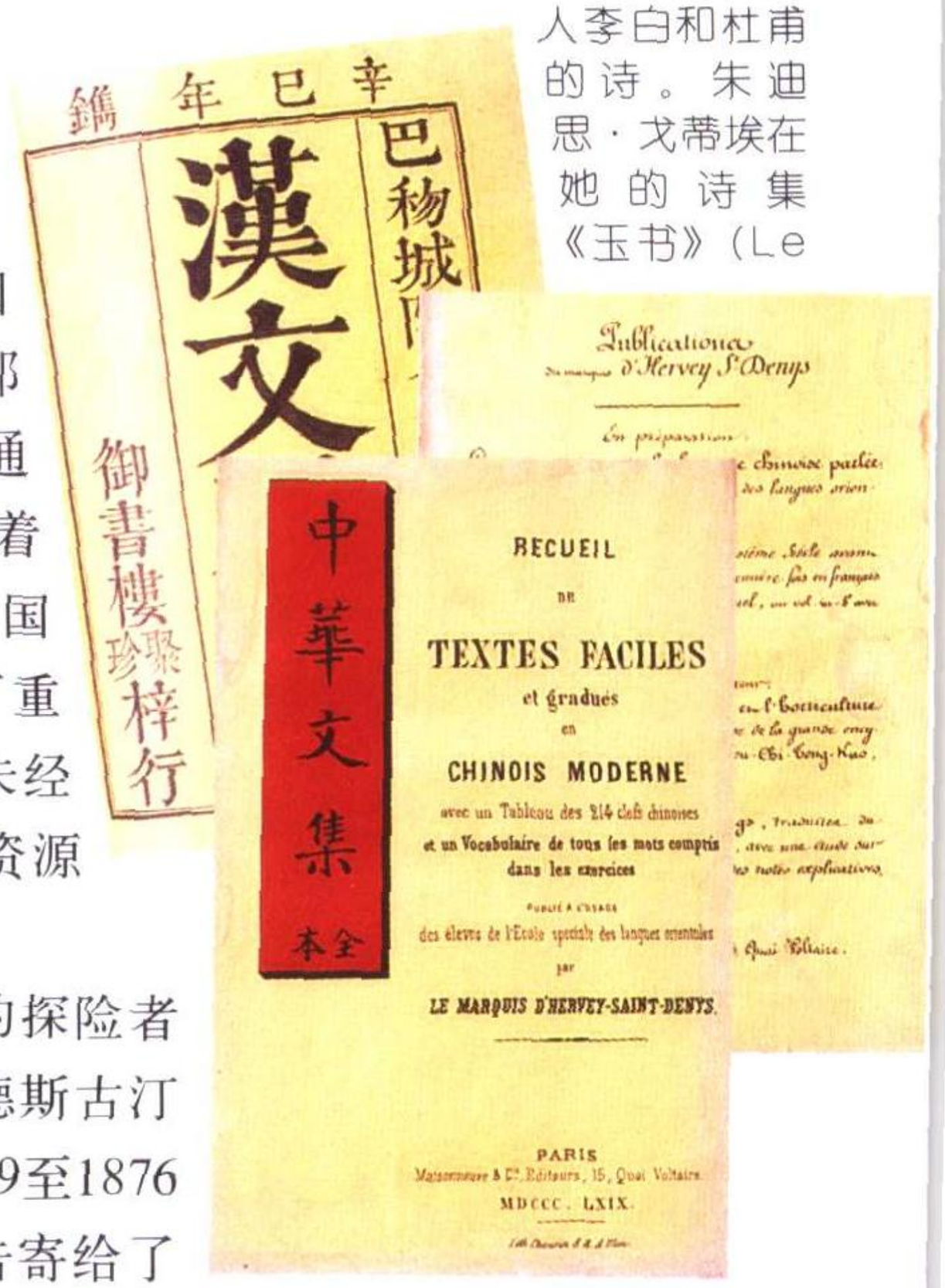
这两个机构所做出的学术性成果确保了法国在整个19世纪始终保持着在汉学研究领域无可争议的领先地位。这些成果基本上是以耶稣会传教士留下来的重要书籍和手稿资料为依据，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与其邻国（印度和越南）的关系史，以及为耶稣会传教士所忽略的古代汉语文学和通俗汉语文学（诗歌、小说和戏剧）。与耶稣会会士不同，这些汉学

家抛弃了中国的哲学，即使是表现出对于东方学者开始发现的佛教的某种兴趣，也仅是局限在严格的历史层面。相反，耶稣会会士却继续关注着中国的思想和宗教：顾赛芬（Séraphin Couvreur），今天仍在使用的《中国古文大辞典》（Dictionnaire classique de la langue chinoise）的作者，把儒家经典著作集译成了拉丁语和法语，而戴遂良（Léon Wieger）则撰写了关于中国哲学、信仰和民俗的大全。

法国在中国的调查和研究：服务于帝国主义的科学

如果说19世纪的汉学者对于中国的认识主要是停留在书本上的话，那么与之相反，大量来中国游历的普通法国人、传教士和军人在中国进行着“实地考察”。这些人往往是奉命来中国进行调查研究的。他们对科学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同时也通过绘制中国未经勘探地区的地图和清点这些地区的资源为法国的殖民扩张提供了便利。

传教士也加入了第一批来中国的探险者的行列：外方传教会的奥古斯特·德斯古汀斯（Auguste Desgodins）神甫从1869至1876年穿越了东部西藏并把他的观察报告寄给了巴黎地理协会。天主教遣使会会士谭微道（Armand David）勘察了中国西部和北部的省份并被法国国民教育部委以数项公务。然而，法国将其努力的方向主要定位于寻找东京湾与中国南部和西部之间的通道上。安邺（Francis Garnier）在法国



尽管在1874年入选法兰西学院前，德理文侯爵就在东方语言学校教授现代汉语（下图，他在课上所用的教材《中华文集》），但是他更为熟谙古汉语，尤其是古诗。他是第一个翻译中国古诗的人：他选编的《唐诗》（Poésie de l'époque des Thang）（1862）向法国读者展现了大诗人李白和杜甫的诗。朱迪思·戈蒂埃在她的诗集《玉书》（Le Livre de jade）（1867）中对这两位中国大诗人的作品也有所介绍。



被称为民族英雄，因为他把他的长官杜达尔·特拉格来（Doudart de Lagrée）少校的遗体从“湄公河探险”中带了回来。这位少校在考察团尚未按照预定计划返回长江流域之前就死于云南的山区。然而，要从湄公河溯流而上直抵其源头，即使不是没有可能，也是极其困难。因此人们试图沿红河接通印度支那和中国中部。1872—1873年，商人涂普义（Jean Dupuis）第一个开辟出这条更为可行的路线，安邺的第二次考察证实了这一点，并于1885年引发了占领东京湾的决定。其他的一些地理考察，尤其是1901年乌尔斯特（Hourst）少校的考察使在宜昌急流段逆长江而上，勘察富庶的四川省，以便在那里建立法国商行也成为了可能。

里昂赴中国商务考察团可能是法国历来对中国国土做系统考察的使团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这个考察团主要是由里昂商会出资赞助（里昂长久以来就一直与中国进行着丝绸贸易），也得到了政府的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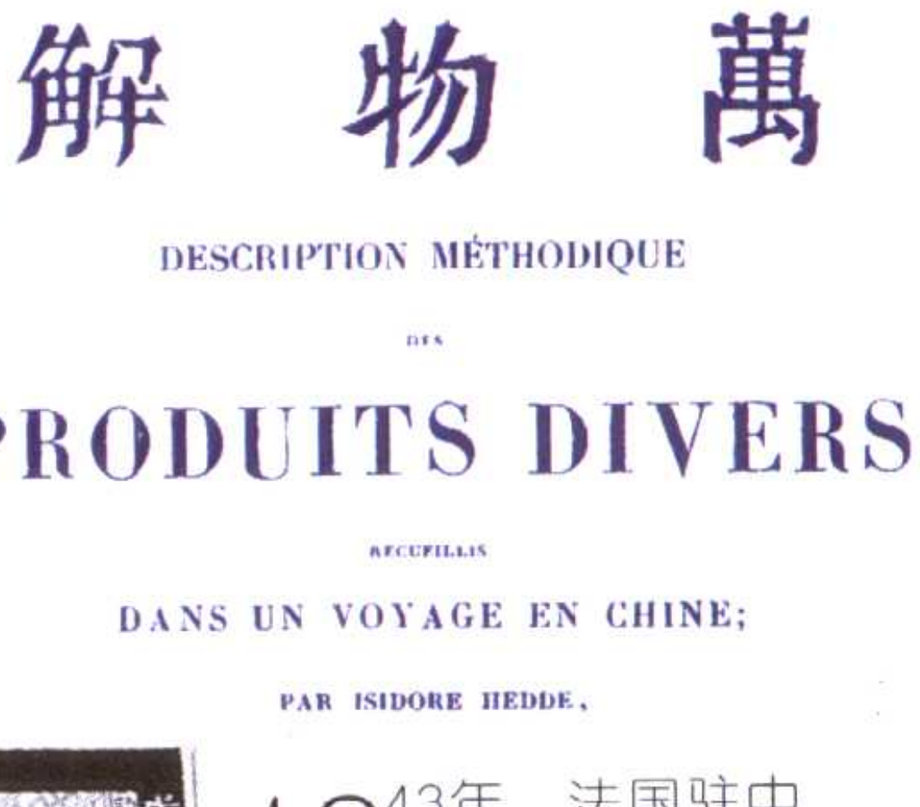
炮舰是与法国的殖民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些用于江河航行，装备有大炮的小型轮船实际上充当了法国人侵和征服亚、非的工具。在中国，它们也使勘察南部和西部的未知地区，记录水文地理，以及绘制当时中国还没有的江河图成为了可能。〔上图，长江上乌尔斯特少校的炮舰“奥尔利”号（l'Orl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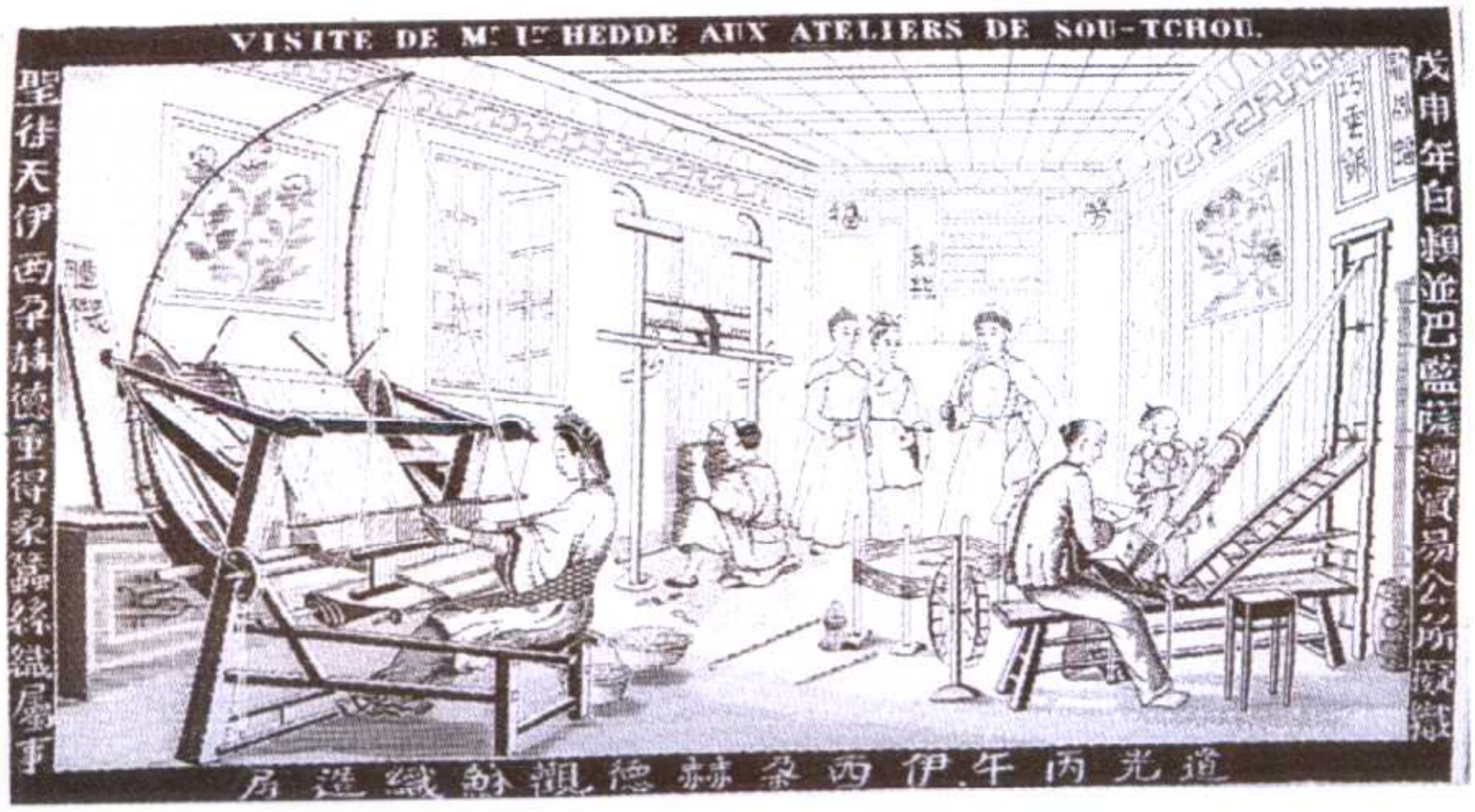
在资助1885—1887年大考察团之前（侧图，考察团的12名成员在一座中式楼阁前），里昂商会就在抢占中国市场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了应对1850年给法国蚕丝业造成巨大损害的疾病，向里昂的手工工场输送进口的中国丝绸，里昂商会促成了一个完整的商业网的形成，这个网络体系包括了商行、银行以及在法中之间从事货运的运输公司。

持，并在当地处处受到法国的外交官、军人和传教士后勤上的援助。在1885至1887年近两年的时间内，考察团的12名成员勘察了中国南部和西部的省份，以“确定这些地区的生产和消费能力”。他们的考察成果一经公布就在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很快，法国的外交官、商人和工程师也追随探险家们来到了中国，尤其是云南。从1880年开始，法国就在云南设立商事裁判所，



1843年，法国驻中国的刺萼尼大使馆增设了商务代表，由多家商行成员组成。其中负责丝绸研究（左图）的圣艾蒂安代表伊齐多尔·埃德（Isidore Hedde）于1848年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上图），里昂的丝绸业业主们从这本书中获益匪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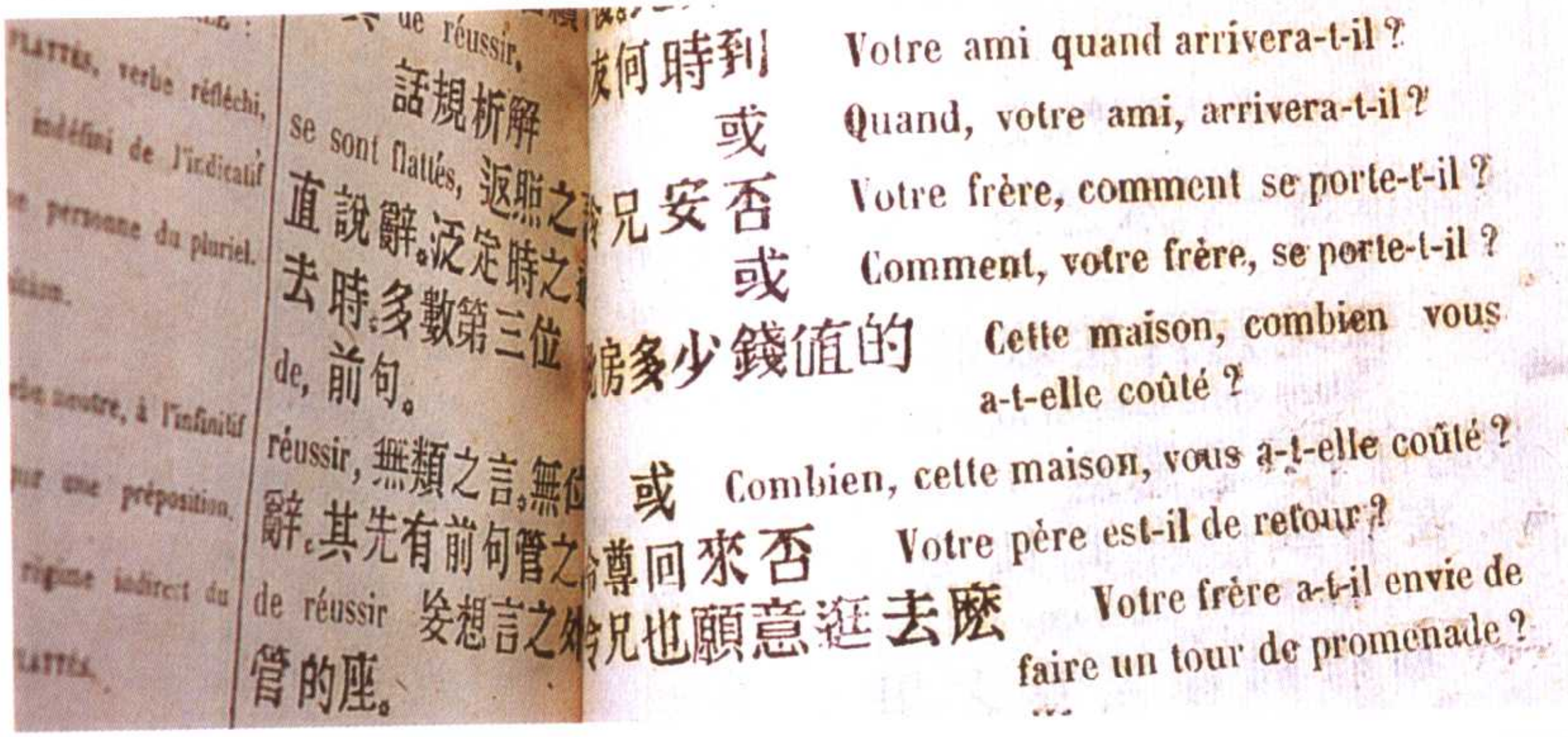
开采矿山，在河流上架设金属结构桥梁，等等。法国工程师和技术专家在中国最重大的成就之一是始于1898年的云南铁路的修筑。这一铁路网连接了印度支那和中国西南部省份，必然给法国商品的贸易提供了便利，但同时也方便了作为鸦片专卖局主要收入来源的鸦片的地下交易。鸦片专卖局是于1882年按照烟草专卖局的模式创建的。



如同银行、海关、邮局、商业和许多其他经济活动部门一样，中国的铁路事业一开始也为西方所把持。铁路的修筑成了列强激烈竞争的赌注，被列强视为是一种生财之道和控制中国的手段：法-比银行团出资修建了京汉铁路，法国还取得了云南铁路的控制权。

“洋务运动”和中国第一批赴法国代表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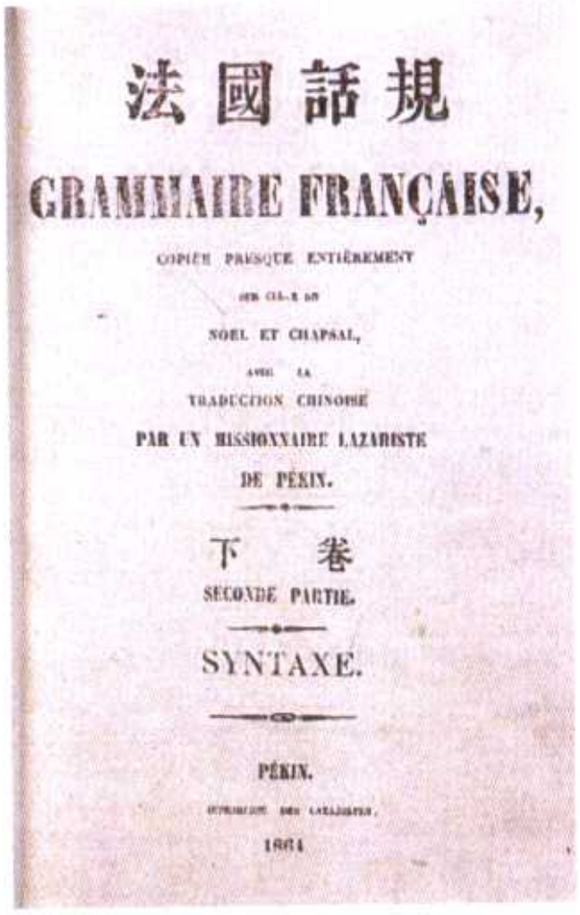
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中国军事和工业的落后以及现代化的必要性。他们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口号，表明他们想要从西方“蛮夷”那里借用的只是西方的科学和技术：在政治和道德的层面上，他们并不怀疑中国的优越性，并认为只有旧的儒家秩序的复兴才



能确保拯救中国。

在以国家“自强”为目标的“洋务运动”的推动下，清政府于1861年设立了一个负责对外关系的部门（总理衙门），并于次年创办了一所西方语言学校（同文馆），里面聘有法语教师。译书局同时聘用中外译员，负责翻译科技著作。与此同时，多个巡回考察团被派往西方各国对西方的社会和政治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最终于1875年在欧洲主要国家的首都设立了常驻外交使团。郭嵩焘被任命为驻伦敦公使，后又被委派到巴黎，并于1878年在那里定居。他的继任者曾纪泽也一样，从1878至1885年留居巴黎。这些最早来到欧洲的中国人总体上都对西方的技术和经济成就表现出钦佩。他们赞同三权分立原则，但不赞成共和制，在他们看来，共和会导致“无序”。他们的结论是：中国应采用议会制君主政体，但儒家道德标准应予保留。

在中国国内，清政府以明治时期的日本为榜样，在西方人科学和技术的帮助下建立起近代化的军队、舰队和工业。法国在这场近代化运动中发挥了作用：它指导了福州船政局的建造并负责其中中方



在清政府创办同文馆之前，几乎只有在传教士办的学校中中国人才有学习法语的可能。在北京，遣使会会士继承了从前耶稣会传教士的地产，正是他们在其出版社中出版发行法语字典和法语语法书，确保中国人能够得到基础法语的学习。

人员的培训。然而在1884—1885年中法战争期间，法国海军司令孤拔（Courbet）彻底摧毁了中国舰队（1884年8月23日的马尾海战中，福建水师全军覆没。——译注）和福州船政局。就这样，法国亲手毁掉了自己的努力成果。



在对西方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第一批派往欧洲的中国人请返回本国的曾在中国任职的外国人作向导和翻译（下图，1868—1869年考察团在巴黎，与西方向导在一起）。1880至1899年期间在中国当翻译的韦锡爱（Arnold Vissi□re）（上图）十分了解中国官员的言行举止，以至于最后他自己也有了一股中国上层文人的风范。




SINE-SHING

中国改良主义和革命运动的高涨、帝国主义者野心的衰退以及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法国所产生的价值危机促使两国在20世纪上半叶建立起了一种基于合作和交流的新型关系。它们在知识和政治方面有着明显区别，但彼此又互相促进了艺术创作。

第三章

对话恢复：合作与诱惑

留法的中国学生积极参加这种让中华民国动荡不安的政治斗争（左图，1922年在巴黎成立的民族报纸印刷处）。这种斗争也启发马尔罗写下了他的代表作《人类的命运》。



1894—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遭到惨败，使所有知识分子认识到进行一场中国社会彻底变革的迫切性。1898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劝说光绪皇帝实行行政、司法、军事和教育制度的改革。但以慈禧为代表的保守势力迅速结束了这次为期只有“百日”的近代化尝试。然而，中国的“启蒙运动”也就从此开始了，直到1911年清王朝的灭亡。



慈禧太后在1862—1908年咸丰和光绪两个傀儡皇帝统治期间垂帘听政（上图，被宫女和太监簇拥着的慈禧）。她让西方人尤其是法国作家很入迷。从乔治·苏利埃·德·莫朗（Georges Souli□ de Morant）（《义和团团民的皇太后慈禧》，1911年版）和夏尔·珀蒂（Charles Pettit）（《曾经统治五亿人的女人》，1928年版）到吕西安·波达尔（Lucien Bodard）（《玫瑰谷》，1977年版），他们都将其描写成一个残暴的女人，羡慕男性，醉心于权力，并将其视为中国社会的保守势力，也是“义和团运动”排外反抗的罪魁祸首。

中国人心目中的法国大革命和启蒙哲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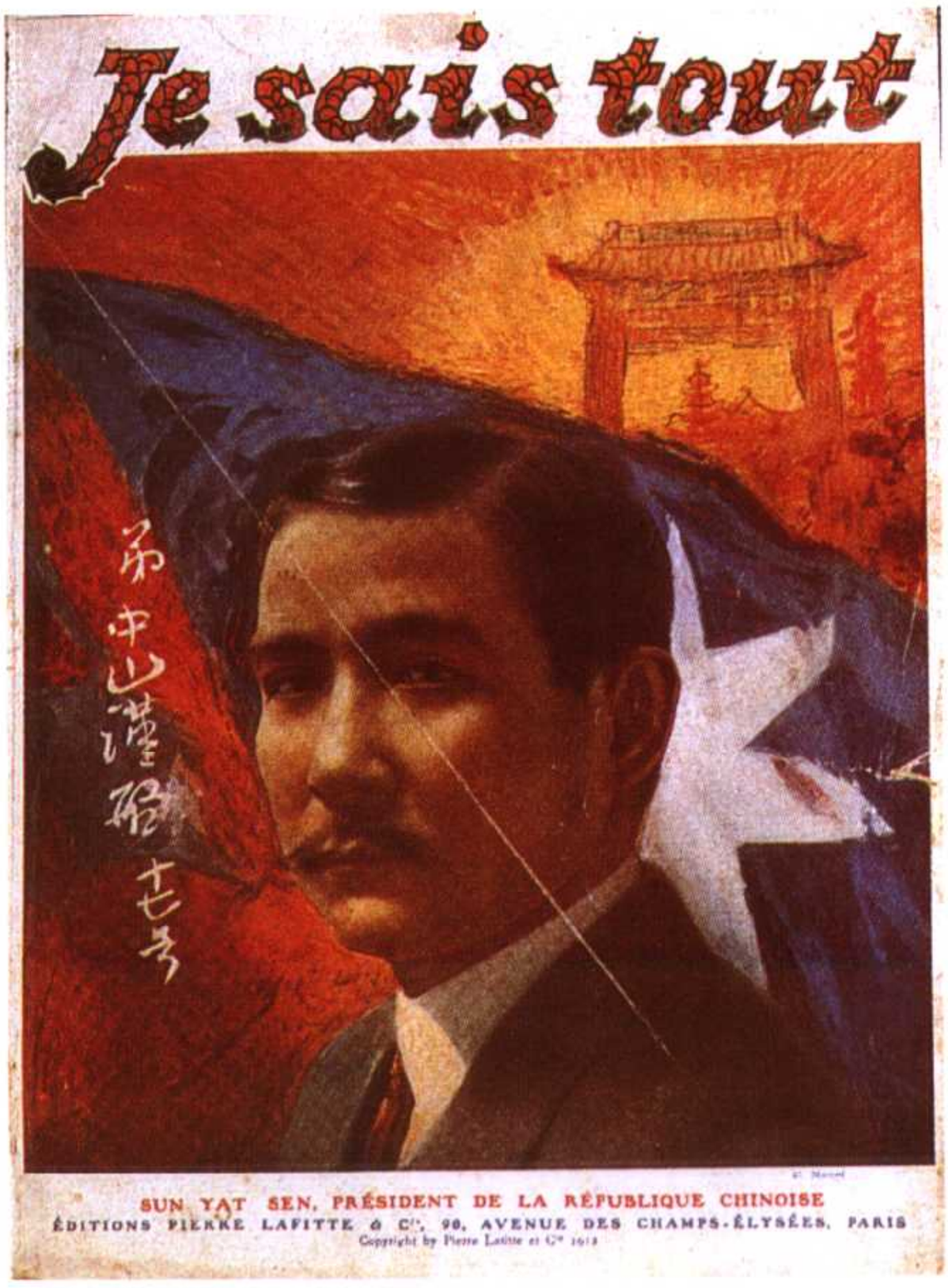
如果说盎格鲁—萨克逊的思想尤其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启发了改良主义者，那么启蒙哲学家和法国大革命则给他们提供了分析中国社会形势的基本知识和范例。康有为在其流亡日本期间，发表了《法兰西革命史》。其弟子梁启超于1898年第一个写了关于孟德斯鸠的文章，1901年又写了关于卢梭的文章。这些文章主要是关于《社会契约论》、《爱弥儿》和《论科学与技艺》的部分翻译。1904年至1909年出版的《论法的精神》是由当时的大思想家之一严复翻译的。这些文章的发表引起了出版界文章的空前繁荣。很快，在知识界，当时还不为人知的“革命”、“社会契约”、“国家主权”和“天赋人权”等新兴概念逐渐普及开来。

所有的进步人士都一致认为，清政府应该被推翻，但在建立适合中国的政治制度上又产生了分歧：

康有为和梁启超等改良主义者，从法国大革命结果的例子中得出结论，表明了他们建立“开明君主专制”的希望，以避免民主政治可能引发的暴力和社会秩序混乱；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者则倾向于宪法共和国的模式。

卢梭一律平等的原则，同样鼓励中国作家为妇女的解放而战斗。妇女斗争的两个典型形象：一个来自于法国文学；另一个则来自于法国大革命史。前者是小仲马的代表作《茶花女》中的女主人公，林纾在1899年将这部小说翻译成了古汉语。看到这个为了社会习俗而牺牲自己爱情的女子的悲怆命运，中国整个青年一代都奋起反

者。唯少數之君主與貴族而已。其餘大多數之人民。皆附屬於特權者之奴隸。無自由權利之可言也。自千七百八十九年。法蘭西拉飛耶特 Lafayette. 美國獨立宣言書亦其所作之人權宣言。La de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刊布中外。歐羅巴之人心。若夢之覺。若醉之醒。曉然於人權之可貴。羣起而抗其君主。仆其貴族。列國憲



在1911年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志士中，从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孙中山（下图，一本法国杂志的封面）开始，大部分人曾经在国外留过学，接受过西方教育。以“革命之父”为榜样，所有中华民国的支持者都剪掉了清朝强加的长辫子，穿起了西装。他们的语言也同样模仿西方，当很难翻译新概念的时候，他们就使用外国术语，就像在《青年杂志》创刊号（1915年）刊载的文章《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中一样（侧图），汉字中夹杂着一些法语单词。



抗中国社会流弊的家庭包办婚姻。另外一个则是一位历史人物罗兰夫人（Madame Roland），其传记于1902年由梁启超从日文翻译过来，获得了巨大成功，并多次成为当时出版界再版的对象。她加入革命者队伍为平等和解放而斗争，在中国人眼中甚至成了启蒙运动的象征和“法国大革命之母”。但她悲惨的结局又让改良主义者对革命路线的偏差保持了警惕。

小仲马的叙事小说《茶花女》（下图，林纾中译本）是“新小说”的主要典型。这种“新小说”是改良主义者梁启超（左图）真心呼吁来改造社会的，也是作家、法国文学爱好者、翻译家及编注者曾朴的小说《孽海花》（1905—1907）的实现形式，这部小说主要讲了一位青楼女子和旅欧知识青年之间受挫折的爱情故事。

新文化运动

按照西方民主模式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很快就感到了反动势力的威胁。这让知识分子们相信，只有进行深入的思想变革，民主才能最终确立。于是，一场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企图的、基于传统文化的“新文化运动”开始了。这场运动主要是对儒家文化和传统文学的彻底批判，其口号是：“打倒孔家店！”

19、20世纪之交，对法友好的文化传统产生了。1915年起，《新青年》杂志成为其主要的传播刊物，在封面上意味深长地带上了一个法语标题：La Jeunesse。其创办者为教育界人士陈独秀，他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的文章，将开创近代文明三



个主要学说的作者资格归于法兰西：《人权宣言》、进化论和社会主义。新文化运动以伏尔泰的理性主义和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的实证主义为依托，是科学和民主的宣传捍卫者。许多关于法国作家的文章和译文出现在《新青年》的随后几期和其他进步杂志上。慢慢地，中国民众开始熟悉法国文学史上的伟人，从伏尔泰、卢梭，到雨果、左拉，再到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和罗曼·罗兰。所有那些提笔为自由和正义事业而奋斗的作家都让人设想一种能促使社会不断进步的文学。经过大量的阅读，中国的知识分子认为他们必须接近群众并教育他们，于是他们用绝大多数人能看得懂的语言写作，以促进社会进步。从“五四运动”（1919年）开始，中国文学明确放弃使用古文而采用白话文。从此，作家的新角色得以确立，与维护已有社会秩序的儒家文人传统观念完全决裂。



1915年陈独秀创办的杂志创刊号带有法文标题“La Jeunesse”（上图，第一层）。从第二期开始，杂志更名为《新青年》，但仍然保留法语名称作为副标题。其对法友好的方向表现在法国作家的翻译作品上，同样也表现在很多关于法国社会尤其是作为典型的法国教育制度的文章中。

教育，一个交融的领域

在义和团运动和1900年围攻北京公使馆事件之后，法国认识到，帮助中国发展比使用武力更有利于维持其在中国的影响。它在教育方面的尝试在中国知识界引起了反响，对知识分子而言，学习永远是成功的关键。1903年，耶稣会会士与基督徒马相

伯一起，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大学，意味深长地称之为“震旦大学”，这个大学实施法语教学，将高等教育分布在尽可能多的领域：法律、科学、医学、政治和经济。法租界给了它一些补助金，因为它将其视为培养对法国有利的社会精英的一种手段。它还在1919年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获得的上海一个德国学校改为法中技术学院，在那里进行实用和理论教学。

从19世纪末开始，中法两国政府给中国青年提供奖学金以资助其到法国留学。义和团运动后中国应给法国的一部分战争赔款也用于教育事业的发展。

个人的创举也不少。1912年，李煜瀛和蔡元培——“新文化运动”的两位发起者，对法国十分友好，且是无政府主义者——成立了一个协会专门负责创办一些专科学校和初等学校，给去法国留学的贫困学生举办预备课程。他们也得到了法国知名人士、政治家〔保尔·潘勒维（Paul Painlevé）和爱德华·埃里奥（Edouard Herriot）、外交家（驻北京的阿列克西·莱热（Alexis Leger），又名圣-琼·佩斯（Saint-John Perse）和法国外交部的菲利浦·

和20世纪初的法国一样，体育运动在中国的震旦大学等法国教育机构的教学大纲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下图，震旦大学足球队）。震旦大学为中华民国培养了许多医生、法官、外交官、翻译和工程师。20世纪50年代震旦大学被共产党人改成了医学院，至今它仍在用法语培养医生。




École Municipale Française
à Shang-haï

Réglement

Art. I^er L'École Municipale Française est gratuite

II Tout élève appartenant à une famille honnête peut être admis aux conditions ci-dessous mentionnées.

III L'admission et le renvoi des élèves sont réservés au Comité d'enseignement; pour une cause grave et urgente, les professeurs peuvent refuser d'admettre un élève temporairement dans leur classe à la condition d'en référer

贝特洛（Philippe Berthelot）]、教授和企业领导的帮助，尤其是在李煜瀛曾学习过的里昂和蒙塔基（Montargis）的激进阶层中。1916年，中法教育协会在巴黎成立了：它支持一项新的教育计划，采用的名称是“勤工俭学”。



根据其章程，成立于1909年的上海市立法国中学对所有人开放，但它主要接受法国殖民地的孩子。相反，1919年成立的与中国合作的中法工商业学院则将中国青年培养成“技术人员、工头、车间主任、监工和店员”。

这次是关于派遣一些中国青年到法国去，在工厂劳动以支付他们的学费并接近工人阶级，这完全是根据其发起者无政府主义的理想。但战争影响了这个计划的实现，战争带来的巨大人口损失让法国政府尤其看到了中国巨大的廉价劳动力储备。

从1917年开始，数十万中国劳工（据估计人数在10万到20万之间）整船整船地被送往法国，在法国的港口机构或战场上从事繁重的劳动。中国以这种方式加入协约国参战，并希望得到积极的政治影响，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凡尔赛和约》（1919）支持日本占领德国在中国的原有势力范围。“五四”



大示威表达了愤慨之情并呼吁中国的现代化。中国青年一反常态地表现出，没有一定的西方的理想化，其民族独立运动是行不通的。



中国勤工俭学学生在法国：政治斗争的初步尝试

世界大战之后不久，法国政府支持“勤工俭学”计划的重新启动。因为它将这看成医治大战中人口锐减的良方，并且从长期来说，这也是让法国重新获得其在华地位的一种手段。在1919和1920年，大部分出身于地位低微的社会阶层的近4000名中国青年（其中有几十名青年女子），持续不断地在马赛港下了船。但法国此时的劳动力需求已经比原来的小了，他们中有很多人都没有找到工作。其他人受雇于冶金企业，他们的劳动如此辛苦，工资如此低，以致于没有时间也没有钱去学习。除了蒙塔日等几个城市能给予他们特殊教育以外，其他地方还没有专门的学校机构接纳他们入学。勤工俭学的学生没

有其他办法，只有联合起来争取他们所说的“三种权利”：工作、面包和学习。他们中许多人组织集会和示威游行，出版报纸和散发传单，进行政治斗争的初步尝试。他们发现的资本主义的现实和布尔什维克主义革命胜利所带来的希望，让他们大多数人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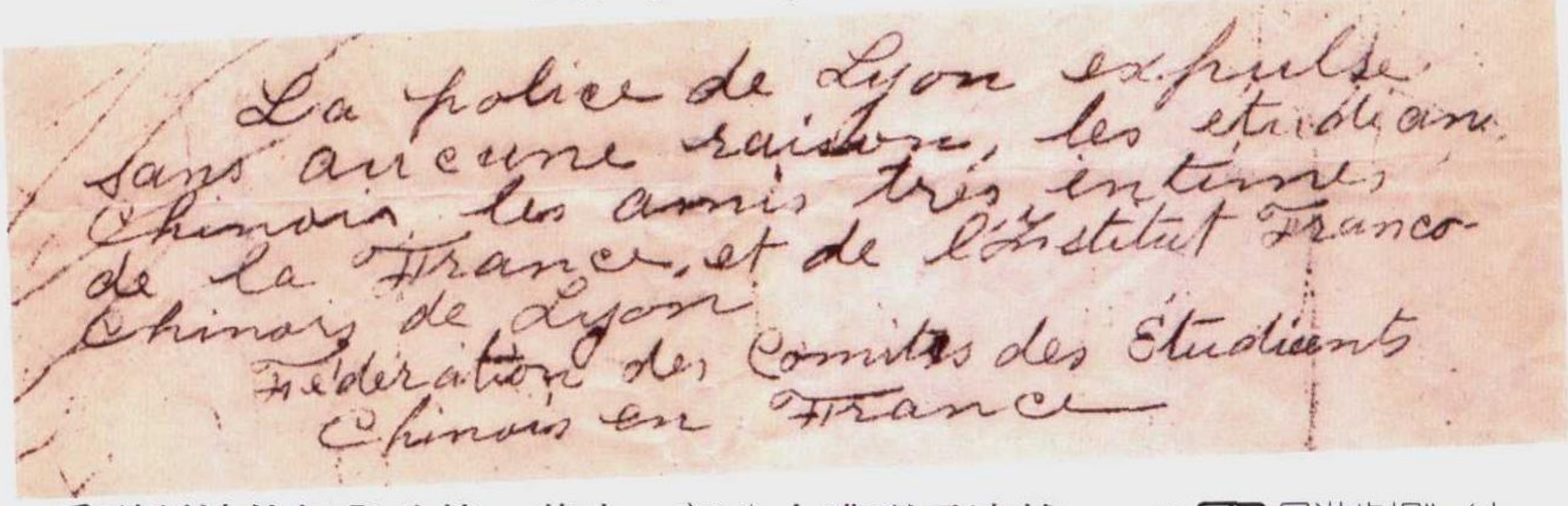
1920年里昂中法大学的成立（l’Institut franco-chinois de Lyon）给他们提供了一次公开表达其要求的机会。中法大学是专门为那些在中国通过考试又负担得起学费的年轻人设立的。那些没钱又没有受过更多教育的勤工俭学学生自然就没有考虑在内。作为抗议，他们决定占领中法大学所在地圣依雷内堡（fort Saint-Irénée）。但他们并没有

很多大战期间招募的中国劳工和法国妇女一样受雇于兵工厂（下图），但很多人被分配从事更危险的任务，像在战场上挖战壕和掩埋尸体。他们大部分都是文盲，跟着内心深处很想从事教育工作的中国的勤工俭学青年学生学习中文（左图）。



Hoan yin ni! Amis Chinois!

Cent vingt-cinq étudiantes et étudiants sont entrés hier matin au fort Saint-Irénée qui devient réellement l'Institut franco-chinois


La police de Lyon a expulsé sans aucune raison, les étudiants Chinois, les amis très intimes de la France, et de l'Institut Franco-Chinois de Lyon
Fédération des Comités des Étudiants Chinois en France

看到预计的怀柔政策，其中一部分人遭到了逮捕，然后不经审判就被遣送回中国。

正是在这种政治斗争的背景下，1921年，也就是成立法国共产党的图尔代表大会之后一年，在巴黎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早期的党员中有两位在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任领导职务的人物：周恩来和邓小平。

和在大战期间招募的劳工一样，大部分勤工俭学的学生回到了祖国，身无分文又没有文凭，成了他们“权利与正义之国”幻想的孤儿。但他们充满了通过工会和政治斗争来改变中国形势的希望。从法国方面来说，一位官员后来对这个在没有任何成果之前就流产的经历进行了总结，这种经历最后只是培养了一些“空想家”或者说是“鼓动者”。

《里昂进步报》（上图，顶部）在1921年9月26日的报纸版面上，用中文欢迎中法大学首批中国学生的到来，同时也指出，“走投无路的中国学生”从巴黎来到里昂向他们散发中文传单。上面的传单用法语写成，目的在于告诉里昂人民那些抗议者的被捕。勤工俭学学生大量运用报刊了解消息和发动群众（右页底部，他们的报纸之一），以致于邓小平在法国获得了“油印博士”的外号。

法国和中国政党的合作与碰撞

1921年，在上海法租界一个秘密的街区里，一小部分年轻的爱国者，其中有毛泽东，在共产国际

代表的帮助下秘密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新文化运动”领头人，“五四运动”以来一直在租界避难的陈独秀，担任了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在随后的几年里，在上海和其他外国势力比较重要的中国大城市中，请愿、示威游行、罢工和抵制运动大大增加，以要求公正、平等、民主和国家主权等权利。西方人宣传了这些思想，但他们自己并不愿意去遵守。

1925年5月，风潮达到了顶峰，法国动用了炮舰和“驻华占领部队”保护法国侨民。蒋介石继孙中山成为国民党的领袖。北伐战争（1926年）成功打败军阀之后，他开始转而反对与其联盟的共产党，并对1927年4月发生在上海的工人示威游行进行血腥镇压。尽管法租界接纳了来自于各方的难民，法国支持蒋介石在南京成立的独裁政府。



周恩来，摄于巴黎，1920年作为勤工俭学的学生来到巴黎，但他在巴黎主要从事新闻记者和共产主义活动分子的工作。

带有政治倾向的法国艺术模式

在这个政治风潮期间，中国的作家和艺术家，在试验新的艺术创造形式的同时，也尝试着推动社



Deuxième Année. — N° 64. Le numéro : 20 centimes. Samedi le 29 janvier 1921.

廣告價目從廉 每星期六出版 第二年第六十四號 民國十年一月二十九日

旅歐週刊 Journal Chinois Hebdomadaire

本報定價 每張價廿些丁 半年價五佛郎 全年價十佛郎 （報費先惠）

本報編輯部及發行部設在巴黎西郊 來信定報請寫法文住址

39, rue de la Pointe 39
LA GARENNE-COLOMBES (Seine)

本報總發行處

論說

畫地爲牢

◎血淚糢糊

◎死生出

我們爲修養的愛護。的堅忍工作上。同志求事業的優美。原來疊出的環境。才正是我們也相信。可以慰一片蒺藜叢生的山很能够運行自如。但我們自己來建築的。其實人人說樂觀。說宜而不負責任的話。觀也非不是不能抱。價。否則世界上沒也不長進。只知占便宜。狀上。總各有幾分深情。沒有不使我們逐付。單就我們現在勤不有許多艱難困苦的恐。怖苦呢不苦？我絕不是現在要來不過我因爲深覺得

会进步。在他们转而进行的西方文学和艺术运动中，法国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逐渐成为揭露社会不公正和鼓励人们反抗的最恰当的形式。徐悲鸿和其他在法国学习的画家使美术学院开始接受他们的法国导师的那种学院风格。茅盾在《小说月报》上提倡作家用巴尔扎克和左拉的风格写作。他自己在小说《子夜》（1933）中描述了大上海的工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巴金在法国学习了几年之后，在写他的代表作《家》（1931）的时候，依靠的正是这种《我控诉》作者的风格。《家》是巴金揭露传统家长制社会罪行的长篇三部曲的第一部。

1925至1927年期间在工业大城市爆发的工人和学生游行示威针对执政的中国政府以及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下图，1927年3月发生在上海的示威游行）。留法归来的勤工俭学学生中的社会主义者也积极参加了这些游行示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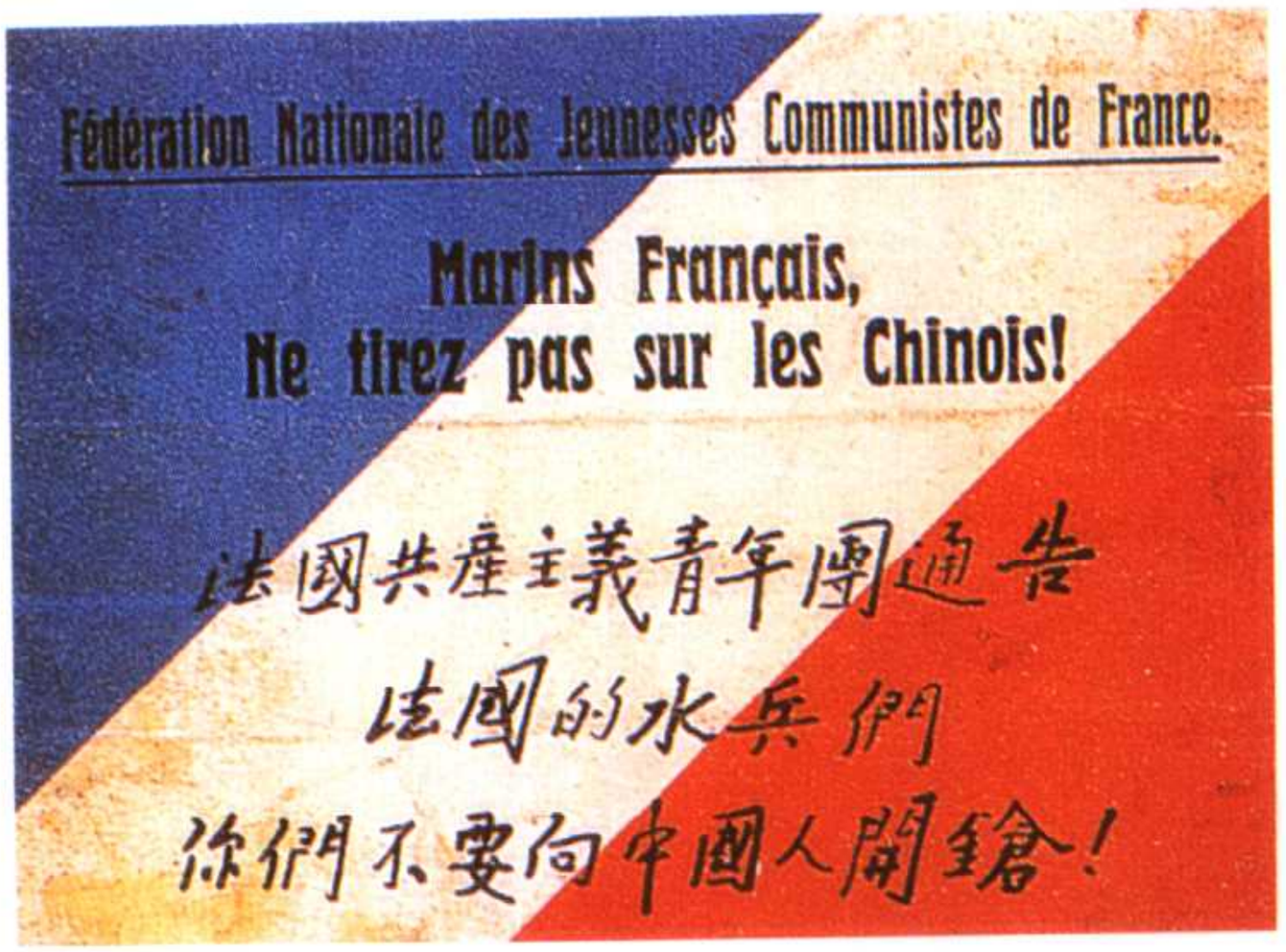


在中国的探险和教会探索

当中国青年从西方模式中得到启发，尝试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和文化的时候，深信“西方没落”的整个法国青年一代转向他们认为“特别的”东方国家，寻找他们正在经历的价值危机的答案。当然，通讯手段的发展让中国之行变得平淡无奇，减少了大部分神秘色彩。早在1901年，外国军队占领北京紫禁城，就使皮埃尔·罗提（Pierre Loti）在《北京的末日》一书中写道：“北京完了，她的威严荡然无存，她的神秘公之于众。”保尔·莫朗（Paul Morand）1925年来到亚洲。他给他的旅行叙述冠上了一个没有吸引力的标题：《除了土地，一无所有》。但除了展现在旅行者眼前的西化的一面，中华民国给冒险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探险和试验的空间，因为她是完全开放的，又完全处在动荡中。

大记者阿尔伯特·朗德（Albert Londres）让

法国读者直接目睹了震撼“疯狂中国”的大事，从1922年起的军阀混战到十年后的日军进攻上海。马尔罗（Malraux）在他的冒险小说《征服者》（1928）和《人类的命运》（1933）中，以1925年在广东革命者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1927年在





留在法国的中国勤工俭学学生也支持中国同胞的游行示威。1925年，他们散发用两种语言写成的传单（上图），以敦促派往中国保护其租界的法国水兵不要遵守命令。中国的革命运动，如果说没有得到法国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分子或同情者的真正支持，那也得到了他们的同情，像亨利·巴尔比斯（Henri Barbusse），保尔·瓦扬-库蒂里耶（Paul Vaillant-Couturier）和马尔罗（Malraux）等人。巴黎和上海都举办了两个描绘社会悲惨的绘画和雕塑展览。

上海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斗争为背景，描写了一些和他一样在行动中寻求生存或死亡理由的人物，不管他们的立场如何。耶稣会神甫和古生物学家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发掘华北的黄土地，投身于悠久历史的研究之中，寻找人类的起源：1928年北京周口店中国猿人（或称“北京人”）的发现，说明了他不顾教会的反对而采用的进化论学说。1931—1932年之间，他参加了由雪铁龙公司组织的“黄色远征”（Croisière jaune），这次旅行从亚洲大陆的贝鲁特一直到北京。

从20世纪开始，考古学家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寻找被风沙掩埋的城市和宝藏。1908年，在敦煌的岩石遗址上，在一个千年不见天日的岩洞中，青年学者伯希和（Paul Pelliot）发现了几千卷手稿和画卷，他将其整批整批带回巴黎，并开始了一个新的冒险：辨认这些手稿和画卷的冒险。

对其他旅行者来说，中国的地理空间同时还是一个更加吸引人的内部空间。从1909年起，谢阁兰（Victor Segalen）的中国之行路线，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将其从“中华帝国带入了自我帝国”。在他的虚构的侦探小说中，他恢复了紫禁城所有的神秘色彩，将其看作人类深不可测的奥秘，以此来回应罗提。他在中国各地寻找

除了上海的徐家汇，法国耶稣会神甫在中国河间府还拥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中心（河北省献县），在那里他们恢复了他们先辈深奥的教义。下图为一封游记书信中，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于1924年摄于献县附近的一座桥上的照片，描述了一个“居民众多的设防传教会”。在那里他惊奇地发现了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小城，有印刷厂、中学、餐厅、磨坊和修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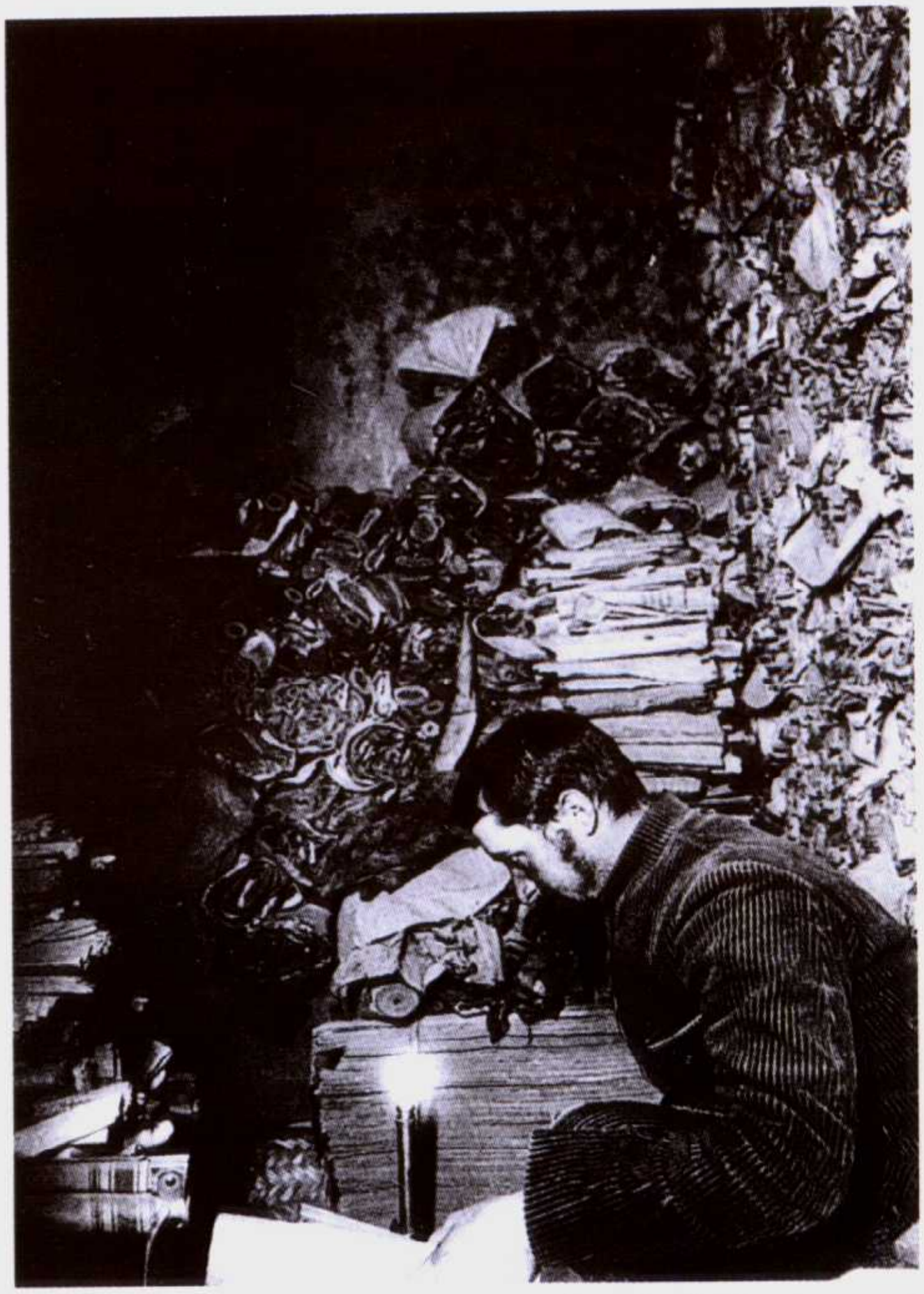
“中国伟大的石雕艺术”最古老标本的考古探险，在他的作品中变成了寻找文明的开端，在这过程中可以感觉到早期人类创作激情的突然闪现。

亚历山大·戴维·尼尔（Alexandra David-Néel），因关于她自己1924年秘密潜入圣城拉萨的亲身经历所写成的报导（《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之旅》）而被全世界的人认识，在这之前她在中国西部喇嘛寺院里花了很长时间进行佛经的沉思修行和学习。她那些关于推广藏教的作品，在二三十年代东西方碰撞问题经常成为辩论主题的法国引起了巨大反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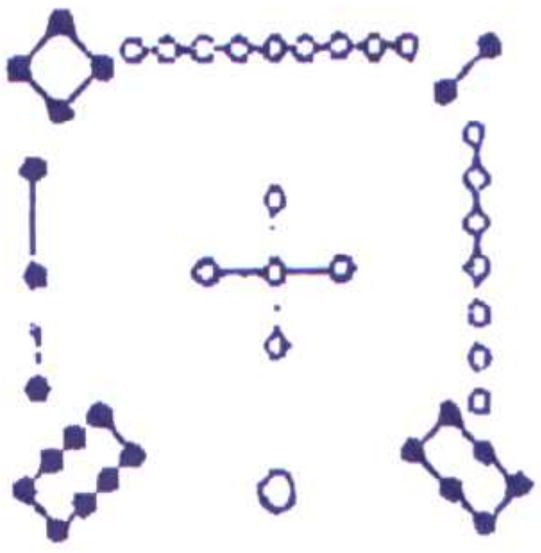
不仅像马伯乐（Henri Maspéro）和葛兰言（Marcel Granet）这些汉学家关于中国古代道教、宇宙观念和哲学观念的成就，还有像辜鸿铭、林语堂这样的中国思想家所写的让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传统的作品，都成为人们讨论的内容。勒内·格侬

“黄色远征”并不像1907年由《晨报》（Le matin）组织的北京-巴黎汽车拉力赛一样仅仅是个汽车的耐力试验（见上图，雪铁龙履带车），它同时还是一次拥有重要技术手段，尤其是摄影和电影技术设备的科学和信息探险。早在二十年前，富有的文艺事业资助者阿贝尔·卡恩（Albert Kahn）就开始建立“全球档案馆”并派遣一名技术师到中国搜集资料图片和电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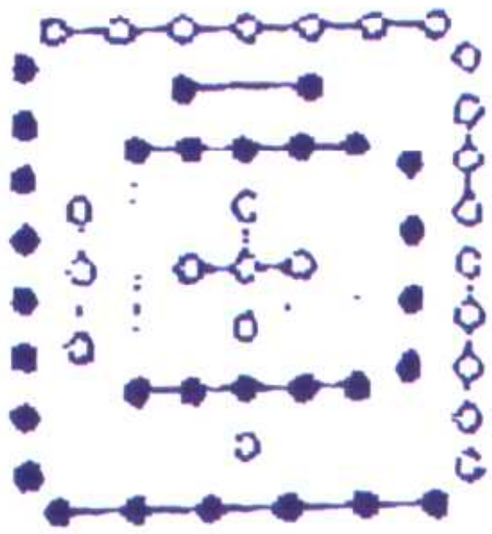
(René Guénon) 在唯物主义著作《现代世界的危机》(La crise du monde moderne) (1927) 中探索道教“最初习俗”的残余，成为了纯精神重建的创造者。其他作家像罗曼·罗兰等认为，东方人特有的内倾和直觉可以补充作为西方人特征的推理和行为。安德烈·马尔罗不相信这种可能抑或是希望的综合，在《西方的尝试》(1926) 中，他让一个在欧洲旅行的中国人和一个在远东旅行的法国人进行书信来往，这至少表明了对自我的认识从今往后要通过对方的目光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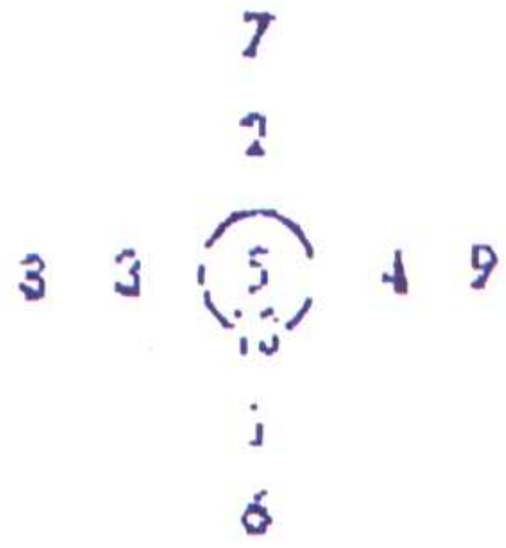


当伯希和 (Paul Pelliot) 走进一年前探险者奥雷尔·斯坦(Aurel Stein)曾经到过的这个藏满手稿的敦煌石窟时，他惊奇地发现还剩下15000到20000卷手稿。由于他很了解中文和中亚的几种语言，在三个星期中，他蹲下来借着微弱的烛光(上图)，每天能够浏览1000卷手稿，给法国国家图书馆挑选了最珍贵的文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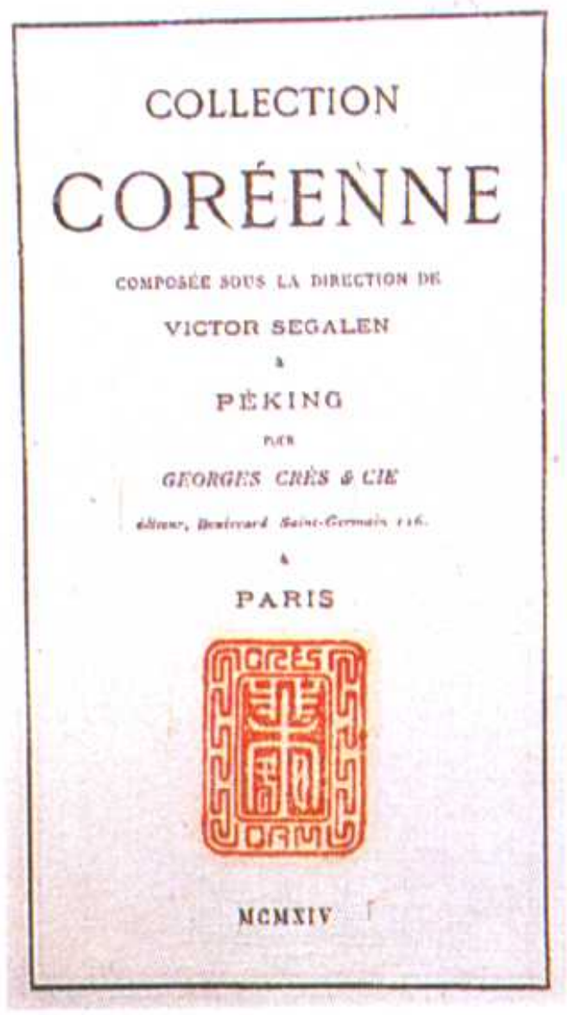








在《中国思想论》(1934)一书中，葛兰言（Marcel Granet）分析了在中国主宰人命运的成见、观念和符号体系。上面的图表是用数字标记来表示天地万物的古老表示法。





1914年，谢阁兰在北京为后在1922年承担其遗作《勒内·莱斯》（Ren□ Lays）（侧图）出版的出版商乔治·克莱（Georges Cres）创作了受中国珍本收藏影响的“高丽丛书”，但只有三本书出版了，其中有保尔·克洛岱尔的《认识东方》（Con-naissance de l'E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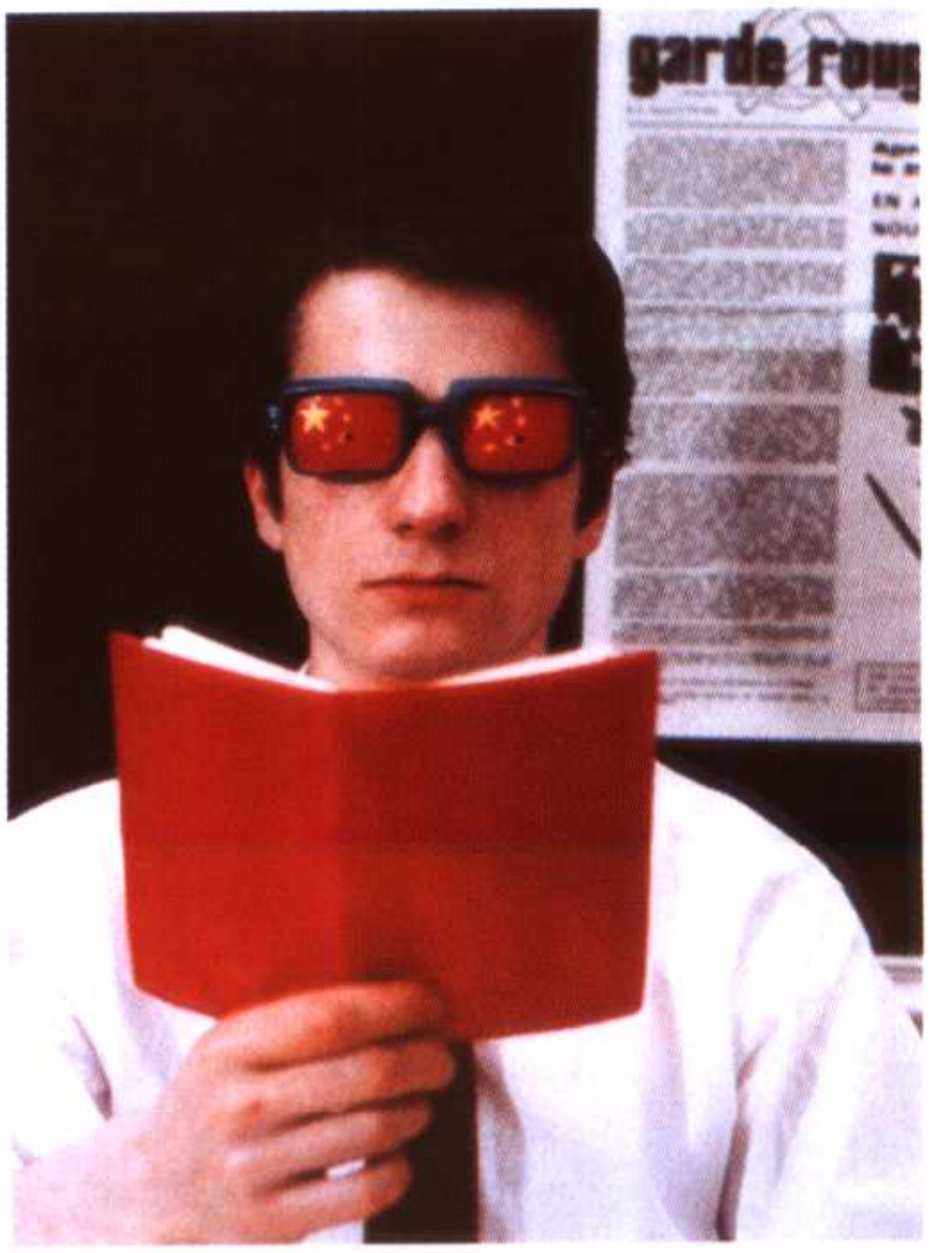


法国知识分子都狂热崇拜社会主义中国，但当他们充分了解这种制度的现实之后却都放弃了这种政治制度。然而邓小平决定执行的搞活经济慢慢引导中法文化进行混合与交融。

第四章

文化换位与交融

1968年5月前夕，当饱受“文化大革命”煎熬的中国还在闭关自守的时候，法国青年正如让-吕克·戈达尔（Jean Luc Godard）的电影《中国女人》中的革命主人公一样（右图），对着《毛泽东语录》冥思苦想寻找出路。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社会主义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为罗丹的《思想者》（左图）齐声喝彩，这引起了新的交流。





日本侵华战争之后的中国内战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胜利而告终，而国民党反动派则逃往台湾。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其政府支持蒋介石的法国人被迫离开中国。

兴奋的法国知识分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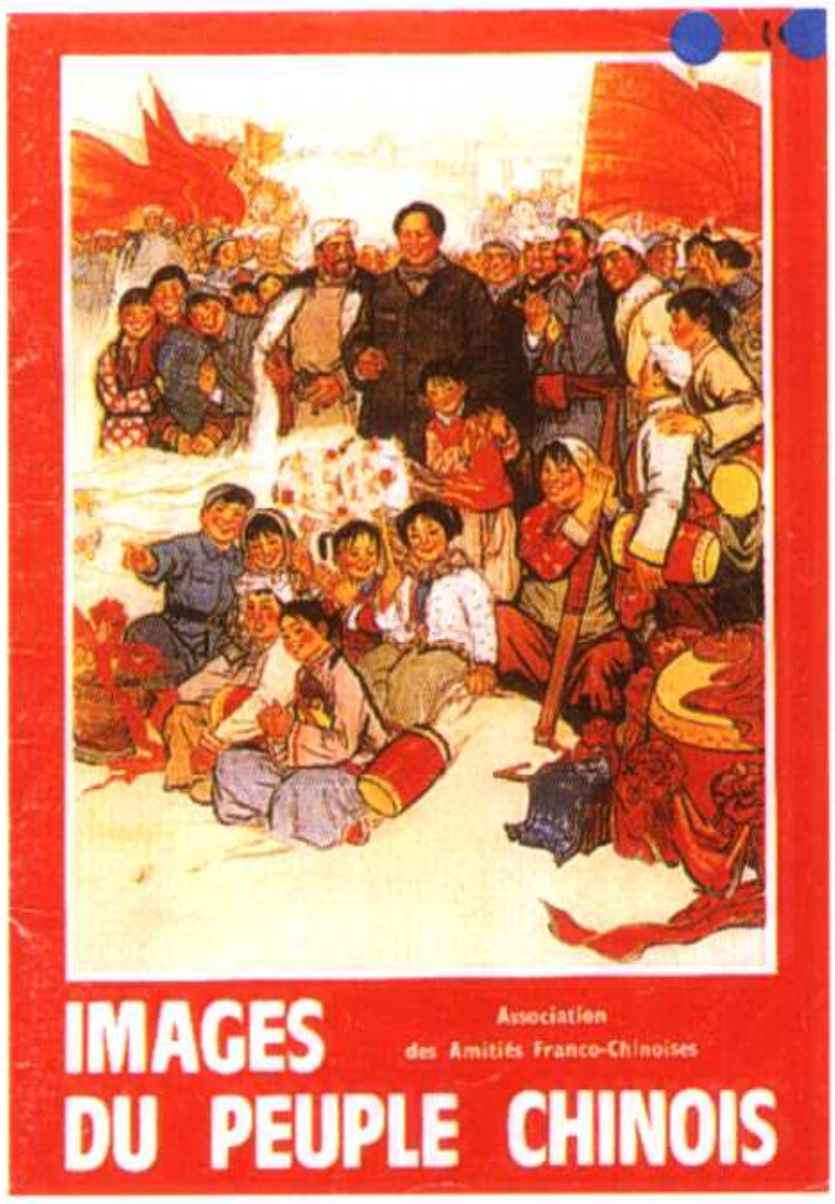
新政府让人民摆脱了贫困并接受教育，开创平等和重建社会秩序，最后重新让经济和工业按照集体主义精神运行起来。所作的这些努力，深深触动了很多法国的知识分子，而不仅仅是在左翼共产主义者中。新政府也很注意自身形象，向国外发行一些宣传杂志，像《中国建设》、《北京周报》等杂志，鼓励成立社会主义同情者的协会，像法中友好协会等。它还少量发放进入中国的签证，同时，政府旅行社组织允许进入的游客参观模范工厂、学校和人民公社，但他们的旅行也受到了该旅行社的严格

亨利·卡蒂埃-布雷松（Henri Cartier-Bresson）参加了共产主义中国的开国大典，并用快镜头照片报道了这个重大事件，这些照片远没有任何异国情调，但展现了置身于感人的人道主义中的中国人民。在1954年出版这些照片时写的序言中，让-保尔·萨特展现了人民热烈欢迎解放军的场面（上图，大学生扭起了“秧歌”，一种来源于农民、后被部队采用的舞蹈，庆祝解放）。他和西蒙娜·德·波伏瓦的中国之行更增加了他对这一新社会制度的仰慕。



控制。

大部分于20世纪50与60年代来中国的法国知识分子，像1955年来华的让-保尔·萨特（Jean-Paul Sartre）和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一样，在社会主义成就面前兴奋不已，并且回国后毫不犹豫地出版了为社会主义歌功颂德的作品。而像克洛德·罗伊（Claude Roy）和安田朴（René Etiemble）那样怀疑看到的景象太美好而认为弄虚作假或公开批评这种制度的人却很少。当在中国度过童年时代的新闻记者和小说家吕西安·波达尔（Lucien Bodard）报道其1956年第一次中国之行报告时，他对他看到的东西感到“惊叹又恐怖”，这在左翼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公愤。



在这个巴黎展览中（上图，宣传画），中法友好协会展出了由毛泽东政府制作的宣传画《中国人民的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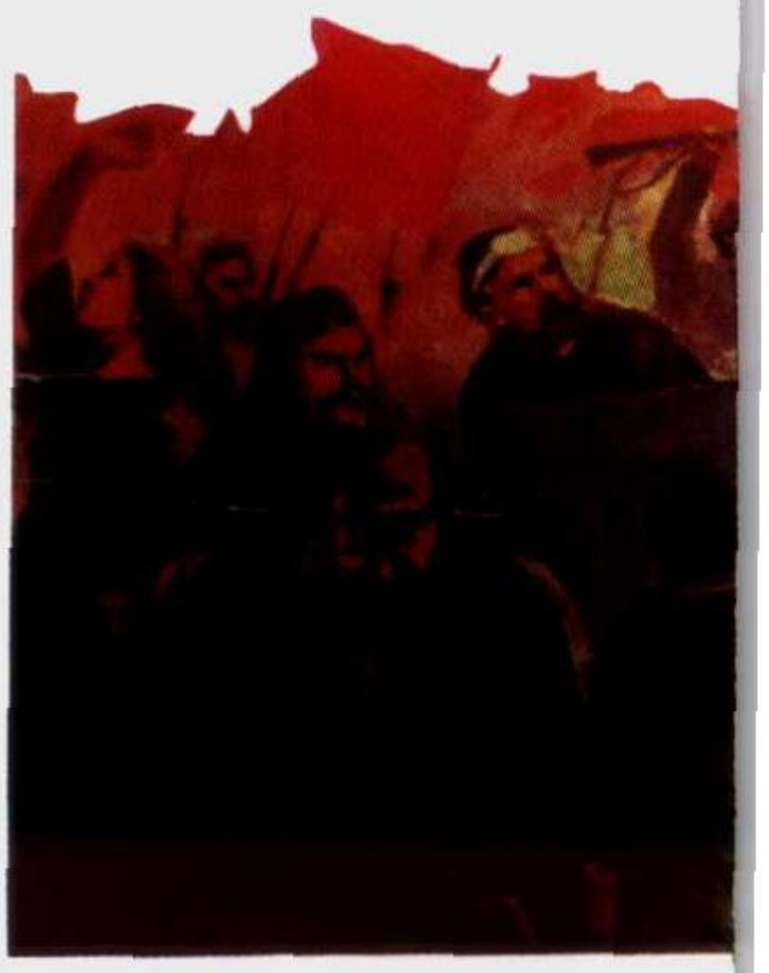
1964年，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夏尔·戴高乐

（Charles de Gaulle）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断绝与台湾的关系。比美国和大部分西方大国早8年，法国和中国就开始了受到热烈欢迎的外交和文化关系，但同时中国与“苏联老大哥”的不和从此以后也就全面化了。几十位法语“专家”被派往中国教法语（这用于非洲法语区的政策在中国特别有用），并带给中国它所需要的科学技术帮助。但是，中国的大门对旅游和贸易迟迟不开放，在华的法国常驻外交代表也处于与人民隔离的外国使领馆中，经常感到被监视和不了解真相，正如外交官皮埃尔·让·雷米（Pierre-Jean Rémy）于1964年到1966年在北京居住期间受到启发而写的小说《圆明园之劫》中表现的一样。中国又重新避开了外国人的目光，以增加其神秘色彩和幻影。

在他的《回忆录》中，雅克·吉耶马（Jacques Guillermaz）并没有掩盖他的惋惜：法国放弃了台湾当局转向承认共产主义中国。据他看来，“戴高乐将军本人也很快发现了中法两国之间对话缺少太多主题而产生的局限性。”

“文化大革命”和巴黎公社的传说

1966年，中国政府决定重新发动阶级斗争，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在整个运动期间，法国历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被不断提到：巴黎公社。毛泽东很快就发出了与“修正主义”作斗争的号召，年轻的红卫兵到处竭力铲除官僚主义和资本主义势力，“大字报”（墙报）贴满了中国城市的墙壁，就像以前布告贴满巴黎的墙壁一样。1967年初，“革命造反派”夺取了上海市政府的权力，但“上海公社”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形势很快就被中央政府控制了。从此以后，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巴黎公社所代表的“无产阶级”专政却仍被“四人帮”利用到政治中，直到1976年“四人帮”的覆灭。



尽管在现代中国巴黎公社的神话已经不再用于政治方面了，但它仍然活在人们的信仰中。阿尔封

斯·都德（Alphonse Daudet）在《月曜日故事集》中的第一篇小说《最后一课》中，以栩栩如生的场面让人回想起普鲁士入侵、巴黎之围和巴黎公社等一系列事件，每一个中学生都还能在学校课本上读到这篇文章；最后，中国来的旅行者参观巴黎时，一定会参观巴黎公社社员墙。

法国毛泽东主义者的盲目

文化大革命所引起的问题，再一次将中国和世界隔绝了，法国也只能在北京维持少量外交人员。这种情况很不利于双方互相了解，反而便于采用各种欺骗手段。在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社会背景中，苏联模式已经不再让人幻想，社会动荡也很大，对现状不满的年轻人就将通过持久革命建立一个平等社会的理想寄托在了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他们组成各种小团体，身边必带《毛泽东语录》，将毛式领子的蓝色

在这张1971年中国出版的庆祝“巴黎公社”百年的纪念海报上，描绘了举着红底黄字旗帜的巴黎起义者。这些旗帜，让人联想到了共产主义中国的国旗，也正说明了庆祝巴黎公社主要是作为颂扬现政权的一个机会。它还反映了对法友好作家沈大力从于勒·瓦莱斯（Jules Vallès）剧本《巴黎公社》改编的《樱桃时节》（Le Temps des cerises）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精神，该剧在北京举行全球首演：突出的是那些血肉英雄，为了献身革命事业，他们已经成了不再有任何情感的个人。





为社会主义报纸《人民的事业》作宣传的海报（侧图）上印的是红色的太阳以及饰有毛泽东头像的标语。巴黎的示威游行人群挥动着的这些招贴画（下图），表明了对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左派来说，国际共产主义领导国家已经不再是苏联，而是中国。“伟大的舵手”是一个神秘而又可塑的形象，而人们只能通过中国的宣传所表达的来了解它。

中山装作为他们的集会标记。

和中国“知青”上山下乡一样，法国的“毛泽东主义者”也尝试着接近劳动阶级。当1968年的“五月运动”开始以后，他们参加工人阶级的罢工和示威游行，但在他们进入工厂之后，尤其是在无产阶级左派号召工人阶级反抗和接下来几年中引起暴力气氛的新运动中，他们被动员了起来。

20世纪70年代初，文学杂志《如是》（Tel Quel）成为法国毛泽东主义运动的思想喉舌。法国共产党和法国总工会应该对1968年“五月运动”的失败负



责，于是“毛泽东思想”，因为这不是西方的，绝对是“其他地方的”，就作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融入资本主义体系部分的唯一选择被介绍进来。1974年，部分“如是”派，其中包括菲利浦·索勒尔（Philippe Sollers），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和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访问了中国，并认为看到了他们先进的美好政治计划的体现。通过很多“文化大革命”受迫害者避难的香港，一些能让人真正了解中国所发生的一切的信息传到了法国：摧毁各种形式的文化，排除异己以及对知识分子迫害。于是从1971年起，在《毛主席的新装》中，汉学家西蒙·莱斯（Simon Leys）〔又名皮埃尔·里克曼斯（Pierre Ryckmans）〕揭露了“四人帮”的种种暴行和“徒有虚名的‘文化大革命’”的欺骗性。



中法两国1964年外交关系的建立并没能阻止共产主义中国的领导人支持1968年“五月运动”中对戴高乐政府的不满者。六八年运动被看成是被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典型的1871年巴黎起义的再现。所以，是一个工人而不是一位知识分子作为领导者出现在赞成该运动的海报上，上面写道：“伟大的巴黎公社革命传统万岁！”

经济和技术合作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不久由邓小平执政。他从1978年开始采用搞活经济为标志的全新政策。他开启了中法文化关系的新时代。外国外交官、学生、教师、技术人员、商人和游客大量重返中国，但中国日益强大的国力从此以后让其合作者必须平等地对待它。

如果说在经济上法国受到了其他西方强国的激烈竞争，甚至被它们超过了，但法国却在某些关键

领域越来越出名，像销售空中客车的航空业，法国电力公司（EDF）建造大亚湾核电站的核工业。刚开始，由于缺少经验和缺乏对中国社会环境的认识，部分企业遇到了困难，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适应当地文化和尊重当地习俗被证明是值得的，就像家乐福零售业集团的成功经历所表现的那样。

法国企业也在中国兴建工厂，生产成本更低的产品以销入法国市场。这种伴随着技术和能力转移的非区域化进程，其结果之一便是，不久以后，在法国消费者熟悉的“中国制造”的产品以外，不仅在纺织、玩具、皮革等中国传统领域，而且在多媒体、医药或高级时装等新兴领域，开始出现“中国生产”的产品。



1973年，蓬皮杜（Pompidou）总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以来接待的第一位西方国家领导人。但这还不是经济开放的时候。以后成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上图，法国总统右侧）此时还不是政府领导人。像阿尔卡特公司（右图，这个法国最大电讯设备供应商的一张中文广告）等法国企业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进入中国。

法国文化传播在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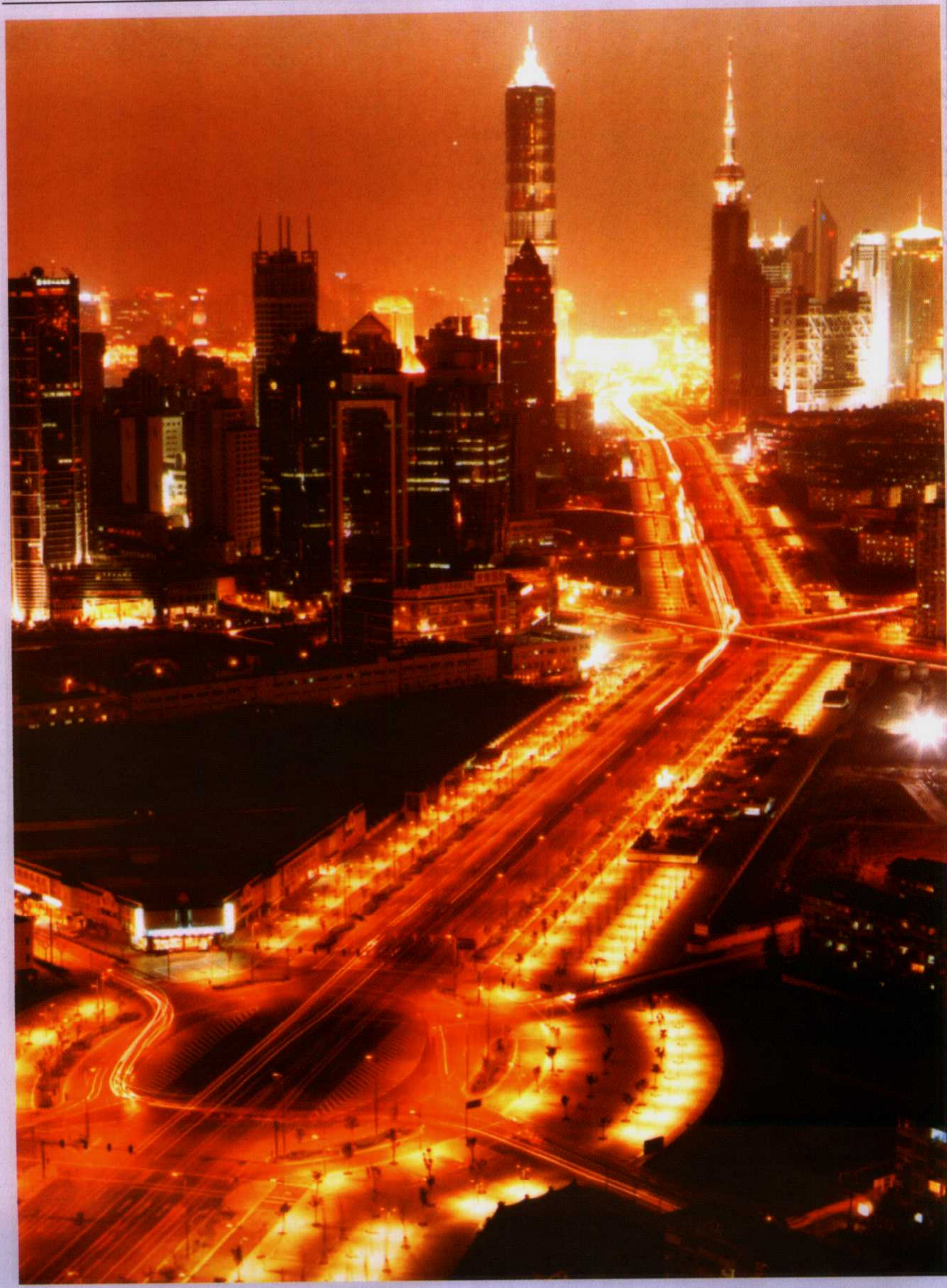
在文化方面，法国受到了热烈欢迎，这证明其“思想和艺术之都”的美誉仍然没有被遗忘。由于法国大使馆文化处的努力，经常在北京和上海举行的艺术展览、音乐会和舞蹈表演或歌剧表演受到了中国观众的好评，以至于这两个大都市自身的文化生活延迟了发展。但无论是1982年让-米歇尔·雅尔（Jean-Michel Jarre）的电子音乐演唱会还是1993年罗丹（Rodin）的雕塑展，都吸引了大量热情的观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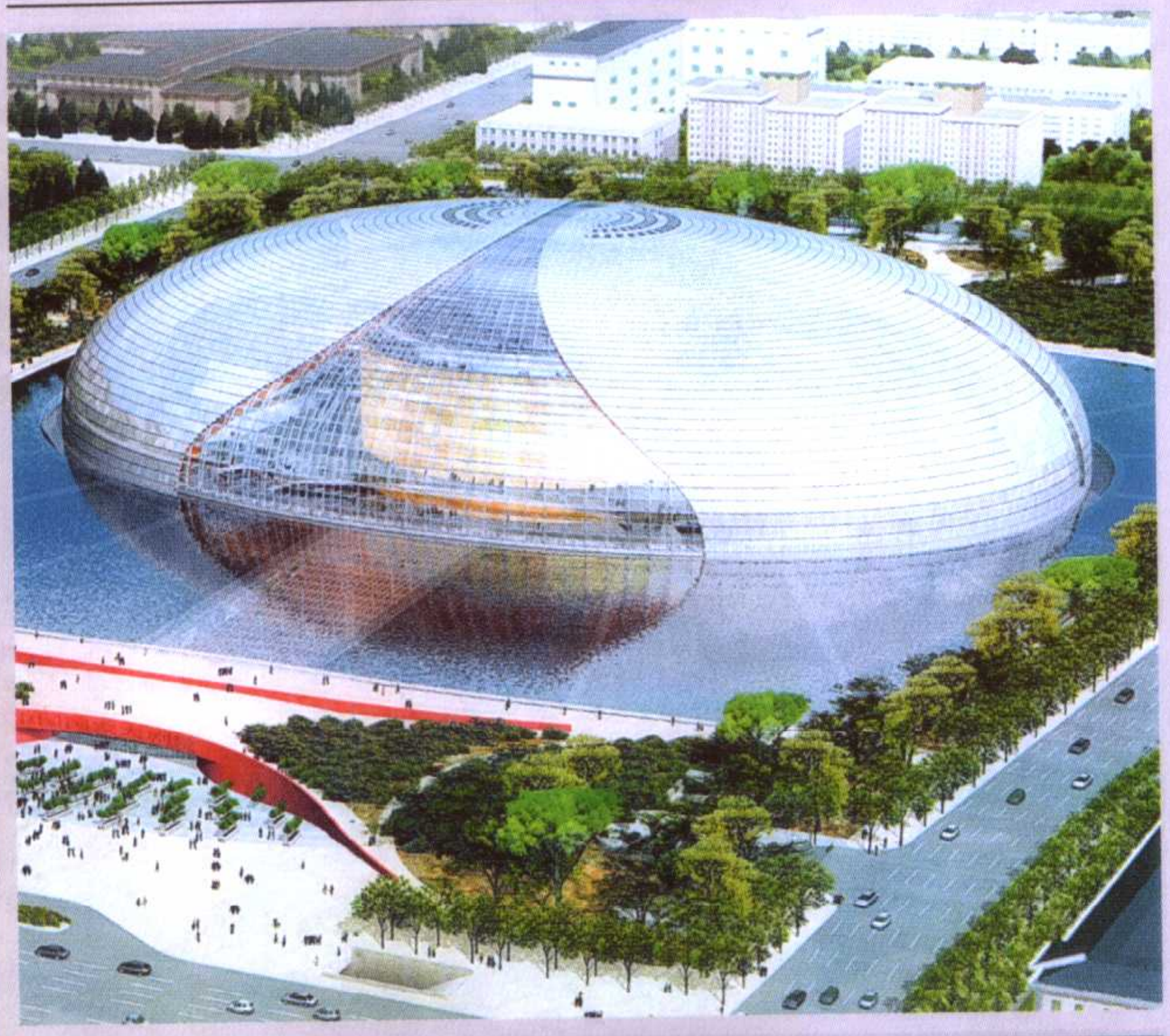
从来就没有被放弃的法语教学，如今在更广的范围重新开始了。其中，中法两国政府奖学金资助的法国留学，有利于法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古典巨著重新允许出版且经常重译。中国大众还认识了一些以前所不了解的作家，像马赛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还有各类现代作家，从弗朗索瓦兹·萨冈（Françoise Sagan）和玛格丽特·迪拉斯（Marguerite Duras），到米歇尔·布托（Michel Butor）和勒内·夏尔（René Char）。杜梅泽尔（Dumézil），列维·斯特劳斯（Lévis-Strauss），巴特（Barthes），福柯（Foucault）和布尔迪欧（Bourdieu）的作品成为大学里研究的内容，同时也成为在法国资助下，



难得的巧合：Carrefour音译成中文是“家乐福”，代表“家庭的快乐和幸福”。







正是法国的建筑师在中国政府为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期多个重大工程设计方案组织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了胜利：让·玛丽·夏庞蒂埃（Jean-Marie Charpentier）赢得了上海大剧院的设计方案，保尔·安德鲁（Paul Andreu）赢得了北京国家大剧院（右上图：一个浮在水池上的钛质水泡）和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设计方案，“建筑工作室”（Architecture Studio）则赢得了上海2010年世界博览会（右下图，设计方案模型准备重新将一个运河网引入到这个昔日的水上城市中来）的设计方案。这些建筑师吸引了中国的决策者，因为他们懂得将现代性和中国传统美学原则融合起来（与自然和谐，对环境尊重）。另一方面，让-玛丽·夏庞蒂埃（Jean-Marie Charpentier）以按照香榭丽舍大街（Champs-Elys□es）（左图）布局的浦东新区世纪大道（l'avenue du Si□cle）的设计理念，和对市中心商业干道南京路步行街进行的整治，重新赋予了上海“东方巴黎”的美誉。

三联出版社系统翻译项目的对象。所有这些出版物都影响到了研究所和某些杂志编辑委员会之间的轰动知识界的思想辩论。它们也参与了中国文学的复兴。几十年来一直遵循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确定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唯一模式的中国文学恢复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尝试性和现代性。



法国的中国人聚居区及文化身份模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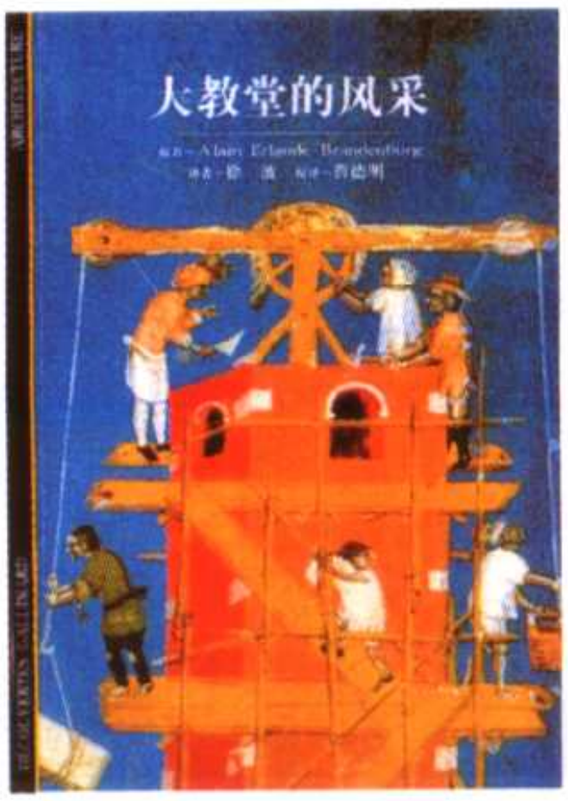
社会主义制度的温和同样也有利于中国到法国的旅行和文化迁移。但中国在法国的存在尤其表现为数量众多的常住侨民，其中一部分来法国已经很久，甚至取得了法国国籍。整个20世纪，法国的中国人聚居区经历了好几股浪潮。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和战后来到法国并最终定居下来的中国劳工和学生形成了在法国的中国人社区的雏形。当中国社会主义胜利时，那些到达法国的人们，尽管数量不多，却形成了新增加的中国侨民。1976年，美国在越南的失败，导致西贡中国城——堤岸的成千上万中国人来到法国，1978年又有成千上万柬埔寨中国人为躲避“红色高棉”来到法国。最后一股浪潮，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对外开放出现的。人数很少，有些是秘密的，无论他们的流亡是出于政治原因还是经济原因，中国移民总体说来很好地融入了法国社会，但没有抛弃他们原有的文





化，因而有利于中法双方的互相认识。

在各种公共或私人的协会中，很多流亡者通过讲座、汉语课、书法或绘画来传播中国文化。从中受益的并非只有那些土生土长的法国人，还有那些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移民和那些保持或重新找到祖先遗产的混血家庭的孩子。多亏了那些精通两种语言的移民，中国古代和现代文学的翻译作品大大增加了，这促使形成了文学丛书，甚至产生了专门的出版社来补充由安田朴（Etiemble）创办于1956年、长期以来无所匹敌的“认识东方”丛书（伽利玛出版社）。其他中国人聚居区的成员则用法语批评



罗丹（Rodin）雕塑展让中国观众看到了他们熟知的作品《思想者》（上图，在上海），也让他们发现了他们不熟悉的罗丹作品。出版商也出版了让人更好了解法国文化的译作：侧图为“发现之旅”丛书中的一本关于教堂风采的书（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左页插图为法国思想家丛书“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选集。



在巴黎及其附近的中国社区，中国春节的庆祝活动成了一次色彩绚烂的表演机会，在锣鼓声中舞狮子耍龙灯，这吸引了法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右页上图，巴黎八区的调龙灯)。在这个节日里，法国顾客和中国顾客争相光顾的中国餐馆创下了人流量纪录，像贝勒维尔（Belleville）地区的这个餐馆，一只红绸狮子到每张桌子前向光顾该餐馆的客人问好。

作为工具学习他们的原有文化，致力于继续进行汉学研究，例如，程抱一（François Cheng）按照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方法来分析中国古代诗歌和绘画。

2002年进入法兰西文学院的程抱一，和亚丁(Ya Ding)、戴思杰一样，还代表了一类新型的作家，我们不知道应该称他们为讲法语的中国作家，还是原籍中国的法国作家。尽管他们的作品用法语写成，而且附有法国文学上的参考，但这些作品代表了一段历史、一些图像，一种视觉和感觉的方式，或者甚至是一份以新颖吸引读者的对世界和对语言的报告。

流亡在法国的中国艺术家同样以新颖的创造形式丰富了法国文化。在20世纪20—30年代，一些被“艺术之都”吸引的画家从形象绘画中得到启发，继续发展中国艺术。而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像唐海文和赵无极这样定居在巴黎的画家，更多的是向



抽象画发展，于是又重新回到了中国传统艺术的表现手段。在这方面，他们和法国艺术家的路线不期而遇了，像赵无极的朋友亨利·米肖（Henri Michaux）和法比耶纳·韦迪耶（Fabienne Verdier），每个人都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吸收中国绘画和书法的技巧和原理，使之形成了一种个人的表现手法。

中国艺术家还在法国获得了在他们的祖国所不常有的欢迎和创作条件。近几年，由于国家和私人的资助，他们中很多人都从在艺术家或作家的文化馆的短暂居住，参加沙龙或（学术）讨论会，甚至参加展览或演出中受益匪浅。因此，尽管有时不得不与国际艺术市场妥协，他们还是能够让他们的作品成名。

生活艺术互相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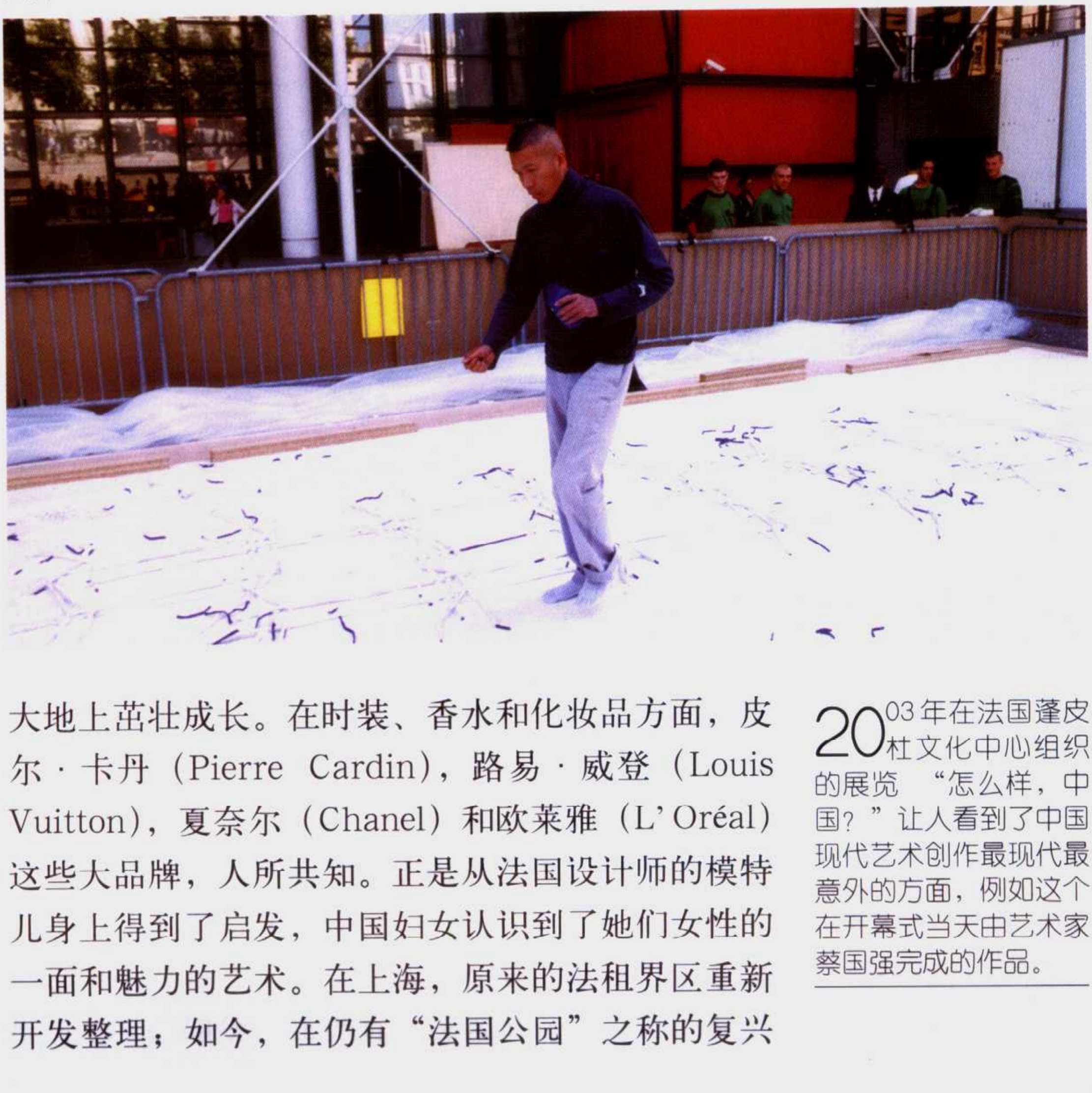
中法之间交流的增多，形成了双方更好的相

多亏了中国移民和法国汉学家的翻译工作，读者能够接触到中国文学最近的作品，比如前文化部长兼小说家王蒙的《一笑集》（下图）。



互认识，但同样也造成了这样的反常现象：在日常生活中，每个民族高度评价对方的而不是自己的生活艺术。对中国人来说，他们刚刚走出个人主义、美丽和娱乐都被禁止的时代，法国就成了美好生活、品位、豪华和高雅的国度。那些近年来迅速富裕起来的人们，建造了带花园的法式豪华别墅。在这个美食传统悠久的国家，法国美食也毫不费力地找到了它的信徒。在北京或上海开设分店的巴黎餐馆总是座无虚席。从法国进口的红酒和烈酒重新获得了其在19世纪享有的盛名，法国的葡萄苗木也在中国大地上茁壮成长。在时装、香水和化妆品方面，皮尔·卡丹（Pierre Cardin），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夏奈尔（Chanel）和欧莱雅（L'Oréal）这些大品牌，人所共知。正是从法国设计师的模特儿身上得到了启发，中国妇女认识到了她们女性的一面和魅力的艺术。在上海，原来的法租界区重新开发整理；如今，在仍有“法国公园”之称的复兴





2003年在法国蓬皮杜文化中心组织的展览“怎么样，中国？”让人看到了中国现代艺术创作最现代最意外的方面，例如这个在开幕式当天由艺术家蔡国强完成的作品。



在中国学习了西方绘画之后，赵无极于1948年来到巴黎，在那里他发现了帮助他“重新恢复为中国画家”的塞尚（Cézanne）和抽象艺术。旁边的这幅作品代表了他从那以后的绘画风格，图中的线条和色彩不再力图重现表象的世界，而是力求抓住那赋予万物生命的看不见的气息。

公园，人们学跳华尔兹，渴望找到拥有法国式浪漫和文雅的舞伴。

在中国人向往奢华和过分讲究的生活的时候，法国人则向中国学习简单自然的生活。印度公司经理弗朗索瓦·道特尔斯姆（François Dautresme）在几十年间酷爱收集的那种用稻草、竹子和灯草纸做成的艺术品，渐渐取代了丝绸、瓷器和漆器，成了空前流行的中国式装饰。中国餐饮也获得了卫生、不油腻和有益健康的饮食的好名声。吃豆制品成了一帖万灵药，具有让人放松功效的中国绿茶也成为了法国人最喜爱的饮料之一。人们也越来越多地向传统中医求助，以治疗西方科学所不能治愈的病痛。他们还练习武术，像太极拳和气功等，以减轻现代生活的压力和强身健体，应对日常生活中可能遭受的侵袭。



中国的年轻电影艺术家往往从传统中提取灵感，这可能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在国外的成就比在中国国内要大：就像陈凯歌，以《霸王别姬》获得1993年法国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

所有这些着眼于调和身心、调和人与自然的生活方式，大部分都建立在道家哲学的基础上：由于汉学家的努力工作，人们更多地了解了道家哲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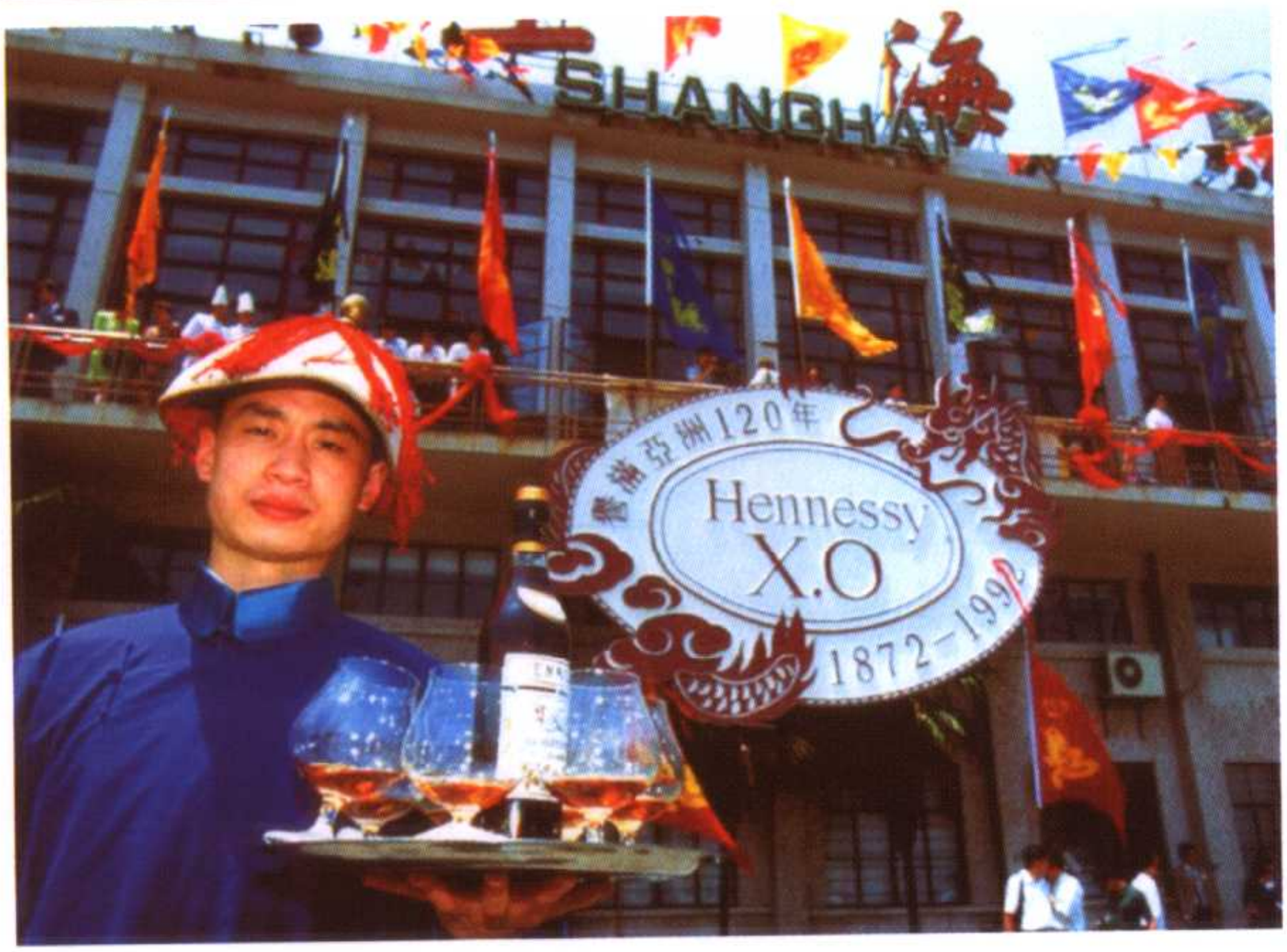
这种哲学尤其以它的实用主义和个人主义吸引着现代人，看来成了特别适应现代社会的一种睿智。

今天，就和昨天一样，每一个民族都将对方当成一个形象，这个形象教会我们，关于愿望、梦想和烦扰的东西事实上要比我们自己都多。然而在通讯发达的时代，每个民族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在对方的镜子中照一下自己，重新掌握其文化中被遗忘的方面，努力改正其自身的形象。



欧莱雅公司选择女演员巩俐（下图）作为其在中国的广告代言人，因为她体现了一种与西方标准相近的美并且誉满世界：这足以让在中国发行的《ELLE》（《世界时装之苑》）等法国杂志的读者羡慕不已。





在所有的法国白酒和红酒中，中国人最偏爱白兰地：轩尼诗（Hennessy）公司（左图，在上海）从19世纪起就进入中国，从这个时代起，如果没有白兰地就不能算是中式宴会。在法国，18世纪中国茶深受好评，后来有点不受欢迎，现在又获得了人们的喜爱。从此有了大的茶叶储藏库，一年一次的茶叶展览会以及茶叶专卖店（下图）。



由法比耶纳·韦迪耶（Fabienne Verdier）设计并由中国书法家书写成的2003—2005中法文化年的标识（下页），将代表中国的“中”字和代表法国的“法”字叠放在一起。



见证与文献



98
两种文明的对比

102
徜徉于现实和想象之间的旅行者

106
法国诗人的表意文字欲

110
中国诗人受到的法国影响

112
镜像绘画

114
作家的见证

118
法国的一个战略市场

118
深入阅读书目

121
图片目录与出处

125
索引

两种文明的对比

在中法两国文明的发展史中，两大文明曾彼此一无所知，但又是同样地自命不凡。这就导致在经历了充满好奇而相互吸引的初次接触后，两者之间产生了激烈的对抗，只有承认双方的共同价值方能使之平息。

“欧洲的中国”

在乾隆皇帝的皇宫中居住了多年之后，耶稣会传教士钱德明惊叹于皇宫的奢华，同时又看到了法国文明在此得以发扬，对此他深以为荣。

有时候他们会对我们说：“贵国是欧洲的中国。其他各国都臣服和效仿于你们的习俗、准则和礼仪。”我实在不知道他们所说的一切从何而来，特别是他们在一部历史地理词典类的书中所写的更是不知其出处。此书的编纂始于康熙朝，奉当今皇帝之命出版面世，因此在其国内极具权威。以下内容是我从此书中的“法兰西”一文中逐字翻译过来的，尊敬的神甫，您一定不会对此感到失望的。这可是一个高傲的国家对法国的极大赞美，要知道它是从不把其他民族视为文明人的。

这本书中说道：“法兰西，分为一十六省。其首都名曰巴黎。此城之引人注目，尤以一学院为最。院内学生数目，常逾四万。除此另有学院七所，尚不计为贫者所设之免费学校也。所有院校均属法兰西国王……法王有异能，遇有瘰疬，以手触之辄愈。此术一年只可一次，尚需斋戒三日，方可施行。法兰西下辖五十王国。”我不知道这里的王国意何所指……但不管它意指为何，我想他们对我们的王国评价如此之高，其最大原因在于中国皇帝库藏和室内装饰所用的机械、仪器、珠宝和其他珍奇物品大部分都带有法国王室的纹章或刻有某个法国工匠的姓氏。“这还是我们国家的。”教友王致诚的一位弟子看着要他临摹的皇帝的佩刀如实说道。这个中国人知道这把刀的刀身是法国制造的，并注意到刀身上印有百合花徽（百合花徽是法国王室的标志——译注）。在这里百合花徽已是众所周知、处处生辉。在我们教堂的大厅里，在我们的圣餐杯、祭披和十字架上，在我们祭台的所有饰物上都可以看到它。在我们的住宅中，它出现在大部分的书籍、仪器、自鸣钟和风信旗上，几乎在房屋的每一个角落都能找到它的踪影。在我们的住宅之外，它藏身于达官显贵的府第中

他们所拥有的奇珍异宝之间。它还现身于中国的皇宫，其数量之大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绝不亚于卢浮宫或凡尔赛宫中法国王室纹章的数目。

钱德明神甫的信，
1754年10月17日，
节选自《耶稣会士书简集》第13卷，里昂，1819年版

“这就是文明对野蛮的所作所为”

法国与中国，两者间谁更文明，更开化？对于帝国主义的法国来说，答案再清楚不过了。惟有维克多·雨果揭露了法国在1860年犯下的洗劫圆明园的罪行。

在地球的一隅，曾经有一个世界奇迹，这个奇迹叫做圆明园。艺术有两个原则：产生欧洲艺术的理念和产生东方艺术的幻想。在幻想的艺术里，圆明园就是理念艺术中的巴台农神庙（Parthéon）。它会集了一个超人的民族的想象力所能创造出来的全部成果。巴台农神庙是一个绝无仅有、举世无双的杰作，而圆明园却堪称幻想艺术之崇高典范，如果幻想可以有典范的话。请想象一下这座无法用语言描绘的、如同月宫般的建筑吧，那就是圆明园。这梦幻般的奇景是用大理石、玉石、青铜和瓷器建成，雪松木做梁，以宝石点缀，用丝绸覆盖；神庙、后宫、城堡分布其中，诸神众鬼就位于内；彩釉珐琅，熠熠生辉，金粉胭脂，富丽堂皇；在如诗人般的建筑师们创造出《一千零一夜》的一千零一个梦境之后，再加上花园、水池及水雾弥漫的喷泉，还有天鹅、白鹭和孔雀。一言以蔽之：这是一个以宫殿和庙宇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充满人类神奇幻想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宝库，这就是圆明园。为了创造它，曾经耗费了整整两代人成年累月的劳动。这座宛如城市般巨大的建筑是经过了几个世纪才建成的，它为谁而建？是为世界各族人民。因为历史的结晶是属于全人类的。艺术家、诗人、哲学家个个都知道圆明园，伏尔泰就提起过它。人们常说，希腊有巴台农神庙，埃及有金字塔，罗马有竞技场，巴黎有圣母院，东方有圆明园。尽管有人不曾见过它，但人人都梦想着它。这是一个震撼人心却尚不为外人所熟知的杰作，就宛如是黄昏中从欧洲文明的地平线上影影绰绰呈现出来的遥远的亚洲文明的一个剪影。

这个奇迹现已不复存在了。

一天，两个强盗闯入了圆明园，一个抢劫，一个放火。看来胜利也许就是一场掠夺。两个胜利者一起彻底毁灭了圆明园。这一切所作所为，均出自额尔金（Elgin）之名。这不禁使人油然想起巴台农神庙的遭遇。他们以当初对待巴台农神庙的手段对付圆明园，而且这次干得更为彻底、更为出色，以至于荡然

无存。即使把我们所有教堂的所有珍宝加起来也无法与这座神奇无比、光彩夺目的东方博物馆相媲美。那里不仅有艺术珍品，而且还有数不胜数的金银财宝。多么伟大的功绩！多么丰硕的收获！这两个胜利者一个塞满了口袋，另一个见状也如法炮制，装满了好几口箱子，然后勾肩搭臂，眉开眼笑地回到了欧洲。这就是两个强盗的故事。

我们欧洲人总认为自己是文明人，在我们眼里，中国人是野蛮人。然而这就是文明对野蛮的所作所为……

维克多·雨果，致巴特莱（Butler）上尉的信，
1861年11月25日

“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

在认识到法国大革命所产生的世界性的价值之后，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展开了一场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的论战。

……

欧罗巴之文明，欧罗巴各国人民皆有所贡献，而其先发主动者率为法兰西人。

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焕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

法兰西革命以前，欧洲之国家与社会，无不建设于君主与贵族特权之上，视人类之有独立自由人格者，唯少数之君主与贵族而已，其余大多数之人民，皆附属于特权者之奴隶，无自由权利之可言也。

自千七百八十九年，法兰西拉法耶特（Lafayette，美国《独立宣言书》亦其所作）之《人权宣言》（La 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刊布中外，欧罗巴之人心，若梦之觉，若醉之醒，晓然于人权之可贵，群起而抗其群主，仆其贵族，列国宪章。赖以成立……

由斯以谈，人类之得以为人，不至永沦奴籍者，非法兰西人之赐而谁耶？

宗教之功，胜残劝善，未尝无益于人群。然其迷信神权，蔽塞人智，是所短也。欧人笃信创造世界万物之耶和华，不容有所短长，一若中国之隆重纲常名教也。

自英之达尔文，持生物进化之说，谓人类非由神造，其后递相推演，“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之格言，昭垂于人类。人类争吁智灵，以人胜天，以学理构成原则，自造其祸福，自导其知行，神圣不易之宗风，任命听天之惰性，吐弃无遗。而欧罗巴之物力人功，于焉大进……

然追本溯源，达尔文生物进化之说，实本诸法兰西人拉马尔克（Lamarck），拉氏之《动物哲学》出版于千八百有九年，以科学论究物种之进化与人类之由来，实空前大著也。其说谓生物最古之祖先，为最下级之单纯有机体……其后五十年，倾动世界之达尔文进化论，

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青年杂志》1915年1月号

盖继拉氏而起者也。法兰西人之有大功于人类也又若此。

近世文明之发生也，欧罗巴旧社会之制度破坏无余，所存者私有财产制耳。……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无容讳言者也，欲去此不平等与压制，继政治革命而谋社会革命者，社会主义是也。可谓之反对近世文明之欧罗巴最近文明。其说始于法兰西革命时，有巴布夫（Babeuf）者，主张废弃所有权，行财产共有制（La communauté des biens）。其说未为当世所重。19世纪之初，此主义复盛兴于法兰西。圣西门（Saint-simon）及傅里叶（Foarier），其最著称者也。彼等所主张者，以国家或社会为财产所有主，人各从其才能以事事，各称其劳力以获报酬，排斥违背人道之私有权，而建设一新社会也。其后数十年，德意志之拉萨尔（Lassalle）及马克思（Karl Marx），承法人之师说，发挥而光大之……

财产私有制虽不克因之遽废，然各国之执政及富豪，恍然于贫富之度过差，决非社会之福。于是谋资本、劳力之调和，保护工人，限制兼并，所谓社会政策是也。晚近经济学说，莫不以生产、分配相提并论。继此以往，贫民生计，或以昭苏。此人类之幸福，受赐于法兰西人者又其一也。

此近世三大文明，皆法兰西人之赐。世界而无法兰西，今日之黑暗不识仍居何等？……

徜徉于现实和想象之间的旅行者

每一位旅行者，不管是法国人还是中国人，都是透过其文化背景、阅读经历以及他的梦想和愿望来感知他所游历的国家的现实的。因此，他们的叙述既能使我们认识他们自身和他们所处的时代的看法，同时又可以使我们了解到他们根据自己的期望做出评价的其他的人和事。

为巴黎着迷的中国人

应英国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之邀，王韬于1867至1870年游历了欧洲，从而成为最早访问法国的中国文人之一。他以新奇而赞叹的目光注视着巴黎的一切。

法京巴黎，为欧洲一大都会。其人物之殷阗，宫室之壮丽，居处之繁华，园林之美胜，甲于一时，殆无与俪。

居民百余万，防守陆兵三十万，按街巡视，鹄仪严肃，寂静无哗；此外亦设巡丁，密同梭织……

马达兰街，义大廉街咖啡馆星罗棋布，每日由戌初至丑正，男子咸来饮酌。妓女亦结队成群联翩入肆，游词嘲谑亦所不拒。客意有属即可问津，舍一金钱不仅如吴市之看西施也。道路坦洁，凡遇石块煤渣稍有不平，石匠随时修补。车声辚辚，彻夜不绝。

都中以宫殿最为巨丽。宫门外临街，有楼翼然，其下可建十丈之旗，车马皆由此而过。

入内，树木蓊然郁茂，一望青葱。再进，环之以池。铁栏之内，则为禁地，人不得入。如国王驻跸宫中，上悬一旗，出幸则否。凡欲游王宫者，俟王他出，先谒其国之驻扎公使，乞其名柬为先容，例得入而瞻仰焉。王宫左右，悉系巨铺，格局堂皇。

酒楼食肆，亦复栉比。客至呼肴，咄嗟立办。市廛之中，大道广衢，四通八达。每相距若干里，必有隙地间之，围以铁栏，广约百亩，尽栽树木，槭荫扶疏。游者亦得入而小憩，盖藉以疏通清淑之气，俾居人少疾病焉。

至于藏书之所，博物之院，咸甲于他国。法国最重读书，收藏之富殆所未有。计凡藏书大库三十五所，名帙奇编不可胜数，皆泰西文字也。惟“波素拿书库”则藏中国典籍三万册，经史子集略备，余友博士儒莲司其事。儒莲足迹虽未至中土，而在其国中钻研文义，翻译儒释各经，风行于世，人皆仰之为

宗师，奉为圭臬……

簪士伊地殊宽阔，约四五里许，东狭而西广，由渐恢拓，略如张箕形。有一通衢横亘其中，两旁遍植树木，青苍一色，弥望葱茏。戏馆乐院，悉在其左右。昼则车马殷阗，夜则笙歌喧沸。寻春侠客、挟弹王孙掉臂游行其间，以为乐甚；至一夕之费，动逾十万金钱，罔所吝惜。每值良辰令节，国庆民欢，名剧登场，士女云集，人人俱欲争先快睹，娱目赏心，无以过此。戏馆之尤著名者，曰“提抑达”，联座接席，约可容三万人，非逢庆赏巨典，不能坐客充盈也。其所演戏剧或称述古事，或作神仙鬼佛形，奇诡恍惚，不可思议。山水楼阁，虽属图绘，而顷刻间千变万化，幾于逼真。班中男女优伶多或二三百人，甚至四五百人。

王韬

《漫游随录》

看看北京，一个孩子的梦想

1867年，德·博瓦尔（de Beauvoir）伯爵来到了北京。他的记忆中充满了马可·波罗对于中国的奇异的描述。然而，呈现于他面前的景象使他感到厌恶。这两种情感在他的脑海中纠缠在一起，相持不下。

清晨，天还没亮，我们就起床了。因为我们控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只要一想到几个小时之后就能到达北京：令我们魂牵梦绕，不惜远涉重洋的北京！

尽管十一个月来在各地看到的不断变化的景象也许使我们的好奇心有所消减，然而毫无疑问，当我置身于如此一个北京时仍不禁感到了巨大的震撼！可以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里比这儿更令人触目惊心，除非还能再找出一个如此悲惨的地方。在等待着来访者的诸多震惊中，最意想不到的无疑是看到自己走在一个闭关锁国的帝国中心的好奇的人群中。这个国家本是禁止外国人进入的，但后者打开了它面向文明的大门，依靠的却是武力甚至往往是残酷的暴行。

我们横穿了四分之三个北京，从外城郊区直到紫禁城周边。在近两个小时内，我们并没有时间详加观察，只是走马观花地巡视了商业区和官员府邸聚集区。这是该城整体上的概貌，稍后我们会探求它的具体特征，但我的第一印象是：没有见过北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没落。底比斯、孟菲斯、迦太基和罗马的遗迹会使人回想起这些城市当时所受的毁灭性打击，而北京却是自己毁了自己，就像一具尸体，日渐化为灰烬。

我在环绕着内城的几乎完好无损的宏伟城墙上放眼藏于其深处的宫城和皇城；我探寻棱堡、盖有宝塔顶的城门和城墙角上的堡垒的壮丽景象，端详突现于一片真正的森

林中间的庙宇的锥形琉璃顶；我又折回外城，注视于这内城的真正底座，最后想象着这一切是如此生动、明艳、鲜活，水流清澈纵横，城外戒备森严，城内熙熙攘攘。此时，我仿佛梦见千年前的北京重现于我的脑海，我惊讶不已，无所保留地赞美着这远东的奇迹。

然而，渐渐地，我开始正视现实的景象：我走遍了被高大的马车碾出了深深的痕迹的街道。街上破旧的下水道仿佛巨大的楼梯，由下一直延伸到狭小的街面，就好似在房屋的两边设置了一道道深渊。为了更好地观察，我下了车，立时便陷入了散发着恶臭的百年污垢的尘土之中。沿着毁坏废弃的红色大理石桥下那永远干涸了的沟渠、运河、河流我一路探寻：这些曾经辉煌的园林和池塘已变为了荒漠。在大理石的凯旋门旁，贫苦商人们的坍塌了的茅屋上木杆林立，只有那上面的纸招贴在风中飞舞。这一切统一于厚厚的一层呛人而令人窒息的尘土之下，使人不寒而栗。——面对此情此景，我对自己说，不，这根本不是一座城市，这不就是一所在沙漠中受着西蒙风（非洲和阿拉伯等沙漠地区的干热风——译注）蹂躏的鞑靼人的集中营吗？

德·博瓦尔伯爵，
《环球游记》
(Voyage autour du monde)，
巴黎普隆（Plon）出版社1872年版

两个神话的相会

在1965年访问中国时，马尔罗重又找回了青年时代对于中国革命的热情。他把中国的共产主义神话和他个人的传奇经历相结合，讲述了其在延安的参观访问。

我曾表示希望去延安，他们便安排了一架飞机供我使用。

这就是斯巴达。真理、传奇，还有使过去的战斗延续为史诗的无形力量，一切都汇集在这些布满窑洞的山冈上。山脚下是革命博物馆。

馆内展出或者暗示的几乎都是三十年前发生在这里的事。那是一个业已消逝的时代。黑骑兵出发穿越峡谷，士兵们在长城上奔跑，树干箍上带刺铁丝制成的大炮，红缨枪和操练用的木枪丛中头戴伪装以树叶的帽子作头盔的游击队员，他们的红缨要比南方民兵的长，还有自制的土榴弹。这里有代替纸张用的桦树皮，自己织布制衣用的纺车。但这里并没有甘地，他远在他方。这是印钞机，纸币是非常简朴的纸币，印钞机是非常一般的印钞机，是由敌占区的工人拆成零件运来的。在毛泽东到来以前，这些东西一直都是在战败者手里的。我在西伯利亚听到过关于原始游击队的回忆，但西伯利亚的游击队员不能以一当百，根本无法与这里所展示的一切相比：扎克雷（jacquerie）起义成了革命。在中国的博物馆里展出着

太平天国领袖在失败以前戴的铁头箍，这种铁头箍扎克雷的头领们也戴，只是在他们被国王的军队抓住以后换成了烧红的铁箍。中国千年的农民地位，各国农业时代的农民地位在这里凝固了，在农民即将站起来征服中国时凝固了，窑洞里的一个人将领导农民走向胜利。在展馆的橱窗里，红缨枪之后，出现了从日本人手里和从蒋介石部队那里缴来的步枪和机枪。女讲解员梳着两根传统的小辫子，脸带着微笑，以尖锐的嗓音讲述着这部史诗，直到最后一个展厅，那里陈列着长征途中一路驮着毛泽东的忠心耿耿的马儿的标本……

这是拿破仑时代近卫队的老兵向不识字的农民讲述的拿破仑，这是巴尔扎克（Balzac）在《乡村医生》（Le Médecin de campagne）中借亨利·莫尼埃（Henri Monnier）之口讲述的拿破仑，这是西西里的木偶演员解说的《愤怒的罗兰》（Roland furieux）。然而，这种学究式的崇拜并非仅仅涉及毛泽东的坐骑和他用过的砚台，解放本身引发的激情开始出现并超越于这种崇拜之外。这些木枪、红缨枪是与我们博物馆中的火枪、戟所不同的见证：它们是革命用的武器，就像窑洞是毛泽东住过的窑洞……中国宗教气氛如此淡薄，但它却与它的土地、江河、山岳以及祖先紧密相连，以它对祖先的另一种崇拜与自己的复兴相连，解放的历史就是宣扬这种崇拜的“福音书”。中国古代皇帝被称为天子，在这一意义上，毛泽东就是这种祖先的儿子。像在所有城市里一样，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宣传画，画面上一个牙齿洁白的忠诚的男孩高兴地挥着枪，左手挽着一个怀抱冲锋枪的女民兵。他们没有互相对视，而是眺望未来，那是当然的。他们的苏维埃现实主义，因而是理想主义的风格确定了千百万中国人的梦想。我们离火星和金星真是那么遥远吗？梳着小辫子的女讲解员微笑着的尖声讲解已不再重要，这一男一女，是古代的神和女神。

安德烈·马尔罗
（André Malraux），
《反回忆录》（Antimémoires），
伽利玛出版社1967年版

法国诗人的表意文字欲

部分建立于表意文字原则基础之上的汉字，每个字都通过其书写法对应于一个有意义的符号。汉字使苦苦探寻着一种能够解决各国人民之间交流困难的完善通用语言的西方人着迷。对于寻求一种不受偶然性影响的诗化语言的后马拉美诗人来说，汉字代表着一种理想。

汉字在诗歌中的应用

除了真正学过汉语的谢阁兰以外，对于汉语，其他将要论及的诗人们虽因各种不同的原因对之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兴趣，从而阅读与己相关的汉学著作并查阅字典，但都未能精通。然而，对汉语的深刻认识并未阻碍谢阁兰对于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表现出尤为浓厚的兴趣，一如与他同时代的其他诗人和前几个世纪的作家们一样。事实上，他在1910年为他的诗集《古今碑录》所作的序言中曾如此评说汉字："它们不屑于被诵读；它们根本不需要声音和音乐；它们蔑视多变的声调和因地而异的音节；它们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然而它们确实存在。"他将汉字模拟和象征的一面完美地概括为"服从于事物曲线的不加修饰的符号"。在此之前十五年，克洛岱尔在《符号的宗教》（1896）中同样指出："在中国"，"文字具有这样一种神秘，即它能够表意。没有一个时刻标志着它的期限，这儿不存在方位，符号的开始没有年代：它只是说出它的嘴。它存在，当面看到它的人会觉得它明白易懂。"米肖（Michaux）也对表意文字有形和模拟的一面有着较强的感受力，即便他宣扬它们已成为"不能唤起联想的表意文字"，它们的演进导致它们变得越来越抽象："然而曾有一个时期，这些符号仍然是或者说几乎是富有表现力的，它们已具有暗示意义，更能表现物、物体或物质，表现群体、团体，展现情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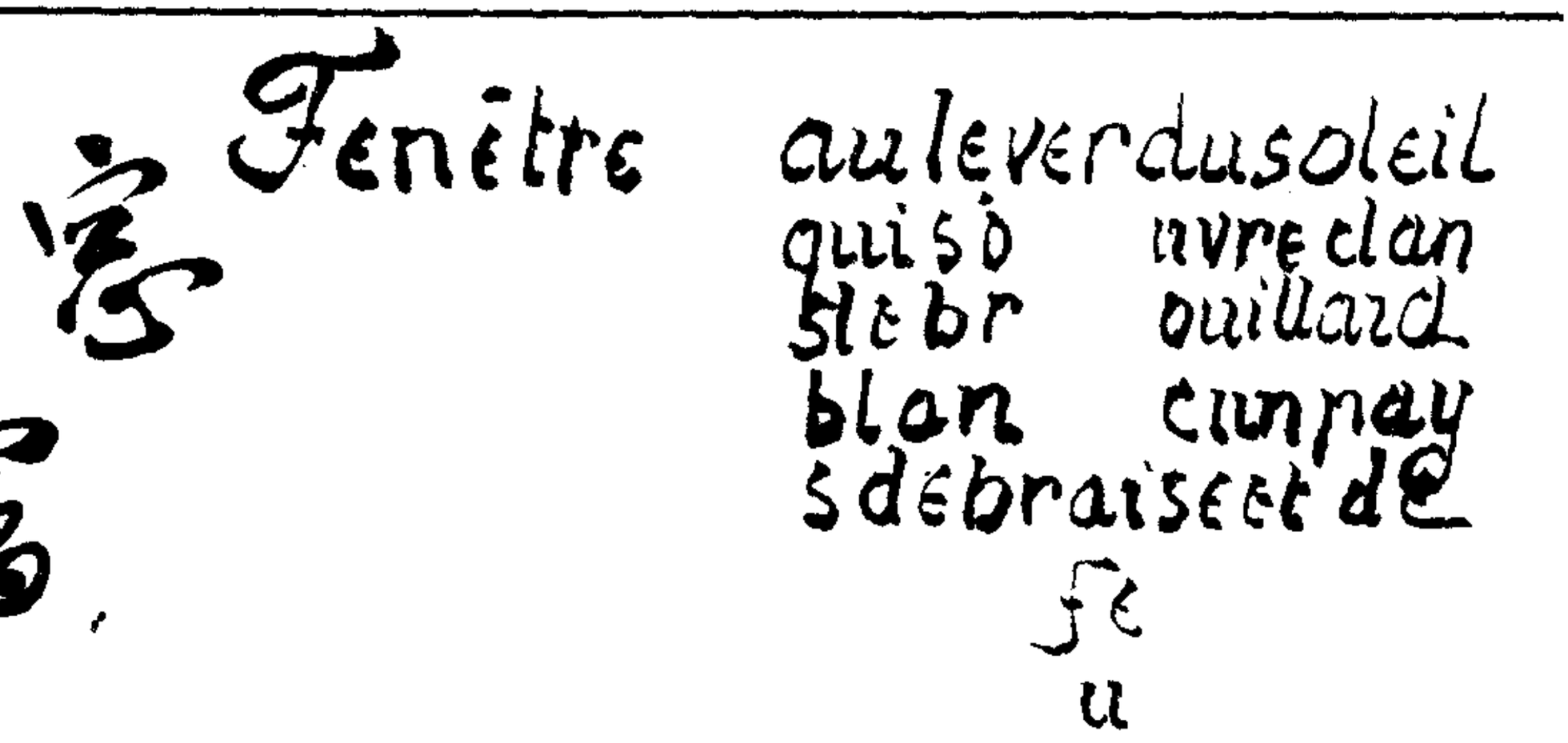
如同我们的诗人们所分析的那样，与拼音文字相比，汉字的优越性表现在它使人们直观地看世界，不必借助于声音，也不必使用随意性的符号：汉字字符最接近于事物本身，这并不是因为它们是对事物的精确描绘，而是因为它们表达了事物的深刻涵义。他们还试图摆脱语言所必有的线形性（表达通过在时间轴上被排列成一定顺序的离散要素组成，被认为是自然语言本质特征的性质——译注），运用多种手法，赋予他们的作品汉字的空间性，

例如以每首诗的“标题”形式插入汉字〔如克洛岱尔的《扇子百句》(Cent phrases pour évantails)〕，或者附上印章或铭文（如谢阁兰的《碑》和《画》）。

尽管在所有这些作品中，法文或英文仍是首要的，但是由于人们不得不注意到的表意文字的存在，使得线形性阅读推迟或中断。此外，他们在作品的构成层面上转移了表意文字的可视性，在书本的物质性本身从总体上赋予它们一种看得见的有意义的形式（如《碑》和《扇》）和结构。克洛岱尔在模仿汉字的尝试中走得更远。在《扇子百句》和《西方的表意文字》中，他采用了一种手写字体，通过字母的形状和布局，呈现出“它所意谓的物体的某种再现”。

汉字还引导诗人们构想一种隐喻语言，这种语言以表意文字学的方式运作，即它不是通过直接的单义的所指而是以数个单一形象的组合来表达思想和情感等。克洛岱尔看来是运用这种方法的第一人，尤其是在《第七日的休息》一书里，书中形象常常伴以给予它们灵感的汉字的明确参照。下面这段文字就是这种情形：“正如你们的文字‘東’所表征，太阳/以它表面的力量把树木从土中拔起：/树木向天空伸出枝条，同时它又扎根于土壤”，从中我们认识到，表示东方的表意文字“東”，是由象形文字“日”和勾画出带有枝和根的树干的“木”字所构成。

克洛岱尔，至少是在这部作品中，显露出他曾读过索隐派耶稣会会士的著作。因为和后者一样，他从构成汉字的图形中看到了基督教的符号（如此“汉字‘十’”就表现为“人类十字架的形象”）和圣经事件的预兆（这样挪亚方舟就被汉字“舟”所预示，“‘舟’字表示八张口”，即挪亚——“你们称作伏羲”，也就是黄帝——“带着他的妻子/三



保尔·克洛岱尔，“窗”，出自《扇子百句》(1927)，伽利玛出版社1942年版。

个儿子和三个儿媳”）。

谢阁兰却不屑于这种犹太中心论而采纳了一种中国中心主义的看法：在《画》一书中，列队行进于“王国的随行人员和陈列的供品”之间的基督教国家的使节所戴的十字架实际上被表现为“一个已知的符号：汉字‘十’，它那交叉的线条可能具有一种新的含义”。谢阁兰因而并不试图在这些表意文字中再现已知的真理，但他也考察它们的书写法以从中得出揭示生命和事物深刻本质的形象。例如，他认为皇帝“是天底下独一无二的，他顶天立地”，这反映在“王”字上，它的构成是层叠着的三横——上面的代表天，下面的代表地，中间是人世——之间连以一竖，象征皇帝一统天、地、人的作用。

最后，汉字还可以成为诗歌灵感的来源，这并不是因为它们的词源——不管是实在的或是假想的——暗示着事物之间的新的联系，而是因为它们是谜，是每个人都应解开的潜在意义的结。通过它们的能够引起联想的书写法，汉字符号构成了一个形式的容器，就连对它的含义毫无所知的人也能像从镜子里一样，从中察知其内心深处的奥秘。……因此《勒内·莱斯》的叙述者，在他朋友交给他的“宫殿爱情第一夜”的布满汉字的谜样字条前，以想象填补了他对其意义理解的不足：“我已尽力辨认，但难道我是一个差生，还是这作业实在太难？这些汉字描绘出令人生畏的东西：刀、带勾的矛、纵向或竖起的眼、花、鼠牙、收腹的妇人、井、窟窿、坟墓、封盖的洞穴……魔法炉……空的口……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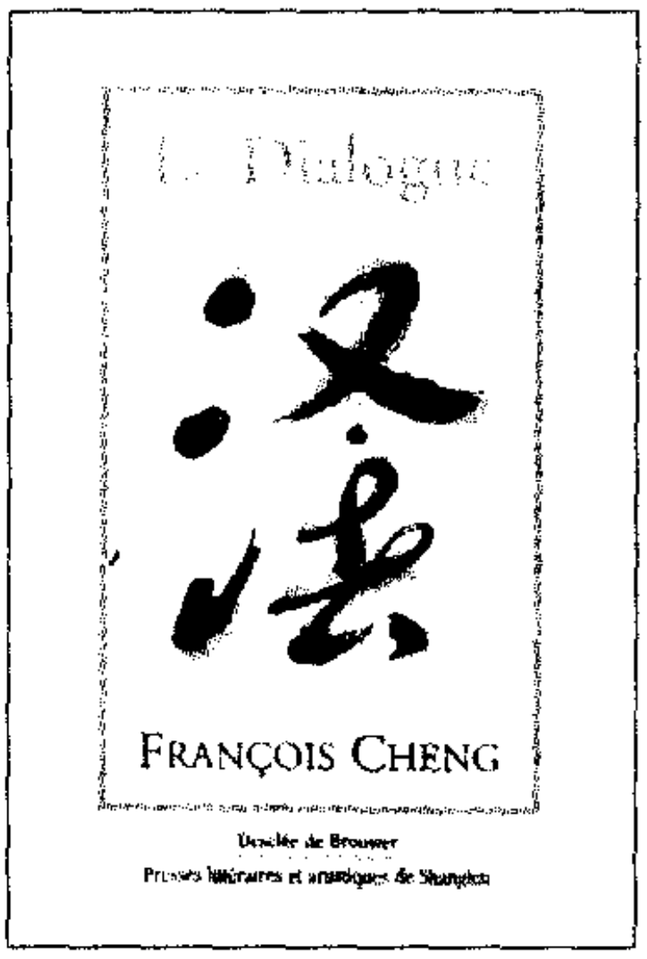
在这些表面上没有关联的拼凑起来的形象的列举中隐约可以看到贪欲、监禁、吞没等幻影，尽管并不真正明白，但叙述者和他的朋友——也是他的化身——勒内·莱斯都感觉到了这些景象。亨利·米肖在《表意文字在中国》一书中也指出：“写着字的每一页，布满汉字的每一面，都变得拥挤而满溢，充盈着事物、生命和世间存在的一切……中国世间的一切。”在展现诗人看来源于汉字的多彩的中国“情景画”的两页之后，随之“产生想象/或化为诗歌”。如同罗尔沙希(Rorschach)的测试一样，这些表意文字产生出大量的影像，显露出欲望、恐惧和幻想。

因此，归根结底，汉字就好似母体，以之为基础，每个人都能讲自己的语言。这是因为人们认为它并没有写下任何一种特定的语言，或用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符号帝国》中的话说，因为“构成它的是言语的真空”。

缪里尔·德特里，
《汉字在西方》，
选自陈顺妍(Lee Mabel)、
孟华编《文化对话与误读》，
堪培拉野芍药(Wild Peony)
出版社1997年版

语言的诗意对话

1949年来到法国的程抱一长期以来一直在其母语和其定居国语言之间左右为难，直到他选定了法语“作为创作工具”的那一天。然而他的诗化语言其实就是这两种语言的紧密结合。



今天回想起来，我可以肯定地说，一个人舍弃其母语必然是一种牺牲，但是满怀热情地接纳另一种语言则会带来补偿。多少次，我体会到了如同在创世之初重新命名万物的那种兴奋和喜悦。

至于我的产生于两种紧密结合的诗歌传统的诗究竟是什么，稍后我将作进一步的阐明……现在我们只谈与符号有关的方面。由于我曾受到表意文字的熏陶，其每个字符都形成一个生动的独立的单位，所以我对于字词的音质和可塑性有着一种独特的敏感。确实，我倾向于像感受表意文字一样去感受许多法语单词。说后者也是表意文字，当然不是因他们的笔画，因为它们属于拼音文字系统——尽管某些字母的书写法对我而言并非毫无意义：A，人；E，梯子；H，高度；M，房屋；O，眼睛；S，蛇；T，屋顶；V，山谷；Z，条纹，等等——是语音的方式使它们的形象所表达的概念得以具体化。为了说明这一点，具体的例子必不可少……

Entre

“Entre”这个词有间隙和进入两重含义，它的书写法简洁明了地暗示了这一点。悬空的这个音（-EN）好比是一只等待时机的鹰，在对峙的两个实体之间，不管激励着它们的是敌对还是调和，一有最为微小的机会就要进入（-TRE）空间打开的缺口。我们认识到了，在这些发生在被中空的气息包围着的生动的实体之间的事情上，中国式的思维所带来的重大影响。千真万确，就是在“entre”中我们进入，并可能最终到达真实。

在(Entre)
云雾与闪电之间
空无一物
除了大雁飞过的痕迹
除了回声的王国里
那转瞬即逝的
被闪电击到的躯体
之间(Entre)

程抱一，《对话——对于法语的一种激情》，德斯克莱·德·布鲁威出版社

中国诗人受到的法国影响

现代中国如同欣赏法国大革命一样欣赏法国诗歌，这往往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二三十年代寻求摆脱古典诗歌的规则和陈词滥调的青年诗人，将法国诗歌看成无论是形式还是主题都很大胆自由的诗歌。

李金发，中国的兰博(Rimbaud)

这位1922年流亡法国的年青雕塑家，用了“李金发”这个笔名。他被比作兰博，他用受到法国象征主义作家和颓废派作家影响的奇特人物形象的诗歌，震惊和陶醉了世人。

里昂车中

细弱的灯光凄清地照遍一切，
使其粉红的小臂，变成灰白，
软帽的影儿，遮住她们的脸孔，
如同月在云里消失！

朦胧的世界之影，
在不可勾留的片刻中，
远离了我们
毫不思索。

山谷的疲乏惟有月的余光，
和长条之摇曳，
使其深睡，
草地的浅绿，照耀在杜鹃的羽上；
车轮的闹声，撕碎一切沉寂；
远市的灯光闪耀在小窗之口，
惟无力显露倦睡人的小颊，
和深沉在心之底的烦闷。
呵，无情之夜气，
蜷伏了我的羽翼。
细流之鸣声，
与行云之飘泊，
长使我的金发褪色？

在不认识的远处，
月儿似勾心斗角的遍照，
万人欢笑，
万人悲哭，
同躲在一具儿，——模糊的黑影，
辨不出是鲜血， 是流萤！

李金发作，选自米歇尔·卢瓦（Michelle Loi）《法国流派的中国诗人》，阿德里安·梅森内夫（Adrien Maisonneuve）出版社1980年版

中国的象征派诗人

戴望舒是《现代》杂志的编撰者之一。1935年从法国归来后，他就成为了“现代诗派”或者说是“象征诗派”的领头人。他的诗让人同时想起了波德莱尔（Baudelaire），魏尔伦（Verlaine），弗朗西斯·雅

姆（Francis Jammes）和絮佩维埃尔（Supervielle）。

闻曼陀铃

从水上飘起的，春夜的曼陀铃，
你咽怨的亡魂，孤寂又缠绵，
你在哭你的旧时情？

你徘徊到我的窗边，
寻不到昔日的芬芳，
你惆怅地哭泣到花间。

你凄婉地又重进我的纱窗，
还想寻些坠鬓的珠屑。
啊，你又失望地咽泪去他方。

你依依地又来到我耳边低泣；
啼着那颓唐哀怨之音；
然后，懒懒地，到梦水间消歇。

戴望舒作，选自米歇尔·卢瓦（Michelle Loi）《法国流派的中国诗人》，阿德里安·梅森内夫（Adrien Maisonneuve）出版社1980年版

一个台湾诗人的巴黎梦想

从1950年开始，被中国大陆抛弃的现代诗派潮流却在台湾被许多以波德莱尔为现代诗歌奠基人的诗派所承续。从来没有去过巴黎却时刻梦想着巴黎的痘弦是这股潮流的代表人物。

巴黎

你唇间软软的丝绒鞋
践踏过我的眼睛。在黄昏，黄昏六点钟
当一颗陨星把我击昏，巴黎便进入
一个猥琐的属于床第的年代

在晚报与星空之间
有人溅血在草上
在屋顶与露水之间
迷迭香于子宫中开放

你是一个谷
你是一朵看起来很好的山花
你是一枚馅饼，颤抖于病鼠色
胆小而“穴悉”“穴卒”的偷嚼间

一茎草能负载多少真理？上帝
当眼睛习惯于午夜的罂粟
以及鞋底的丝质的天空，当血管如菟丝子
从你膝间向南方缠绕
去年的雪可曾记得那些粗暴的脚印？上帝
当一个婴儿用渺茫的凄啼诅咒脐带
当明年他蒙着脸穿过圣母院
向那并不给他什么的，猥琐的，床第的年代

你是一条河
你是一茎草
你是任何脚印都不记得的，去年的雪
你是芬芳，芬芳的鞋子

镜像绘画

所有的一切都和试图通过绘画和色彩来重现事物外形的西方绘画相反，中国画寻求通过书法线条来抓住事物的精神。但这两种艺术形式慢慢互相靠拢。在20世纪20年代，刘海粟将野兽画派介绍到了中国，因为他从中发现了中国美学原理。而现在，法比耶纳·韦迪耶（Fabienne Verdier）用书法开创了新的“情感境界”。

中国人看野兽画派

现代的美术是带着世界的性质，没有什么国度的界限。我们现在要研究西方美术，并不是因它产生在西方之故，也因它含着世界性质。要明白新兴的美术，也是认它在世界性质的美术发展上比较激进的一个过程……是不容你不接受混交的。所以要谈艺术，不能不明白现代新美术思潮；不但明白一些形式便算，还要探究它的根本精神。一切都能清楚了，我们要替固有的美术在现在重行估定一种价值，自也有个趋向加入那世界的美术潮流和别人一同前进。否则只管闭目高呼国有艺术，贩卖古董，自然只有步步落后；因为我们祖宗的伟大的遗产，是历史上的一种荣光，但现在我们更要努力创业。但是现代欧洲美术的根本精神是怎样的呢？可说就是野兽派的精神。要理解现代美术的真际，应该先明白野兽派的经过……

以前艺术家是看了自然的表面的形，而从其中描出所谓宏大、优美来作画。“野兽群”的人们就不同了，他们是要捉取在于自然的奥处或他们所认为在于自然的奥处的一种不可思议的情绪或情调。

“野兽群”对于轻视个性而描写自然的表面的形是反对的。他们以为性格和意想不应为自然所束缚，而应当用自然以激起本人的灵感；绘画的目的不是要为自然现象的敏锐的发明者，还有旁的奥妙的目的在……

“野兽群”的第一次试作是以归返传统而表现的。这种所谓传统，不是仅在字面，而在其精神。因为一件作品，不能单以其外表而存在，而尤在以其灵魂而永生……

野兽主义者之对于自然，弃其外形，而接受其精神；他们不摄影，却组织成一种由情绪引起的景色；他们不模仿自然的外形，却能奥妙地拨动世界的无穷的大谐和。

刘海粟，《野兽群》，选自埃里

克·雅尼科（Eric Janicot）
《中国现代美学50年》，
索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一位法国艺术家重新演绎中国书法

我想，为什么不改变一下长者的教学方法呢？我想到了吉奥图(Giotto)，他在1279年就敢于违抗当时的禁令装饰阿西斯（Assise）大教堂。……他关注的不是事物的逼真程度，而是精神的共鸣。他以简单的方式理解了怎样表达美。要敢于改进！正是在不断的改进过程中，我们找到了新的语言。另外，我真诚地认为，也正是在不断的改进过程中，我们深深感受到了“活在世上”的本质所在。

二十年来，我一直在寻求并创制一种易于高雅地感受并在运笔中体现诗情画意的托底背料。现在该轮到我来改进一下祖传的技法了。我花了许多年才获得成功，得以从用宣纸托底的卷轴式绢面画过渡到装在固定画框上的棉麻布面绘画。托底背料是举足轻重的，我保持着一种敏锐的、病态的、几乎是超感觉的意念。我成年累月地制造着结果难以预料的纤细织物……

最近，我还冒险改革此种中国技法，我将这些技法融合到同样具有吸引力的佛拉芒原始绘画和意大利绘画的技法中去：透明的淡色，晶莹剔透而又厚实的上光漆，如同虚实相间的反光镜一般。我还发现了一种从未有人用过的材料，一种一旦加进了光的亮度而保持神圣形式的原创领域。我站在这些托底背料前，经过几小时的沉思，我找到了灵感，最后手执毛笔在无尽无垠的远方跋涉……

十年之中，老黄要我通过单色的浓淡墨色，通常是黑色，并借助渲染和墨色来表现各种色彩层次。这种练习是很困难的，要在浓墨中体现出人世间精妙入微的丰富多样性。水墨画中的墨韵是难以归属的，它无处不在并哺育着绘画的本质。这种人们百看不厌的美感不是徒有其表的漂亮。它的朴实，它的谦逊，在朦胧中形成了某种强烈的存在。

我也不时冲破这种黑白的禁域，重新回到彩色中去。在中国逗留的这些日子，我不断地接触这些迥然不同的色彩……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热衷于中国画钤印用的朱红色。……我让它背离其首要用途，将它用于我的现代书法，从而开创新的“情感境界”。

法比耶纳·韦迪耶
《沉默的过客》
(Passagère du silence)，
《在中国的十年启蒙学习》
(Dix ans d'initiation en Chine)，
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2003年版

作家的见证

20世纪，在中法两国之间扮演文化中介角色的中国和法国作家有很多，他们在这两个国家游历，通过译作、游记和报刊文章等让这两个国家更好地互相了解。因此，对我们而言，在过去和将来中法文化关系上名人和作家的见证是异常珍贵的。

中法友谊

1934年，年轻的巴黎高师学生和汉学研究新手安田朴遇到了来里昂中法大学学习的戴望舒。共同完成的关于中国革命的一期特刊《巴黎公社》让他们更加接近了，由此也产生了新的合作计划。

1934年6月19日

亲爱的戴先生，

我很喜欢《吸血鬼》这本书，明天我将把这本书和《雨季的一个夜晚》一起带给鲍尔汉(Paulhan)(就像您要求的一样，我作了少量修改)。我觉得，如果另外一个不行的话，《吸血鬼》会让人满意的。茅盾的小说，我昨天才开始详细地看这部作品。我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马尔罗的一部巨著上了，我想在马尔罗去苏联之前把它看完。所以，请您原谅；从这个月底开始，我可以认真看这部小说了。如果您给我寄其他作品的话，那么我想到了十月份我们就有足够的翻译小说交给德诺埃出版社（Denoel），国际社会出版社(ESI)或《新法兰西》(NRF)杂志了……

致以兄弟般的友谊

安田朴

1934年6月20日

亲爱的安田朴，

我前天刚收到您寄给我的两本《巴黎公社》。这对我已经足够了，谢谢，非常感谢！

现在马尔罗已经在列宁格勒了，您完成关于他的文章了吗？您愿意告诉我这篇将在哪本杂志上发表吗？我很想读这篇文章。我自己也很想写一点关于他的东西，尤其是关于《人类的命运》这本书，但我一直都没有写，因为没有时间也缺少一些必要的资料。确实，马尔罗是个能给人以好感的人，又有杰出的写作才华。但他最大的缺点在于没有真正理解中国革命精神。看看《人类的命运》中的人物吧！几乎所有人物都是个人主义知识分子并且出于个人关系才投身革命的。他们进行革命以找到一种逃避人类命运的出路。作品中没有一个起到重要作用的无产阶级人物。所有这些都是不真实的，也显得中国革命滑稽

可笑。另外一方面，几乎所有人物都是欧化的，更确切点可以说是法国化的。这给了我们中国人一个很令人不满的印象。他避免描写典型的中国人。他不敢面对上海的无产阶级，因为他还不够了解他们。结果：他展现给我们的是无政府主义者的革命画面，是其他地方的，很遥远的。……总之，马尔罗是个很有才华的作家，但他不能够理解革命。〔他甚至同情托洛茨基(Trotzki)！〕

感谢您对我译文的修改。这些译文会被鲍尔汉采用吗？

您的戴

1934年8月9日

亲爱的戴先生，

原谅我这么晚才给您回信。

到现在我还不能工作，但我开始康复了。但不幸的是（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明天要去苏联。……所以要到9月15号我才能够开始工作。但到那时，我会待在巴黎的，而且没有其他事情只弄中文：这会进展很快的。仍然没有小说的消息。鲍尔汉写信给我，拒绝了我的一部分稿件，但他并没有对这些小说表态。如果他不采用这些小说，我们可以把它们推荐给《世界报》、《公社报》，我们还可以写信给《欧洲报》。

准确地说，在鲍尔汉拒绝我的稿件中，有我关于马尔罗的文章。回来后我将把这篇文章修改一下，推荐给《公社报》并准备一份给《新法兰西》。我希望这篇文章能行并以某种方式回应您所提出的反对马尔罗的不同意见。这些意见在我看来，即使不是从审美角度出发，从事实角度出发，大部分也是正确的。

我希望你写关于马尔罗的文章。我确信《新法兰西》会对中国人的观点论述极其感兴趣的。我完成这篇新文章后，我会把它寄给你的，你可以看一下我是从哪些角度提请《新法兰西》杂志考虑马尔罗这个问题的……

致意，安田朴

安田朴——戴望舒

《未出版书信集》

巴金重返法国

——雷吉斯·贝尔热隆（Régis Bergeron）：您在法国写了您的第一部小说《灭亡》：在巴黎写了开头，在夏托·蒂埃里（Chateau Thierry）写完了结局。这是在1927—1928年。您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来到我们的国家的？并且您对此印象如何？

——巴金：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很多中国青年来到了法国，寻找拯救中国的治世良方。也正是这种目的让我来到了法国：我有学习的强烈愿望。尽管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我仍然视法国为先进文明之国。我看过维克多·雨果、爱弥儿·左拉的小说，还有一些法国大革命的书。我很喜欢这些著作和人物以至于到今天仍活在我脑海中。

也正是在法国我才想到写小说的。

——1919年您还刚刚是个青年，但“五四运动”对您和您的作品后来有哪些影响呢？这个日子对整个一代青年来说标志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对《凡尔赛和约》掠夺事实的觉醒；从此以后，一种新文化产生了，并且更加坚定了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

——我说过1919年的“五四运动”造就了我。是她让我放眼看世界，是她通过我贪婪阅读的报纸和期刊让我接触了新思想，还是她第一次说服我，旧事物走向灭亡让位于新事物，新社会出现，封建家族必然瓦解。“五四运动”给我的思想输入了新的力量，我迫不及待地与此做斗争。还不到20岁，我就感到比整个这种家庭更加强大了。我很欣赏丹东(Danton)的名言：“大胆、大胆、再大胆！”……

——您远居法国，这让你成为了你们国家和我们国家之间的纽带。五十年后，你对这次的法国之旅抱有什么样的期望呢？你对现在的法国有什么想法呢？您对此有什么期望呢？

——我的作家朋友们，我的女儿和我，我们来法国看望我们的老朋友，结识新朋友，并带来中国人民和中国作家的友谊。我们回去时也将把你们的友谊带给中国人民。对于我，52年前我在你们的国家学习怎么写小说，现在我有一个小小的个人计划：寻找我搁笔前的足迹，因为在82岁这个年纪我也不指望写作了。这片土地的美丽和这个民族的意愿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在我们受到歧视的时代，很多法国朋友并没有吝惜他们的友谊和关心。现在，我对他们充满了感激，谨向他们说：“谢谢！”我深爱着在考验和困难中前进的社会主义祖国，我也深爱着法兰西。

愿我们两个民族携手共进！

《费加罗》杂志，1979年4月28日

中法关系回顾与展望

作者在2003年12月完成了这篇对法兰西文学院皮埃尔-让·雷米(Pierre-Jean Rémy)的采访。

——缪里尔·德特里(Muriel Détrie)：为什么您给1964—1966年在中国的日子让您创作出的小说取名为《圆明园之劫》呢？

——皮埃尔-让·雷米：这本书的题目是在最后才想出来的。我甚至曾经认为只能加上一段引证1860年事件的文字来解释它。然而，过后，这看起来又尤其意味深长，原来的圆明园是由西方人建造的宫殿、楼台、巴罗克风格的喷泉和柱廊的结合体，其中的一部分在刚好一个多世纪之后，又同样被西方人摧毁了。另外，正是这些当时在废墟上抢劫过来的作品，大部分很具有18世纪末和19世纪中国园艺的典型特征，在自称的西方爱好者眼中长期

以来代表了中国的园林艺术，也就是“中国工艺”。还有，一些聪明的精英给中国带来了好的作品，这些作品后来又被来自于同一个大陆的顽固不化的军队摧毁。也正是这些军队的鉴赏力长期以来在欧洲形成了中国形象。

——在中国旅居期间的报导《中国，一个游记》的分散形式，您是用来了解中国现状的吗？

——当然，《中国，一个游记》完全是一本写于特定时期的书。该书写于1966年，在我从中国回来后。头脑中，内心深处和眼中，到处都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景象。另外，这本书出版是在十年之后，这让我能够有一定的时间和方式来思考过去所写的东西。自然，这本书的形式，片言只语的对话，其他旅行家和作家的引用，当时中国报纸、海报和讲话的摘录，伴有像主导主题一样不断被重复的毛泽东语录，其目的在于表现当时中国的千变万化。这是传统中国和倾向于狂热顶点的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所留下来东西的并列，甚至是一种碰撞。我还要说的是，在我个人的每篇文章中，我避免任何评论。我想描写一个完全割裂的世界，甚至我自己也表现出很陌生，仅仅渴望去观察和理解。至于谈到现在的中国，我认为组织这种论文很简单。毋庸多言，首先，将其列为新地球上一个去向不明的对象：21世纪的中国，如果我冒昧地讲，将进入我们的习俗。我更愿意运用基于两个历史时期的写作系统，而不是千变万化的看法、灿烂辉煌的事物、一点叙述和不现实的描写：60年代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也就是我所认识的两个中国。

——你经常接触中国文化，这在哪些方面影响了你的作品？

——我认为在我刚开始接触中国文化的几年中，我应该将一定的写作形式（尤其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千变万化的看法）还有对世界的开放方式都归功于它。中国诗人尤其让我尝试面对更加简洁的诗意写作方式。

——您是中法文化年的主席：这个事件对您来说是否代表或是预示着法中文化关系的新阶段？您对此有什么期望？

——确实，中国和法国文化当局在大范围内着手进行了初次文化交流尝试，双方所从事的这个尝试为新型关系开启了大门。西方文化的世界主义观和精英主义形象之间的某个部分能够在中国显露出一种更加现实主义的接近，而没有法国文化所代表的那样空幻。对法方而言，文化年是一次了解中国现代艺术中最具有现代性一部分的机会。中国现代音乐、绘画、摄影和录像，就像人们在北京、上海和整个中国从事的那样，对许多法国艺术家、评论家和文化负责人来说这构成了真正的冲击，面对很久以来不羡慕西方美学标准的当今中国，这种冲击将使他们更加谦虚。

法国的一个战略市场

中国于2001年12月11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标志着她愿意加入世界大国的行列。

2002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2600亿美元，居世界第六位，且2003年预计增长率为8—9%。2002年中国居民个人平均收入水平为1000美元，而法国则为25000美元。

对外贸易经历了巨大发展，从1978年的210亿美元到2002年的6100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量的5%。

最后，中国还提供了3亿到5亿的巨大劳动力储备。

中国成为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2002年吸引外资540亿美元，其中60%来自于亚洲，1.2%来自于法国。法国是在中国的第八大欧洲投资国，排在德国和英国之后。它平均每年投资为1.5到3亿欧元，2000年创下了记录（4.23亿欧元）。2002年，这些投资达到3.75亿欧元。据法兰西银行统计，中国是法国第16大投资目的地，是在亚洲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投资对象。

法国在中国的企业超过了500家（2003年共有425000家已经进入中国的外国企业），900家制造基地，共有150000名工人；办事处主要设在北京和上海，而工业制造基地主要是在上海和广东地区。

很多大集团将中国视为其发展的重要战略国家。我们可以列出，法国标致雪铁龙集团（PSA）、法国电力公司（EDF）、罗地亚公司（Rhodia）、安万特（Aventis）、阿尔卡特、米其林、道达尔、拉法基(Lafarge)、圣·戈班，汤姆森、阿尔斯通、家乐福，Ondéo水业公司、欧洲传媒及公用事业巨头威旺迪、达能、轩尼诗、欧莱雅等。

出处：法国经济财政工业部的综合卡片，《中国：经济和财政形势》（2003年10月27日整理）和《中国：2002年外国直接投资和法国在华企业》（2003年10月24日整理）

MINEFI-DREE/TRESOR.

深入阅读书目

—尚蒂伊国际汉学研讨会记录，《17世纪和18世纪北京的法国使命》，美文出版社1976年版。

—波达克（Beauthac N）和布夏尔（Bouchart），Fr.-X.，《异域欧洲》（L'Eu-rope exotique），杜谢出版社（Editions du Chêne）1985年版。

—贝尔热尔 M.-CI &皮诺，A.《东方语言学校汉语教学一百年(1840—1945)》（Un siècle d'enseignement du chinois à l'E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1840—1945），亚洲图书出版社(L'Asiathèque) 1985年版 。

—布尔德莱，M.，《18世纪耶稣会画家在中国》，Anthèse出版社1997年版。

—尼奈特·布思罗伊德（Ninette Booth-royd）&缪里尔·德特里，《中国旅行，中世纪到中华帝国衰弱的西方旅行家文选》，罗贝尔·拉丰出版社（Robert Lafont），“老书”丛书，1992年版。

—N·布罗克（Broc），《法国旅行家和认识中国（1860—1914）》，《历史杂志》，CCLXXVI/I，法国大学出版社（PUF）1986年版。

—J·布罗斯，《发现中国》，博达斯出版社(Bordas) 1981年版。

—G·布罗索莱，《1849—1949年上海的法国人》，贝兰出版社（Belin）1999年版。

—《异国风情手册》（Carnet de l'Exotisme），nos 15—16，《西方和远东黄祸》（Le Péril jaune en Occident et en Extrême-Orient），普瓦提埃，勒托利出版社（Le Torii）1995年版 。

—M·卡尔蒂埃（Cartier），《爱恨交织的中国》(La Chine entre amour et haine)。第八届尚蒂伊汉学研讨会记录，德斯克莱·德·布鲁威出版社1998版。

—《法译汉翻译作品目录文学，人文和社会科学》，北京，世界图书出版社1996年版。

—阿贝尔·卡恩展览馆展览目录，《东方巴黎：法国影响在上海（1849—1946）》，2002年版。
—L·塞扎利（Cesari）和D·瓦拉钦（Varaschin），《20世纪及以前法中关系》，阿拉斯（Arras），阿尔杜瓦大学出版社（Artois）2003年版。
—《中国（1847—1937）》，“《插图》大档案”，巴黎图书出版社（Le Livre de Paris）1989年版。
—赵志冰（音，Chiu Che Bing），《圆明园，灯火通明的园林》（Yuanmingyuan，le Jardin de la Clarté parfaite），印刷工人出版社（Ed. de l'Imprimeur）2000年版。
—克雷奥普（CREOPS），《亚洲的法国影响》（La Présence française en Asie）（2002年研讨会记录），巴黎索邦大学出版社（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Paris-Sorbonne）2004年版。
—A·居里安（Curien），《中国书信 ——中法小说家对话》，法国“中国之蓝”出版社（Bleu de Chine）1996年版。
—A·居里安&金丝燕（音，Jin Siyan），《中国文学，历史和现代写作》（Littérature chinoise，le passée et l'écriture contemporaine），人类科学出版社（Editions de la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2001年版。
—A·居里安，《今日写作 法中文学辩论》，人类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保罗·德米埃维勒（P. Demiéville），《汉学研究选择》（Choix d'études sinologiques）的《法国汉学研究历史回顾》（Aperçue historique des études sinologique en France），莱顿（Leiden），E.J.Brill出版社1973年版。
—缪里尔·德特里，《法国—亚洲：文学交流一百年》（France-Asie：Un siècle d'échanges littéraires），友丰出版社2001年版。
—D·爱丽舍夫（Elisseeff），《太阳王中文翻译莫瓦·阿尔卡德》（Moi Arcade interprète chinois du Roi-Soleil），阿尔托出版社（Arthaud）1985年版。
—爱丝凯德 Y.（Escande Y.）& PH.塞尔（PH.Sers）《内心共鸣：中国和东方的艺术和宗教经历对话》（Résonance intérieure. Dialogue sur l'expérience artistique et sur l'expérience spirituelle en Chine et en Occident），克莱斯克出版社（Klinsksieck）2003版。
—安田朴，《中国化的欧洲》（L'Europe Chinoise），第2卷，伽利玛出版社，1988—1989。
—《远东》，《远东》第12期。
—《革命思想和中国：模式问题》，（L'Idée révolutionnaire et la Chine. La question du modèle），樊尚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F·热德（Ged），《上海》，法国建筑学院出版社（Editions Institut français d'architecture），“城市肖像”丛书，2000。
—J·谢和耐，《中国社会史》（Le monde chinois），阿尔芒·科兰出版社（Armand Collin），1972。第四版修订版，1999。
—Y. Hsieh，《从占领到革命：罗提、克洛岱尔、谢阁兰和马尔罗眼中的中国（1895—1933）》，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圣徒出版社（Summa Publications）1996年版。
—E·雅尼科，《中国现代美学50年：传统派和西欧派（1911—1949）》，索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M·雅利（Jarry），《中国工艺》，弗赖堡，图书出版社（Office du Livre）1981年版。
—金丝燕（Jin Siyan），《法国象征主义者到中国象征主义者的诗意形象变化（1915—1937）》〔La métamorphose des images poétiques des symbolistes français aux symbolistes chinois（1915—1937）〕，多特蒙德，Projekt verlag出版社1996年版。
—Lee G.，《中国和西方威胁：诗歌争论，现代性和交融》（La Chine et le spectre de l'Occident. Contestation poétique，modernité et métissage），西莱普斯出版社（Syllepse）2002年版。
—A·列维（Lévy），《黄金时代中国文人旅

行者眼中好奇有教益的新作（1866—1906）》〔Nouvelles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d'Extrême-Occident par des voyageurs lettrés chinois à la Belle Epoque (1866—1906)〕，塞格尔出版社（Seghers）1986年版。
—S·莱斯（Leys），《中国分析》，罗贝尔·拉丰出版社，“老书”丛书，1999年版。
—T.H Liang，M·霍兹曼（Holzman），《中国的巴黎人》，塞热出版社（Seghers）1989年版。
—M·卢瓦（Loi），《法国流派的中国诗人》，梅森内夫出版社1980年版。
—克里斯汀&钱林森，《20世纪法国作家与中国》，阿尔勒（Arles），阿尔杜瓦大学出版社（Artois）和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V·皮诺（Pinot），《法国的哲学思想教育和中国》，保尔·古特纳出版社1932年版。
—张申府（V. Schwarcz），《中国启蒙：知识分子和1919年五四运动的遗产》，柏克莱（Berkeley），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法比耶纳·韦迪耶（Fabienne Verdier），《毛笔与众不同的特征：书法、绘画和中国思想》，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Albin Michel）2001年版。
—韦锡爱 I.& J.-L，《耶稣会传教士眼中好奇有教益的新作（1702—1776）》，加尔尼埃·弗拉玛里昂出版社（Garnier-Flammarion）1979年再版。德斯戎盖尔出版社（Desjonquères）2002年版。
—N. Wang，《移民与政策：1919—1925年中国勤工俭学学生在法国》，学术印度出版社（Les Indes savantes）2002年版。
—J·韦伯，《中国的法国(1843—1943)》〔La France en Chine(1843-1943)〕，南特，西方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
—Yu Xi，《中法交流文化特征》（Traits d'union culturels Chine-France），北京，外语出版社2003年版。
—张寅德，《20世纪中国的浪漫世界：现代性和身份》（Le Monde romanesque chinois au XXe siècle），奥诺雷·尚皮翁出版社（Honoré Champion）2003年版。

法国可以找到中国文化的地点

——阿尔贝-卡恩省立博物馆，14，rue du Port 92100 Boulogne-Billancourt
museealbertkahn@cg92.fr

——塞尔尼希博物馆，7，avenue Vélasauez，75016 Paris

——吉梅博物馆，6，place d'Iéna，75016 Paris
(www. Museeguimet.fr)

——枫丹白露宫欧也妮皇后的中国馆
枫丹白露宫国立博物馆，77300 Fontainebleau
Château-de-fontainebleau@culture.fr

——洛里昂印度公司博物馆，Citqdelle de Port-Louis，56290 Port-Louis
Museeindes@mairie-lorient.fr
(www.lorient.com/musee)

——亚洲艺术博物馆，405，primenade des Anglais，06000Nice

——Galerie Sinitudc，25，rue de Poitou，75003 Paris

——凤凰书店，72，bd de Sébastopol，75013 Paris (www.librairiele phenix.fr)

——友丰书店，45，rue Monsieur-le-Prince，75006 Paris et 66，rue Baudricourt，75013 Paris

——法中文化协会，38，rue de La Tour，75116 Paris

——中国文化中心，1，bd de la Tour-Maubourg，75007 Paris

——台北信息文化中心，78，rue de l'Uniersité，75007 Paris

——巴黎中国城，1，place du Confluent France-Chine，94140 Alfortville

——中国旅游局，15，rue de Berri，75008 Paris

图片目录与出处

封面 2000年9月上海春天大商场开业和龙，插图，20世纪作品。

书脊 谢阁兰，汉字“东面”，出自《古今碑录》（Stèles）扉页，《高丽丛书》（Collection coréenne）系列，1914版。私人藏品。

封底 弗朗索瓦·布歇，《中国园林》（Le jardin chinois）。贝尚松美术和考古博物馆藏。

序

1页中 谢阁兰，南下四川成都。巴黎吉梅亚洲艺术博物馆藏。

1页下 谢阁兰的名片。私人藏品。

2页上 谢阁兰制的用以结束《古今碑录》的印章。私人藏品。

2页下 谢阁兰在北京为《高丽丛书》所作的序言《致泰西文人》（Aux lettrés d'Extrème-Occident），巴黎乔治·克雷（Georges Crès）及其合伙人1914年版。私人藏品。

3页上 谢阁兰，《中国的石雕艺术》（La Grande Statuaire），写于1918年前后，手稿片段。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藏。

3页下 乾县唐高宗陵墓，照片，出自谢阁兰、奥古斯特·吉尔贝·德·瓦赞（Auguste Gilbert de Voisins）、让·拉蒂格（Jean Lartigue），《中国西部考古记》（Mission archéologique en Chine）图集卷一，保尔·古特纳（Paul Geuthner）出版社1923—1924年版，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藏。

4—5页 谢阁兰，《古今碑录》，《高丽丛书》系列，1914年版。私人藏品。

4页中 照片，出自谢阁兰、吉尔贝·德·瓦赞、让·拉蒂格，《中国西部考古记》卷一，保尔·古特纳（Paul Geuthner）出版社1935年版，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藏。

6页 谢阁兰，《出航》（Equipée），写于1914—1915年，手稿片段。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藏。

6—7页 谢阁兰、吉尔贝·德·瓦赞，函谷关航道（河南），伸向黄河的黄土峭壁，照片，摄于1914年。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藏。

7页背景 保尔·克洛岱尔（Paul Claudel），《认识东方》（Connaissance de l'Est），被谢阁兰收入《高丽丛书》后出版的封面。私人藏品。

9页 北京法国公使馆的译员韦锡爱和李鸿章总督的秘书罗丰禄，照片，佚名，摄于1884年。巴黎法国外交部档案馆藏〔葛林德（Collin de Plancy）遗赠〕。

第一章

10页 《商行的仓库里装满了封钉好的货箱》（Le magasin dc la factorerie s'emplit des caisses que l'on ferme et cloue），水彩画，出自《制茶图册》（L'Album de la fabrication du thé），绘于18世纪。雷恩美术和考古博物馆藏。

11页 勾股定理：《几何原本》，节选自欧几里得《几何原本》（Eléments de géométrie），利玛窦、徐光启译，17世纪。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藏。

12页 《利玛窦和徐光启像》（Portrait de Matteo Ricci et de Paul Li），版画，出自阿达纳斯·基尔舍（Athanase Kircher）《中国图说》（La Chine illustrée），1677年版。凡尔赛市立图书馆藏。

13页上 潘廷章（Giuseppe Panzi），《钱德明神甫像》（Portrait du père Amiot），版画，制于18世纪。巴黎法兰西研究院图书馆藏。

13页下 李明《中国现势新志》卷一的扉页，绘有康熙皇帝肖像，1697版。凡尔赛市立图书馆藏。

14页 广东省地图，出自唐维尔《皇舆全览图》，制于1787年。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藏。

15页上 北京古观象台，版画，出自李明《中国现势新志》卷二，1697版。凡尔赛市立图

书馆藏。
15页下 金制浑天仪，制于18世纪。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16页上 勒内·安托万·华斯，《马背上的路易十四》(Louis XIV à cheval)，绘于17世纪。凡尔赛宫藏。
16页下 郎士宁，乾隆皇帝戎装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17页 郎士宁（据传），圆明园花园，北京，绘于1783—1786年间。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藏。
18—19页 郎士宁（据传），海晏堂和圆明园花园中的水法，北京，绘于1783—1786年间。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藏。
20页下 注有拉丁语译文和发音的汉字，出自艾蒂安·傅尔蒙《中文沉思录》(Meditationes sinicae)，1737版。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藏。
20—21页上 中国文人的书房，版画，出自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1736版。凡尔赛市立图书馆藏。
21页下 黄嘉略的日记片段，写于1713年10月。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藏。
22页 白瓷盘，饰有表现东印度公司广东办事处的彩色图案，制于1780—1785年间。洛里昂印度公司博物馆藏。
23页左 华瓷茶碟，绘有祈祷中的圣依纳爵·罗耀拉像，制于18世纪。巴黎吉梅亚洲艺术博物馆藏。
23页右 华瓷碟，饰有J·G·德法西和卡特琳·杜波诺的婚姻纹章，制于1747年。洛里昂印度公司博物馆藏。
24页 安德义（Jean Damascène）、修佛罗(Pierre Philippe Choffard)、小戈善，《拔达克山汗纳款》，《平定淮回两部得胜图》系列版画，制于18世纪。巴黎吉梅亚洲艺术博物馆藏。
25页 王致诚，嫔妃半身像，油画，绘于18世纪。多耳美术馆藏。
26页 卡蒙太，兰西公园里的中式亭子和水塘，绘于约1754—1763年间。巴黎马蒙丹-莫奈(Marmottan-Monet)美术馆藏。
27页 中国浴场，1792年由勒努瓦（Lenoir）建于意大利大街，水彩画，绘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巴黎卡赫纳瓦莱（Carnavalet）博物馆藏。
28页 弗朗索瓦·布歇，《梳妆》。贝尚松美术和考古博物馆藏。
28-29页上 克里斯托弗·于埃（Christophe Huet），《猴群图》，猴室天花板装饰图局部，绘于1759年。尚蒂伊孔代博物馆藏。
29页下 歌剧院中跳舞的中国人，版画，制于18世纪。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藏。
30页 加布里埃尔·勒莫涅（Gabriel Lemonnier），《在热夫林夫人的沙龙上诵读伏尔泰的悲剧〈中国孤儿〉》(Lecture de la tragédie de Voltaire, L'Orphilin de la Chine, dans le salon de madame Geoffrin)，绘于1755年。玛尔梅庄和普雷欧林堡(Chateaux de Malmaison et Bois-Préau)藏。
31页 孔子，版画，出自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1736年版。凡尔赛市立图书馆藏。
32页 雍正皇帝开出的第一条犁沟，《亲耕图》局部，绘于18世纪。巴黎吉梅亚洲艺术博物馆藏。
33页 《耕作中的太子殿下》(Monseigneur le Dauphin labourant)，米歇尔·瓦施米(Michel Wachsmut)的版画，制于1770年前后。凡尔赛宫博物馆藏。

第二章

34页 法国领事方苏雅和提督苏元春，照片，摄于1901年前后。巴黎吉梅亚洲艺术博物馆藏。
35页 “满大人”(La Mandarine)利口酒的广告牌，20世纪初。
36页 1844年用中法双语签订的《黄埔条约》，盖有刺萼尼和耆英的印章。巴黎法国外交部档案馆藏。
37页 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城，版画，出自1860年12月22日的L'Illustration。

38页下 上海法租界地图，绘于1851—1853年间。南特外交档案中心藏。
38—39页上 上海法国领事馆所在地及领馆路，照片，佚名，摄于19世纪末。巴黎法国外交部档案馆藏。
39页下 1900年左右在上海的法国少妇，照片。私人藏品。
40—41页 上海，1936年，照片。巴黎法国外交部档案馆藏。
41页下 上海法商电车电灯公司，上海独家供水和广告服务商，20世纪初。私人藏品。
42页上 坐黄包车穿行于上海的街道间，照片，摄于20世纪初。私人藏品。
42—43页下 在上海购物的欧洲人，照片，摄于1907年。
43页上左 上海马塞尔面包糕点店的门面，照片，摄于20世纪初。私人藏品。
43页上右 马塞尔面包糕点店的广告。私人藏品。
43页中右 科蒂香水的广告，刊登于上海日报，1927年。私人藏品。
43页下右 赛狗会广告，1933年。私人藏品。
44页 广东天主教会办的音乐课，照片，佚名，摄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
45页上 《守护天使》，法国为中国而作的宗教形象，绘于19世纪。
45页下 上海各教会分布图，制于1933年。私人藏品。
46页 里昂吉梅博物馆，内置假人，模拟中国的祭祖仪式，照片，摄于1879年前后。
47页上 北京圆明园的谐奇趣废墟，照片，摄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
47页下 枫丹白露宫“中国馆”一角。
48页 1900年巴黎万国博览会。特罗卡代罗的中式楼阁，明信片。
49页 儒勒·凡尔纳，《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苦难》，封面和插图，赫策尔（Hetzel）出版社1879年版。
50页上 “黄祸”，小说《黄祸入侵》封面的局部，20世纪初。
50页下 小说《酷吏李福的奇遇》（Les Célèbres Aventures de Li-Fou Le Cruel）的封面，约1930年。
51页 《射猪斩羊图》、《猪叫剜眼图》，中国反基督教宣传画，绘于1891年左右。
52页 德理文侯爵，《中华文集》（Recueil de textes faciles et gradués en chinois moderne），巴黎1869年版。
52页 德理文侯爵的出书广告。
53页 长江上的“奥尔利”号炮舰。巴黎法国外交部档案馆藏。小笠原群岛系列收藏。
54页上 中式楼阁前的里昂商务考察团成员，照片，出自里奥（Riault）的考察报告《里昂商务考察团在中国》（La Mission lyonnaise d'exploration commerciale en Chine），罗昂1897年版。
54页中 伊齐多尔·埃德，《万物解》（Description méthodique des produits divers recueillis dans un vayage en Chine）扉页，圣艾蒂安（Saint-Etienne）1848年版。
54页下 《伊齐多尔·埃德先生参观苏州工场》（Visite de M. Isidore Hedde aux ateliers de Sou-Tchou），纪念1848年埃德先生参观的小块丝绸。私人藏品。
55页上 铜山火车站内的火车，照片，摄于20世纪初。
55页下 中国工业银行的不记名股票，1913年。
56页上 《法国话规》（Grammaire française copiée presque cntièrement sur celle de Noel et Chapsal avec la traduction chinoise par un père lazariste de Pékin）卷二《句法》片段，北京1864年版。私人藏品。
56页下 《法国话规》扉页，北京1864年版。私人藏品。
57页上 北京法国公使馆的译员韦锡爱和李鸿章总督的秘书罗丰禄，照片，佚名，摄于1884年。巴黎法国外交部档案馆藏[葛林德（Collin de Plancy）馈赠]。
57页下 1869年伯灵格姆-直冈（Burligame-Zhigang）中国考察团在巴黎逗留期间，J·朗日（J. Lange）绘。

第三章

58页 在发行于1924年的共和党中文报纸《先声》的巴黎印刷处，照片。
59页 安德烈·马尔罗的作品《人类的命运》海报。
60页 被宫女和太监簇拥着的慈禧太后，1903年，照片。
61页左 1912年2月15日出版的杂志《无所不知》（Je sais tout）封面上的孙中山像。
61页右 1915年出版的《青年杂志》创刊号文章摘录。
62页上 梁启超，照片。
62页下 小仲马，《茶花女》，林纾改编的中文版封面，上海1937年版。里昂市立图书馆藏（中国库，CH 10581）。
63页 《新青年》杂志封面，里昂市立图书馆藏（中国库，CH PER 1295）。
64页 上海耶稣教会震旦大学足球队，摄于1920—1930年。
65页上 上海市立法国中学章程，附有1886年3月2日法国驻上海领事致法国外交部的信件。法国外交部档案馆藏。
65页下 中法工商业学院章程、大纲和入学资格，上海，约于1920年。私人藏品。
66页 20世纪20年代在雷诺·比朗古尔（Renault Billancourt）工厂前的露天中文课，照片，出自梁松衡和玛丽·霍兹曼（Marie Holzman）《巴黎的中国人》，塞热（Seghers）出版社1989年版。
66—67页下 中国工人在法国兵工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照片。
68页上 1921年9月26日《里昂进步报》上一篇文章标题《欢迎你，中国朋友！》，里昂市立图书馆藏（中国库，IFCL档案）。
68页下 1921年中国学生会联盟反对驱逐中国学生的传单，里昂市立图书馆藏（中国库）。
69上 1920年周恩来在巴黎。
69下 一份1921年1月20日《旅欧周刊》，由加莱那·哥伦布的中国勤工俭学学生出版，巴黎外交部档案馆藏。
71上 “法国的水兵们，你们不要向中国人开枪！”由法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巴黎印制的传单，1925年。巴黎外交部档案馆藏。
70—71页下 上海游行示威的中国人群，1927年3月，照片，佚名。出处同上。
72页 德日进在献县附近驿道的一座桥上，约于1924年，照片，佚名。巴黎泰拉尔·德·夏尔丹基金会藏。
73页 “黄色远征”，雪铁龙履带车行驶在戈壁滩的路上，1931年，照片，佚名。
74页 伯希和在敦煌手稿和绘画石窟中，1908年，照片。巴黎吉梅亚洲艺术博物馆藏。
75页上 代表天地万物的图表，出自葛兰言《中国思想论》，巴黎，1934年。
75页中 谢阁兰在北京主编的“高丽丛书”介绍，巴黎乔治·克莱及其合伙人1907年版，私人藏品。
75页下 谢阁兰，由乔治·达尼埃尔·德·孟弗兰（Georges-Daniel de Monfreid）绘制的《勒内·莱斯》的封面，乔治·克莱出版社1922年版。私人藏品。

第四章

76页 在1993年2月雕塑家作品展览之际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前布置奥古斯特·罗丹作品《思想者》。
77页 让·皮埃尔·雷奥在电影《中国女人》中，1967年让·吕克·戈达尔导演。
78页 1949年上海街道上游行时大学生扭起了秧歌，亨利·卡蒂埃·布雷松（Henri Cartier-Bresson）拍摄的照片。
79页上 让·保尔·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北京，1955年。
79页下 《中国人民形象》宣传画，1975年中法友好协会组织的展览。
81页 “巴黎公社万岁！”，中文海报，1971年。
82页上 《人民的事业》海报，1972年5月，巴黎。

82页下 1969年巴黎的示威游行，布鲁诺·巴尔贝（Bruno Barbey）拍摄的照片。
83页 对巴黎的支持，1968年5月北京发行的招贴画。
84页 1973年乔治·蓬皮杜对北京进行正式访问。
85页上 家乐福超市广告单，2003年。
85页下 北京街头的阿尔卡特广告。
86页 让·玛丽·夏庞蒂埃（Jean-Marie Charpentier）设计的上海世纪大道。
87页上 保尔·安德鲁（Paul Andreu）的北京国家大剧院设计方案。
87页下 “建筑工作室”，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设计方案。
88页下 “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的各种作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88—89页上 1993年上海奥古斯特·罗丹作品展，照片。
89页下 阿兰·埃尔朗德·布兰登堡的《大教堂的风采》（Quand les cathédrales étaient peintes），伽利玛出版社“发现之旅”丛书中文版封面（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
90页 巴黎19区的中国餐馆，2003年。
91页上 巴黎13区的中国新年庆祝活动。
91页下 王蒙《一笑集》，“中国之蓝”出版社。
92页 在蓬皮杜文化中心前“怎么样，中国？”展览开幕式上蔡国强的作品，2003年6月22日。
93页上 赵无极的《纪念五月，1930—1972》，1972年。巴黎国立现代美术馆藏。
93页下 电影《霸王别姬》海报，1992年陈凯歌导演。
94页上 印有模特ANNA WANG的杂志《ELLE》（世界时装之苑）中文版的封面，2003年1月，摄影fenghai，形象设计Jane Hsiang。
94页下 上海街头印有女演员巩俐的欧莱雅广告，2000年。
95页上 轩尼诗公司在上海纪念“X.O”首发120周年。
95页下 维维安·梅萨瓦在巴黎他的中国茶叶店中。
96页 法比耶纳·韦迪耶（Fabienne Verdier）的中法文化年标识，2003—2004年。

文献

97页 法比耶纳·韦迪耶和她的黄老师。
107页 保尔·克洛岱尔的《扇子百句》，东京，1927年。私人藏品。
109 程抱一，《对话》，德斯克莱·德·布鲁威出版社。

索 引

A

阿贝尔·卡恩 73
阿尔封斯·都德 81
阿尔卡特 84
阿纳托尔·法朗士 63
爱德华·埃里奥 64
艾蒂安·傅尔蒙 20
埃尔曼，雕刻家 24
《爱弥儿》（让－雅克·卢梭） 60
爱弥尔·吉梅 46
爱弥尔·左拉 63
安德烈·马尔罗 71，74
安南 36
安田朴 79
安托万·华斯 16
安托万·瓦托 29
安邺 53
奥碧松挂毯 29
奥古斯特·德斯古汀斯 52
奥古斯特·罗丹 77，85，89
奥雷尔·斯坦 74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 70

B

巴多明 20

巴金 71
巴黎公社 80，81，83
《巴黎公社》（于勒·瓦莱斯） 81
巴黎万国博览会 48
八里桥之战 45
《八十天环游地球》（儒勒·凡尔纳） 48
《霸王别姬》（陈凯歌） 93
白晋神甫 12，13
保尔·迪瓦 48
保尔·克洛岱尔 75
保尔·潘勒维 64
保尔-瓦扬·库蒂里耶 71
北京 11，15，17，24，25，36，56，81
《北京传教士关于中国人历史、科学、艺术、习俗论丛》 13
《北京的末日》（皮埃尔·罗提） 70
北京法国传教团 13，14
北京古观象台 15
北京国家大剧院 87
《北京周报》（杂志） 78
北堂（北京） 13
贝勒维尔 90
博韦挂毯 28，29
伯希和 74
布莱斯·帕斯卡 32

C

蔡国强 92
蔡元培 64
《曾经统治五亿人的女人》（夏尔·珀蒂） 60
《茶花女》（小仲马） 62
长江 53
陈独秀 63
陈凯歌 93
《沉思录》（帕斯卡） 32
程抱一 90
《除了土地，一无所有》（保尔·莫朗） 70
瓷景特里阿农宫 25
慈禧太后 60

D

大亚湾核电站 84
戴奥菲尔·戈蒂埃 51
戴思杰 90
道教 31
德·戈宾诺伯爵 49
德蒙维尔 26
德日进 72
邓小平 68，77，84
丁堂林 51
东方语言学校 51，52
东京湾 36，53
杜达尔·特拉格来 53
杜赫德 14，21
敦煌手稿 72
多明我会修士 13

E

俄国 36

F

法比耶纳·韦迪耶 91，95
法国大革命 60，61，62
法国电力公司（EDF） 84
法国东印度公司 22
法国国家图书馆 74
法国领事馆（上海） 38
法国邮船公司（上海） 38
《法兰西革命史》（康有为） 60
法兰西剧院 30
法兰西学院 50
“发现之旅”丛书（伽利玛出版社） 89
法中友好协会 78
凡尔赛宫 17，25
《凡尔赛和约》 65
反基督教宣传 51
范尚人 36

方济各会修士 13
方苏雅 35
菲利浦·贝特洛 64
菲利浦·索勒尔 83
费内隆 31
《风俗论》（伏尔泰） 33
佛教 31，52
伏尔泰 30，63
弗朗索瓦·布歇 29
弗朗索瓦·道特尔斯姆 93
弗朗索瓦兹·萨冈 85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83
福州 36
福州船政局 57
傅圣泽神甫 20

G

哥白尼 15
葛兰言 75
巩俐 94
勾股定理 11
辜鸿铭 73
古斯塔夫·勒庞 49
顾赛芬 52
广东 11，23，36，37，44
光绪皇帝 60
郭嵩焘 56

H

汉口 37
河间府（献县） 72
荷兰 36
亨利·卡蒂埃-布雷松 78
亨利·塞尔尼希 46
《黄祸入侵》（当利上尉） 50
黄家略 20
黄浦江 37
《黄埔条约》 36
“黄色远征” 73
火烧圆明园 46

J

《家》（巴金） 70
家乐福 85
纪尧姆·德·罗柏鲁 12
柬埔寨 88
“建筑工作室” 87
蒋介石 78
蒋友仁 15，17，19
交趾支那 37
景德镇 22

K

卡蒙太 26
卡特琳·杜波诺 23
康熙皇帝 11，12，13，14，16，20，32
康有为 60，61
科蒂香水 43
“科罗曼德” 23
空中客车 84
孔代亲王 26
孔子/儒教 13，33，62

L

拉班·扫马 12
拉莫特·勒瓦耶 31
剌萼尼 36，54
兰西公园 26
郎士宁 16
勒内·格侬 73
《勒内·莱斯》（谢阁兰） 75
勒内·夏尔 88
雷慕沙 51
“雷斯荒漠”庄园 26
里昂 67，68
里昂赴中国商务考察团 53
《里昂进步报》 68

里昂商会 54
里昂中法大学 67
李明 13，16
李煜瀛 65
利玛窦 11，12
梁启超 60，61，62
列维·斯特劳斯 88
林纾 61
林语堂 73
路易九世 12
路易十六 33
路易十四 11，12，16，33
路易十五 21，33
路易·威登 92
《论科学与技艺》（让－雅克·卢梭） 60
《论异教徒的道德》（拉莫特·勒瓦耶） 31
罗兰·巴特 83，88
罗兰夫人 62
罗曼·罗兰 63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68
吕西安·波达尔 60，79

M

“马丹漆” 23
马恩河平原城堡 29
玛格丽特·迪拉斯 85
马可·波罗 11
玛丽-安托瓦内特村（凡尔赛） 26
马赛 66
马塞尔面包糕点店 43
马相伯 63
茅盾 70
毛泽东 68，78，80，82，83，88
《毛泽东语录》 77，82
《毛主席的新装》（皮埃尔·里克曼斯） 83
“湄公河探险” 53
《玫瑰谷》（吕西安·波达尔） 60
“美男子腓力四世” 12
蒙古人 12
蒙塔基 66
孟托班 45
米歇尔·布托 85
米歇尔·福柯 88
敏体尼 37
摩西 32

N

拿破仑三世 47
南京路（上海） 87
《南京条约》 36
《尼布楚条约》 12
尼古拉·弗雷雷 20
《孽海花》（曾朴） 62
宁波 36

O

欧莱雅 92，94
欧也妮皇后 47

P

皮埃尔·布尔迪欧 88
皮埃尔·里克曼斯 83
皮埃尔·罗提 72
皮埃尔-让·雷米 80
皮尔·卡丹 92
葡萄牙 13
浦东国际机场（上海） 87

Q

耆英，清朝官员 36
启蒙 33，62
钱德明 13，17
乾隆皇帝 14，15，17，24，25，28
遣使会会士 56
乔治·杜梅泽尔 88
乔治·克莱 75
乔治·蓬皮杜 84

乔治·苏利埃·德·莫朗 60

R

让-巴蒂斯特·贝尔旦 21
让-巴蒂斯特·于埃 29
让-保尔·萨特 79
让-吕克·戈达尔 77
让-玛丽·夏庞蒂埃 87
让-米歇尔·雅尔 85
让·辟尔文 29
让-雅克·卢梭 60，61，63
“仁慈堂”孤儿院（天津） 45
《人类的命运》（安德烈·马尔罗） 71
《人民的事业》（报纸） 82
《认识东方》（保尔·克洛岱尔） 75
《认识东方》 90
儒勒·凡尔纳 48
儒莲 51
《如是》（杂志） 83

S

萨德侯爵 85
三联出版社 88
色弗尔皇家制瓷工场 22
尚蒂伊 26
上海 36，37，38，43，64，69，87，89，92，95
上海大剧院 87
上海2010年世界博览会 87
上海法商电车电灯公司 41，45，49
上海工人示威游行（1927年） 69
“上海公社” 81
上海市立法国中学 65
《社会契约论》（让－雅克·卢梭） 60
沈大力 81
圣德尼 51，52
圣-琼·佩斯 64
圣依纳爵·罗耀拉 23
世纪大道（上海） 87
《世界时装之苑》（ELLE） 94
《受法国教养的中国人》 30
舒瓦瑟尔公爵 26
《思想者》（奥古斯特·罗丹） 77，89
《死者的对话》（费内隆） 31
四川 53
宋君荣 20
苏元春 35
孙中山 61

T

台湾 78，80
潭微道 52
唐海文 91
天津 37
天主教传教士 44
同文馆 56
涂普义 53

W

“文化大革命” 77，83
“五四运动”（1919年） 63，69
“五月运动” 83
瓦朗斯 28
外方传教会 52
王蒙 91
王致诚 17，25
维克多·雨果 46，63
韦锡爱 57
乌尔斯特少校 53

X

西贡 88
西蒙·莱斯（皮埃尔·里克曼斯） 83
西蒙娜·德·波伏瓦 79
夏尔·戴高乐 80
夏尔-尼古拉·戈善 24
夏尔·珀蒂 60

夏奈尔 92
厦门 36，37
咸丰皇帝 60
《现代世界的危机》（勒内·格依） 74
香塔庐 26
《小说月报》（杂志） 70
小仲马 62
谢阁兰 75
《新青年》（杂志） 63
“新文化运动” 62，64，69
《新青年》（杂志） 63
徐光启 11
徐家汇 41，44，72
轩尼诗 95

Y

鸦片战争 36，37
雅克·吉耶马 80
雅克-加布里埃尔·德法西 23
亚丁 90
亚历克西·帕卡尔 47
亚历山大·戴维·尼尔 73
延安 88
严复 60
杨自新 19
耶稣会 11-16，21，22，23，25，30，31，41，44，52
《耶稣会士书简集》 31
《义和团团民的皇太后慈禧》（乔治·苏利埃·德·莫朗） 60
义和团 46，48，60，63
《一笑集》（王蒙） 91
伊齐多尔·埃德 54
殷弘绪神甫 22
英国/英国人 36
印度公司 93
印度支那 53，55
《樱桃时节》（沈大力） 81
雍正皇帝 32
于勒·瓦莱斯 81
《玉书》（朱迪思·戈蒂埃） 52
圆明园 17，19，20
《圆明园之劫》（皮埃尔·让·雷米） 80
《月曜日故事集》（阿尔封斯·都德） 81
云南铁路 55

Z

“怎么样，中国？”，展览（巴黎，2003） 92
曾纪泽 56
曾朴 62
张诚神甫 12
《赵氏孤儿》（马若瑟译） 30
赵无极 93
《征服者》（安德烈·马尔罗） 71
震旦大学（上海） 64
中法工商业学院（上海） 65
中法教育协会 65
中法文化年 95
中法战争（1884—1885） 50，57
《中国蝉》（保尔·迪瓦） 48
中国春节 90
《中国孤儿》（伏尔泰） 30
《中国建设》（杂志） 78
《中国女人》（让-吕克·戈达尔） 77
中国勤工俭学学生 67，71
《中国思想论》（葛兰言） 75
《中国现势新志》（李明） 13，16
中国浴场 27
中国园林 25，26
《中华帝国全志》（杜赫德） 14，21
中华民国 61
中华人民共和国 78
中日甲午战争 60
周恩来 69
朱迪思·戈蒂埃 52
朱丽娅·克里斯蒂娃 83
紫禁城 46，48
《子夜》（茅盾） 70

封面页
版权页
前言
正文